

# 中国考古学史

阎文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KAOGUXUE SHI



ISBN 7-5633-4435-7



9 787563 344352 >

ISBN 7-5633-4435-7/K · 243

定价: 19.00 元

# 中国考古学史

阎文儒 著

ZHONGGUO KAOGUXUE SHI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史/阎文儒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

ISBN 7 - 5633 - 4435 - 7

I . 中… II . 阎… III . 考古学史 - 中国  
IV . K87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7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

网址: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 - 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 271000 )

开本: 635mm × 965mm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18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定价: 1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为祖国的考古 事业增辉

——追忆先父阎文儒教授

阎万石 阎万钧

先父阎文儒(1912~1994),字述祖,又名成凡,辽宁省义县人。他自幼酷爱读书,二十岁投考东北大学,在数百名考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一。1936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向达教授。在三年的学习中,他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写出了长达二十余万字的《西域文明史》,受到向达教授的高度评价。1941年,先父到西安调查长安城,并用了两年的时间写出了《西京胜迹考》一书,这是先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

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向达教授任考古组组长,夏鼐任副组长,先父为组员。考古组于4月到达敦煌鸣沙山发掘唐墓,暑期至莫高窟考察,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秋后,继续发掘唐墓,并详细调查了阳关、玉门关、汉长城、安西榆林窟和唐代的玉门关等,年底返回西安。1944年,先父又与夏鼐先生至酒泉、张掖、武威等地,调查了张掖南山下的石窟,还在民勤县发掘沙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此次河西考古,正值抗日战争艰难

时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探访祖国的文化宝藏,为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56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对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先父和原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黄炳章先生等参加了这一举世瞩目的考古工作。他们清理了雷音洞,打开了另外八座封存多年的藏经洞,共取出四千余块隋唐时代刻的经板。1957年夏,先父和黄炳章等人根据一座辽碑的记载,在已毁坏的南塔周围挖掘,在塔南发现了深五米,埋藏六层经碑的地穴。他们按照经碑排列顺序编号,再拾出拓印。经清点,有一万余块,比碑铭上的记载多出一倍以上。经后来考证,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藏》。先父在将近两年的房山石经考古发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许多报刊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作了报道。

1958至1959年期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先父投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历代诸馆的布置陈列工作中。他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半个多月才回家一次。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来到历史博物馆视察工作,当他看到康熙和乾隆的画像时问:“你们从这两幅画像里能看出康熙和乾隆有什么区别?”先父回答道:“康熙重武功,乾隆偏文治。”总理指了指两幅画像说:“你看,康熙的画像侧面有书架,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书,乾隆画像侧面也有书架,架上放的却都是古代瓷器。可见康熙励精图治,乾隆贪图享乐。这才是他们的区别。”

## 二

先父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莫过于对中国石窟寺艺术

的研究和总结。

从1961至1965年,先父接受锡兰国(现斯里兰卡)的邀请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编写《佛教百科全书》中的“中国石窟”部分,率全国石窟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行程三万余里,先后三次对全国的石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第一次调查从1961年6月开始,调查了新疆各石窟(包括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和克子里喀拉罕石窟及库木吐拉石窟群、焉耆七格星明屋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等),甘肃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四川广元皇泽寺石窟、大足龙岗山石窟,浙江杭州飞来峰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等。此次调查历时一年半,弄清了不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过去根本不被人们注意的石窟进行了分期、编号、造册、登记,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1963年以后,先父又率调查组两次前往甘肃炳灵寺石窟、陕西庆阳寺沟北石窟、郴州大佛寺石窟等地进行了调查,这是对第一次调查的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可以说,调查组对全国石窟寺的三次调查,是我国现代考古事业的一次壮举。它不仅为编写佛教经典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也是对我国石窟寺艺术的一次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同时,对于我国石窟寺的保护,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三

先父生性忠耿正直,不畏权势,有强烈的爱国心。抗战胜利以后,先父应恩师金毓黻之聘赴沈阳,任沈阳博物馆主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民报》主笔等职务,在东北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

望。对于那些受国民党反动当局歧视和迫害的爱国知识分子，先父都给予深深的同情和慷慨的帮助。1947年春季，先父在《东北民报》上发表《端午感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贪污腐败等罪行。后来，先父又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将其秘密转送到当时已经解放的大连市。全国解放前夕，先父毅然回绝了海外高官厚禄的诱惑，愉快地接受了向达教授和汤用彤教授的聘请，飞回北京，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全国解放以后，先父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考古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父和许多学者一样，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心一直不变。1972年，当他从“江西于校”返回北大校园时，我们问他对所受的迫害就没有一丝怨恨吗？先父感慨地说：“我是一个通晓历史的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要经历一个磨难的过程才能达到太平盛世。就像我当年坠入黄河，如果我不能在惊涛骇浪中奋力拼搏，那就不能到达安全的彼岸。”先父这番话，至今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先父做了一辈子考古工作，在不少单位做过负责人，国家财产他锱铢不取。中国书店的著名古籍版本专家郭纪森老先生多次对我们讲：“我和你们父亲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太了解他了，那真是两袖清风呀！”

1973年，先父不幸患颈椎椎增生症。1975夏季经过手术，先父的病基本痊愈，但右手失去了写字的能力。他丝毫未丧失继续执笔的信心，就在他六十五岁之际，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不到一年，先父左手写出来的字同右手写的一样工整有力。以后，先父就用左手坚持写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共出版了《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唐代贡举制度》、《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两京城坊考补》、《龙门石窟》等

著作。

先父把他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事业，他那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考古事业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他对考古事业的执著追求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正如北京大学考古系张辛教授的挽联所言：

石窟考古，交通中西，百卷著述昭史界  
泮宫滋兰，披沥光霁，一园桃李发寰中

这副挽联概括地表述了先父在考古事业中取得的杰出成就。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在繁荣祖国文化事业的道路上前进。

#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两汉以前及两汉、魏、晋的考古学       | 7   |
| 第二章 南北朝、隋唐的考古学            | 23  |
| 第三章 两宋的考古学                | 39  |
| 第四章 元明的考古学                | 65  |
| 第五章 清代的考古学                | 83  |
| 第六章 20世纪上半叶非中国正式考古机关的考古工作 | 135 |
| 第七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机关的考古工作    | 151 |
| 跋                         | 167 |

## 一、什么是考古学史

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就是考古学,因而中国几千年来对多样铜器铭文形制的研究,对石刻文字的研究,对书、画、雕刻的研究,对钱币的研究,对玺印文的研究,对生活用具(劳动工具、武器、装饰品、器皿等)的研究和古遗址(城市或村落)古建筑的记载与研究,以及近代有计划地对遗址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凡是以上提出各种记录与研究的著作,都是考古学史的良好资料。我们考古学史的范围,既不限于旧日的金石学,也不限于近百年来的发掘报告,历代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和重视、收搜和保护,也都应列入考古学史的范围以内。

## 二、中国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

考古学的发生必定要以史学为基础,有了史学才能谈到有考古学。孔子是汉代以前杰出的大史学家,因而他能到杞、宋调查夏、殷的文明,认识古器物坟羊与楛矢。司马迁是汉代的大史

学家,他也能探禹穴、窥九疑,以至学习古文字。史学的发展,促使考古学的发生,考古学的发生,又可促进史学的发展。

## 1. 宋代以前的考古学

除掉两汉以前考古学启蒙时期还谈不到正式的考古以外,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前期两汉的考古学,主要是对古文字(古文学派)的研究,用以解说经史,而不重视古器物(这并不是说考古学放弃了古器物的研究)。后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考古学,学习古文字成为创作书法的必经之路,古器物 and 书画收藏的人也比较多,开始有了货币的价格(如梁萧之遴收藏古物、唐太宗购买书画),于是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渐渐兴起来了。与前期的考古学有了一些不同。当然对古遗址、古墓的调查与研究,前后期都是一致的。宋代以前的考古学所以有前后期的不同,应当认识到当唐代或唐以前社会的商品生产并不盛行的时候,古器物没有价格,所以唐以前的考古学家,没人重视古器物形制的研究。唐代以来,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盛行,古器物 and 书画有了价格,官府和私人都注意收藏,因而对古器物有了鉴赏和辨伪,张彦远的两部书画考古著作《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就是对古书画鉴赏辨伪的总结著作。这样势必过渡到宋代的古器物学和金石文字学的考古学了。

## 2. 宋代和宋代以后的考古学

唐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初唐时候已有技巧之家,专

事铸造佛像。<sup>①</sup> 北宋以来,由于宣和“内府尚古器……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吴玠为光州固始令……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sup>②</sup>。这样古器物成为商品,私人收藏者渐多,于是古器物图录之学、古文字学大兴。南宋程潜年《稽史》中注录北宋古器物图录和钟鼎款识之书三十四种,可以说明唐代以后专为古器物而研究是如何发达了。有清一代,金石之学又大兴,论公私收藏,竟作图录和释文,同时对砖瓦文字、古玉、古镜、印玺、钱币等都有专书来讨论。其他如书画的记录与研究也有所发展。所以清代金石考古的盛行与当时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盛行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有许多考古家所做的工作,如宋敏求的《长安志》、迎贤的《阿翔访古记》、萧洵的《元故宫选录》、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等,更接近于史学,而与古器物研究这方面的关系比较少。

### 3.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考古学

自 19 世纪下半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不仅在我国发展垄断资本,扼杀中国的经济,在政治上奴役中国人民,同时也发挥他们的反动社会学理论,提倡“文化圈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不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因此在考古学上,也不能放弃他们的掠夺行为。他们的学者,纷纷到中国北部蒙古(含现在的蒙古国),西北新疆、甘肃,东北各地方作调查或发掘工作,并窃盗了许多宝贵的文物。西方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如桑志华、怀履光等人,受中

---

①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断卖佛像救》。

② 叶梦得:《石林燕语》。

国聘任的安特生等人以及日本的鸟居龙藏、八木槎三郎等人,也都做了许多考古工作,后来和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斯文·赫定等人都把西方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因而刺激了中国从宋代沿袭下来的古器物学、金石学研究的发展。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研究方法的是清末陆心源、吴式芬等人,用泰西摄影法,印古器物图录。继之而起,有卓越成就的是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他们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又应用了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罗、王的成就在清代一切金石学家之上。1926年以后,以李济为领导的考古学不仅应用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同时也配合中国金石学、考掘学的方法,使考古学大大地前进一步,给今天考古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三、新旧考古学的区别

#### 1. 旧考古学的优点和缺点

旧日的考古学,可分为两方面来说:一是中国宋代以来占考古学重要地位的金石学(这并不是说没有对古器物形态分类的比较学);一是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古器物形态分类比较学(也不是说放弃对古器物文字的考证);另外就是以历史、地理为纲,对逸闻逸事的调查与考证。

这样的旧考古学,它的优点是:金石学能把古器物、古文字考证出它本身的渊源流变;古器物形态分类比较学能应用科学方法联系发掘出土地层、位置以及用科学的分类来作研究,较金石学方法更进一步。至于以地理为纲,调查考证历史人物活动

的遗迹,用以说明某一历史问题,也是很好的考古方法。

缺点方面:金石学只是孤立地对古器物、古文字本身的考证与研究,即使能对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人物得到一些活动材料,但对全面社会发展的概况,不能联系起来研究,不能更多地说明人与物的关系。近代考古即使作了科学的发掘,虽然是进步的,但在思想上还是期望得到稀世瑰宝,而不重视得到更多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资料,甚至仅希望在部分遗址中,得到某一些贵重文物,因而忽略了当时全盘的社会生活面貌。在古器物形态分类比较学上,只根据器物本身来进行比较和研究,虽然这样比较,在考古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可是器物的制作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的,尤其是与社会中的人,更是不可分开的。如果离开了社会和人,专从器物本身来比较,只能反映器物发展的一面,忽略了器物为什么被人制造出来,这样势必脱离人与物的关系,脱离历史发展而独立成为古器物学,不能借以恢复历史的原貌。以上所说的考古学,当然不能反映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也不能反映社会的生产关系。

## 2. 新考古学要怎样来建树

在社会性质的改变中,考古学也同样有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在旧基础上取长补短发展出的新形式)。在今天,考古学的变化还是很少的,如果要建树起新的考古学,首先要纠正过去专在古文字、古器物形态上下功夫的做法。专在古文字上研究,不重视周围的物质资料,很容易考证错误,歪曲历史事实;专在古器物上研究,只可对古器物本身有认识,不能把制造古器物和应用古器物的人与周围的关系了解得更多。

些。在考古发掘上也应当对遗址全面地打开,作综合的观察而不应只凭几条探沟的开掘,征集一些材料,就代表全部的文化。考古学与历史,虽然有某些部分的不同,但整体来说,还是要一致的。因此新的考古学,要用若干例证指出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相互关系,用以说明历史,解决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 一、两汉以前的考古学

考古学的兴起,既然以史学为基础,那么最早的考古学家虽然不像后代那么多,但发凡起例的工作,见于文献的,当在春秋之际。

### 1. 孔子的考古学

据文献的记载,孔子不仅是个史学家,而且是个考古学家。他的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sup>①</sup>以至“约史记而修《春秋》”。这些著述内容,许多地方涉及考古的资料。不懂考古,没法得到这样卓越的成就,当然孔子周游各国的经历,也更丰富了他的考古学知识。他对古器物的认识,还是十分渊博的,如对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

<sup>①</sup> 《尚书·孔氏序》。

羊”的器物,孔子称作“坟羊”。“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孔子说武王克商时,“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因证楛矢石弩,是肃慎的兵器。<sup>①</sup>虽然孔子认识古器物还不够正确,但他已经懂得了许多古器物知识,甚至如居鲁入太庙问欹器于守者<sup>②</sup>的研究古器物等纪实,都应是孔子为研究史学而对考古工作的重视。

## 2. 韩非子的考古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许多学者都要用历史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学说。韩非子也是当时的考古学家。他知道“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斲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又说:(殷人)“食器雕琢,觴酌刻镂,四壁垺墀,茵席雕文。”又说:“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获蒿栲楚墙之,有栲高至于丈。……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sup>③</sup>当然这些记载也可能是根据传说,但如此记出,一定要有相当的调查与研究。

其他如孟子、荀子、吕不韦门下诸行生,虽不像孔子那样博闻通古,但也都能相当了解古代劳动文化的遗存。

---

① 《国语·鲁语下》;《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卷四,《辨物》。

② 《论语·八佾》;《荀子》,卷二十,《宥生》。

③ 《韩非子》,卷三,《十过》第十。

### 3. 屈原的美术考古

《楚辞·天问》应是一篇具有相当美术考古价值的著作。屈原看到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和古圣先贤的壁画,不由愤懑,为愁思而写出该文,但从天地开始,经日月星辰的安陈,直到传说时代的洪水,鲧、禹的治水,尧、舜的治国,益启的作后,夷羿的革命,少康的复国,汤武的革命,桀、纣、幽的荒淫,齐桓的作伯,吴王的散亡等等娓娓道来。对这些壁画的解释,已达到了美术考古的目的。

### 4.《世本》对古器物的记录

《世本·作篇》中,记录了各样古器物及创造的人,如:“倕作钟,毋句作磬,女娲作笙簧。……箫舜所造,逢蒙作射,杼作甲……咎繇作耒耜……”虽然这些记载,不见得是专对古器物的研究,但在先秦时代,有这样对古器物的记录,也应是最有价值的文献。

## 二、西汉的考古学

汉帝国统一以后,社会秩序渐渐恢复,社会生产力一天天地向上发展。农业上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水利灌溉有相当的发展,手工业如盐、铁、鼓铸等也有很大的进步,刺激了商业的繁荣。文化方面也日渐上进,史学上对各种资料的搜集,都超过以往。史学的发达,促进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古文经的研

究,在古文字考订上起了大作用。直到后汉,古文学派始终坚持着进步的学风,成为两汉时期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 1. 司马迁的考古工作

自孔子作《春秋》以后,史学日渐发达,到司马迁时更能把史学发扬光大,因而他的考古工作,也是最有成绩的。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种:

### (1) 对古遗址的调查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蒙恬列传》中云:“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甃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又云:“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同时又调查信陵君食客侯嬴在大梁任夷门监的夷门地址。《史记·信陵君列传》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司马迁又到楚调查了春申君的故城和宫室。据《史记·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他又调查了秦始皇东巡狩猎所祀的八神祠的遗址和长安以西几十个神祠的遗址。这些考古活动均散见在《史记·封禅书》所记文中。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

### (2) 对古墓葬的调查

为《史记·周本记》太史公曰:“周公葬我于毕,毕在镐东南杜

中。”又如调查秦王由襄公起到始皇二世历代的陵寝<sup>①</sup>、谷城项羽墓<sup>②</sup>、箕山许由墓<sup>③</sup>、大一顷孔子冢<sup>④</sup>等遗迹。他还到淮阴调查韩信母亲冢<sup>⑤</sup>，在长安调查樗里子墓（见《史记·樗里子列传》）等等。

### （3）对古器物、货币的研究

司马迁过鲁曲阜，研究“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衣冠、琴、书”的古器物<sup>⑥</sup>。太史公又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上币，铜钱只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sup>⑦</sup>

### （4）对古文字的研究

孔安国是西汉古文学派的大师，司马迁曾从之学《古文尚书》<sup>⑧</sup>。太史公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sup>⑨</sup>因知春秋古文，也是很早就为太史公所认识到的。

---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③ 《史记·伯夷列传》。

④ 《史记·孔子世家》。

⑤ 《史记·韩信列传》。

⑥ 《史记·孔子世家》。

⑦ 《史记·平准书》。

⑧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孔安国传》。

⑨ 《史记·吴太伯世家》。

## (5)对逸闻逸事的调查

如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缗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sup>①</sup>太史公又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sup>②</sup>司马迁还过薛调查当地民情风俗与孟尝君的关系<sup>③</sup>，等等。

由此可知司马迁是十分重视考古资料的，他的考古学范围超过任何一家，因而他的史学成就是前人以及后来许多人所不能比拟的。

## 2. 古文学派的考古

西汉一代对考古最大贡献的是古文学派等人。从孔安国时家藏古逸书，得十余篇<sup>④</sup>，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古文）以后，古文之说开始。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壁，又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以后，古文之说，更为学者所重视。<sup>⑤</sup>孝宣帝时张敞曾从齐人学苍颉古字，张敞的儿子张吉和他的外孙也都长于古文。<sup>⑥</sup>

① 《史记·樊、酈、滕、灌列传》。

②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③ 《史记·孟尝君列传》。

④ 《汉书》，卷八十八。

⑤ 《汉书·艺文志》。

⑥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及法书要录》，卷九。

同时刘向在中书校书,看到古文的《诗》、《书》,于是对古书有进一步的认识。

古文运动到哀帝时,由于刘歆也校书中秘,对《春秋左氏传》(古文)大加研究,转相发明章句义理大备,因而提倡古文经,“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当时因为名儒龚胜与王莽意见相左,当然反对刘歆的建议。孔光、师丹执政,意识上保守,认为歆是“改乱旧章”,以至未能施行。<sup>①</sup> 后来王莽居摄时,命大司空甄丰校文书,稍改定古文。刘歆典儒林、史卜之官,以之为国师,对古文《春秋左氏传》、《周官》更加重视,于是古文运动大盛,整理古史,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从刘歆学《周官》的,有缙氏杜子春,学《左氏春秋传》的有贾徽、郑兴,与之辨析疑异的有扬雄、桓谭等人<sup>②</sup>。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当时不是百家争鸣,这些古文学派人物,是可能运用古文经来改纂今文经和古史的,可是不能因此把古文书籍都疑惑起来,而泯灭了这些人在考古学上的贡献。

### 3. 刘歆《西京杂记》所记的冢墓考古

该书包括魏襄王、哀王、幽王冢,并从其中看到墓室情况,如石雕侍男女以及殉人百余等等。这对古墓发掘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其他如对虎子的考释等,是对古器物研究的一种帮助。

① 《汉书》,卷二十六,《刘歆传》。

②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及书法要录》,卷八十七,《扬雄传》;《后汉书》,卷六十六,《郑兴传》、《贾逵传》。

### 三、东汉的考古学

#### 1. 继承西汉古文运动的考古学家

##### (1) 郑兴与杜林

郑兴是刘歆的门人,通《左氏春秋传》、《周官》,其子郑众,从父受《左氏春秋传》,并《周官》、《毛诗》、费氏《易》及古文学派,因而将他们称作二郑。杜林是承袭西汉张敞系统下的古文学派,从外氏传练受学,博记多闻,时称“通儒”,又在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因对照研究古经史。东海卫宏、济南徐巡都曾从杜林学古文,所以古文学大为兴盛。<sup>①</sup>

##### (2) 贾逵与许慎

章帝怀《古文尚书》、《左氏春秋传》,建初之年(76)诏逵人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发挥古文经。由于当时讖纬学盛行,乃用《大戴礼记·五帝德》的学说,取章帝的信任,因而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古文运动因之大为发展。虽然范蔚宗评贾逵以图讖兴古文经为不光彩,但在那个时代,为了发扬考古学,也不必以士大夫的立场来评论贾逵所运用的手段。<sup>②</sup> 所以许冲

<sup>①</sup> 《后汉书》,卷六十六,《郑兴传》;卷五十七,《杜林传》。

<sup>②</sup> 《后汉书》,卷六十六,《贾逵传》。

说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sup>①</sup>，这倒是一种公正的评论。

许慎也是古文研究的大师。幼年从贾逵受古学，根据古文的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诸书，作《说文解字》十五篇。《说文解字·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同时他的儿子许冲后来上书说：“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所以许慎在东汉时，的确是一位研究古文的专家，而且是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人物。

### (3) 郑玄

郑玄是发扬古文经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传》、《韩诗》、《古文尚书》，后又西入关中，从马融学。居东莱时，与何休论《公羊传》、《左氏春秋传》、《穀梁传》，因而古经学大明。郑玄又曾注诸经，如《诗经》以毛本为主，《尚书》、《仪礼》以古文为主，《论语》以齐论为主，注《易经》，据陈元、郑众所传的费氏《易》，注《周官》根本是据中秘古文本。但郑氏并不废弃今文，因而注《诗》兼采韩《诗》，注《书》参以班氏《汉书·地理志》，注《论语》也参以鲁《论语》。他是以古文为基础，以今文为辅助，所以他的成就是东汉一切古文学家所赶不

---

<sup>①</sup> 《说文解字·后叙》。

上的。<sup>①</sup>

其他如大史学家班固,也是古文学派。西汉元始中扬雄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sup>②</sup>因而颜师古《前汉书叙例》中说:“《汉书》旧文,多有古字。”是证班固也是通达古文字的一个人物。在当时古文学派运动中,主要的人物还有通《左氏春秋传》的陈元,通《古文尚书》的徐巡,著《周官训诂》的张衡,著《中文尚书》的刘陶,通《诗》、《易》、《春秋》、《古今训诂》的雀篆,从贾逵质正大义的崔瑗,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的关中大儒马融,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的卢植,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甚至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也是古文学派中的人物。<sup>③</sup>这些古文学派的专家,全是从考古学入手,用崭新的学术思想,从事研究,因而成为一代大儒。

#### (4)古文学派被当时排斥的原因

从《汉书·刘歆传》移书太常博士书,知当时的腐儒,是“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当然不能同意古文学派了。同时古文经立学官以后,那批挟私意的腐儒们,恐怕丢掉了饭碗,更不会赞同古文经了。

另外古文也常为俗儒所篡改,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壁

① 《后汉书》,卷六十五,《郑玄传》;《隋书·经籍志》。

②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及书法安录》。

③ 《后汉书》,卷八十六,《陈元传》;卷七十九,《王充传》、《王符传》、《仲长统传》;卷八十二,《崔骃附子瑗孙寔传》;卷九十上,《马融传》;卷九十下,《蔡邕传》;卷九十四,《卢植传》。

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不使今文学家对古文加以怀疑,直到清末的康有为正因之大肆怀疑诬蔑古文学派为伪经,博得多少不懂考古学的史学家同声喝彩。这就等于甲骨文初期发现时,还有许多疑古学派的人认为是赝品的情况是一样的。

## 2. 袁康的《越绝书》

《越绝书》十五卷,其中有些是实地考察的材料,如《吴地传》对吴的都城、宫室、冢墓以及城镇的遗址、春申君城、楚王陵等都作详细勘察,然后记录出来。《越地传》把越的山阴城、美人宫、怪游台、富阳里、独山、若耶陵墓,也作详细的勘察,甚至《宝剑篇》中记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这样有次序地说出兵器的发展史,不是坐在斗室之中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所以袁康的《越绝书》应是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古迹志,对考古学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 3. 熹平的《一字石经》

据《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云:“(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乃与五官中

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禅,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参加校定的还有古文学家卢植等。这样镌刻石经,也是考古工作的又一种。

## 四、魏、晋的考古学

### 1. 曹魏时代的考古

#### (1) 古文字研究与《三体石经》的建立

魏初传《古文尚书》的有邯郸淳,从淳学古文的有卫觐(敬侯)、韦诞,但韦诞不及觐学得好<sup>①</sup>,后来正始中(240~248)立《三体石经》,所用蝌蚪体,依邯郸淳笔法,可是所写的石经古文,反而失掉了邯郸淳的真迹。虽然如此,但对《古文尚书》、《春秋》的研究是起了大的作用。又博士张揖,曾有《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等古文字的著作。江琼、江应元等,也曾从卫觐学古文字,古文字的传承因赖以不堕。<sup>②</sup>

#### (2) 刘劭、王象等在考古上的贡献

魏黄初中(220~226),刘劭、王象受诏撰《皇览》<sup>③</sup>,其中《冢

①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韦诞传》引文章叙录,《邯郸淳传》注引《魏略》。

② 同上书传注引卫恒《四体书势·序》;《晋书》,卷三十六,《卫恒传》;《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

③ 《魏志》,卷二十一,《刘劭传》;卷二十三,《杨俊传》注引《魏略》。

墓记》把上古以来的冢墓详加考证。如“周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凿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扞漆、缁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等。所以《皇览》这部书，直到今天对考古工作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资料。

## 2. 晋代的考古学

### (1) 汲冢简书的出土与束皙、卫恒、司马彪等对古文字的研究

太康二年(281)汲郡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包括《纪年》十三篇、《易经》两篇、《易爻阴阳卦》两篇、《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殿》两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两篇、《生封》一篇、《大历》两篇、《穆天子传》五篇、《西王母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共七十五篇,还有七篇简书损坏,不能辨别书名。另有铜剑一把,同时出土。晋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束皙任著作郎时,得看竹书,以今文写出《竹书纪年》,并加考释。<sup>①</sup>大书法家卫恒说,他的祖父敬侯所书,犹与竹书相仿佛。<sup>②</sup>后来司马彪考古史,出百二十二事,多采用汲冢纪年的说法<sup>③</sup>,又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曾著《字林》六卷,忱弟静,又作《韵集》五卷<sup>④</sup>,这也是对古文字研究较有成绩的人物。

① 《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② 《晋书》,三十六,《卫恒传》。

③ 《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

④ 《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

魏墓竹书的出土,对史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汉代古文学派,专注意经,即使有如《尚书》、《左氏春秋传》等古史的发现,但囿于当时学术思想,只在章句上、微言大义上着眼,并未能用这些古文经来“反证流传中古史的谬误。竹书七十余篇的出土,如《纪年》、《穆天子传》等的记载,给研究古史者开辟一新道路,无怪乎司马彪因之对古史考证出来一百二十二条。

## (2)常璩与《华阳国志》

璩江原人,蜀李势时,充散骑常侍,对蜀中历史掌故,极为熟悉。《华阳国志》中的《蜀志》,记蜀先王死后作石棺。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又说:“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无儿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如之。”这样的石笋和以大石作墓的标志,与蒙古国内匈奴墓四周以大石作标志的情况相同。

又《包志》记有涂山禹王祠,祠北有铭书,记犍为太守张君成道事。

《汉中志》记蜀丞相诸葛亮葬令军山、葭萌城大将军费祎及大胜墓群等。又《蜀志》中还记州治大城的七桥、城北的升仙桥、文翁石室、会无县的濮人家等。对巴蜀、滇中、汉中的遗址与古墓都有记载,所以《华阳国志》可以说是晋代较重要的考古著作之一。

## (3)法显与印度考古

从《法显传》的记载得知,经过法显在印度勘察过的遗址,主

要有：西天竺的舍利弗、目犍连、阿难塔，舍卫城中的大爱道故精舍，须达长者井壁，城南须达精舍石柱等，迦维罗街城白净王故宫遗址和释迦牟尼出家前出游四门等遗迹，以及城东二十五公里蓝毗尼园遗址，蓝莫此国佛的舍利塔，拘夷那竭城城北佛灭度遗址的双树，佛止诸梨车返家的石柱刻石，摩揭提巴弗连城的阿育王雕纹刻镂的宫殿遗址，城南一点五公里的阿育王柱，释迦耆闍崛山的石窟和说法堂遗址，城北第一次结集处石窟等，以及波罗奈城鹿野苑精舍等处。法显把这些佛教遗迹，有系统地记录下来，对印度考古来说，是大有补益的。

## 小 结

这一阶段的考古学，还是在启蒙时期，对古代遗址遗物，并不十分重视，固然也有盗墓的，像汉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国内冢藏一皆发掘；<sup>①</sup> 赤眉进长安后，也大掘渭北的汉陵，杜林在河西得过漆书，在魏王墓也得过竹书。但掘墓只是对宝货的盗取，并未想要到得鼎彝、竹书，同时更未想到将这些古器物作为收藏品。所以这时对古文字的研究，只是为证经史。抱有进步思想的人，如刘氏父子，就接收这样的新鲜事物；思想落后的人，就反对这新鲜事物。所以考古学应是史学中崭新的一门学科，思想落后的人物，还是难于接受的。

魏晋以后整个社会处在过渡的阶段上，汉代传统的古文字学，不仅仅是用它来证经史，同时又应用它创造出新的艺术。邯郸淳以后，社会上把学习古文字的学问作为创作新字体的基础，

---

<sup>①</sup> 《西京杂记》，卷六。

因而钟繇师曹喜、蔡邕，卫瓘师其父觐成为书法家的先驱，索靖、卫恒、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都成为大书法家。当然这些大书法家的成就与纸的发明也是有关系的。以后古文字学，不像汉、魏时代那样被重视，因而考古学的范围也不限于古文字的研究，而是更为扩大起来了。

## 一、南北朝的考古学

东汉的考古学,主要是对古文字的研究,因而对古经的整理收获颇大。对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与研究,还没有一个能赶得上像司马迁那样的大史学家。可是魏晋以后,虽然经济上受到了许多的破坏,但在民族大融合的情况下,重新建树一套制度,如北朝孝文帝的改制、南朝萧梁的变革,而且也总结了一些生产的经验,反映到上层建筑史学、考古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新的发展。考古学不仅承袭了前代对古文字的研究,同时又发展了对古遗址、古墓葬、碑碣、铭刻、古器物的研究,这样扩大了考古学的范围,是两汉、魏晋所赶不上的。

### 1. 北朝的考古学

#### (1) 中世纪惟一的考古学家酈道元

道元范阳人,平生好学,历览奇书。肃宗孝明帝时,北地沃

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改州县时，曾派遣元按古城邑定名，可证酈道元对古城址的熟悉到何种程度了。<sup>①</sup>酈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对考古学的贡献更大，分析起来如下：

古城址、居住址的调查与考订——全书四十卷，记载了全国的水道，对古遗址方面的调查与考证颇多。尤以三十卷以前对大江以北各地的调查，颇为详尽。如平城、洛阳、长安、邺郡等地的调查与考订，直到今天对古代城市遗址的发掘来说，还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古代陵墓的调查与考订——对洛阳故城中周景王、周威烈王墓的考订，咸阳原上汉诸陵的记录，李夫人墓的考订；在山东各地对汉代画像石墓，李刚、鲁峻等墓作了记载，甚至把墓前的石刻行列都记录出来。这样的详细记录，如果不是亲身作过调查的人，是没法写出的。

碑碣版记录——这开了铭刻学研究的先河。汉代古文字的研究，是根据了铜器铭文、竹书和漆书。从汉代时起，碑碣又刻出了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最宝贵的史料。如伊阙的开凿，以现存的石刻，最早的是在太和七年(483)以后所开的石窟，但从《水经注》所记石铭中，知道曹魏黄初四年(223)伊水大涨，晋元康五年(295)，断岸开石，那么经营伊阙就不自北魏开凿石窟时起了。洛阳城中的汉熹平《一字石经》，与正始《三字石经》的正确记录，使研究石经的人们依他的记载，更好地纠正了《范史》的错误。所以酈道元对铭刻学的运用，即便是对于今天，在考古学上也起了极大的启发。

---

① 《魏书》，卷八十九，《酈道元传》。

石窟塔庙的调查——这也在酈道元的考古范围以内,如所记武州川侧的祇桓精舍并诸窟,为比丘尼所居处,“东转灵岩,凿石开山,真容巨壮,水殿山堂,烟寺相望”。这就是把云冈石窟群记录出来。又如记河水至小积石山,悬崖中的唐述谷石室,是对今天的炳灵寺石室作了调查。又如记文水南径大陵县(山西文水东北十二点五公里)右会隐泉口水,所记隐泉口水源出竭泉山上,崖半有一石室,去地约一百五十米,又有沙门释僧光所造的二刹,当然是石窟寺的遗迹。如果依之调查,也是可找到的。这又是酈道元对美术考古的一种贡献。至于酈道元对历史地理的考订更为精确。他的记载不仅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考证了印度、朝鲜、越南等地。虽在一千年前的中国,但他不仅能重视石刻中的碑碣,而且能重视古人生活过的遗址,甚至古城址,以及古墓、石窟、塔庙等遗迹。虽然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了酈道元进行发掘,但从调查研究考证中,已可以说他是中世纪前期惟一的考古学家了。

## (2)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酈道元以后就是杨衒之了。他把已废弃的洛阳用记载佛寺的题材,叙述出全城的建筑物,以城内外三十九个佛寺为纲,把宫城、府寺、宗庙、社稷、市场里坊的地址,都考证出来,并且用碑石的材料,考证某一地方的变迁(如领军将军元义宅中出土筭或宅石铭)、建筑的年代(建春门外东人阳渠石桥柱铭),对某一遗址的调查、某一坊市的历史故实都能作详尽的记录。虽然洛阳当时已成废墟,但从此调查报告中,人们对北魏的都城可以得到全面的了解。

### (3) 阚骃的《十三州志》

虽然《十三州志》是地志的体裁,但由于阚骃博通经史,又曾刊定诸子,典校经籍,<sup>①</sup>因而《十三州志》中如对遮虏障、居延城、蒲城东二十五公里秦长城的记载,其他如马邑故城、夏县夏禹台、尧祠、代郡故城及成都石笋的考订等,是给历史考古提出了宝贵的资料。

### (4) 江式一族传统的古文字研究

自永嘉乱后,江氏迁居河西,江琼善虫篆诂训。《江式传》中说:“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占篆八体之法。”<sup>②</sup>到江式时,对古篆体更工,因而有《论书表》上呈,并撰《古今文字》四十卷。不过这时对古文字研究的人与汉代有所区别。汉代为考经而研究古文字,魏、晋以来,书法公认为艺术,对古文字研究的人,多是为了艺术的创造,所以洛阳宫殿的榜题,多是江式的手笔,江式也是当时的大书法家。

## 2. 南朝的考古学

南朝虽然没有像郦道元那样的大考古学家,但是对古器物的认识较以前更进了一步。据史书记载,从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时起,武进人陈龙在田中得过铜铎五枚,会稽剡县陈清在井内得有十六字铭文的钟,东晋安帝义熙初(313),征关洛,得霍

① 《魏书》,卷五十二,《阚骃传》。

② 《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

山出土的六个钟。<sup>①</sup> 这些古器物的出土,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对古器物的认识更多了一些。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时候的商品交换也有了发展,古器物开始成为商品,好古的人要收购古物,因而古器物的研究,也为人所重视了。

#### (1)南齐时古器物的出土与王僧虔对古文字的研究

南齐时襄阳有盗发古墓者,相传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得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sup>②</sup> 王僧虔虽认识古文字,并未能把他研究古文字之长,用于证古经史(当然这时社会上已不流传古文,也没有今古文之争了),只是运用古文字来创作新书法。就以刘宋王僧虔《文字志》的写作目来看,也不是为了研究古文,而是为记叙古文字体和长于书法的历代人物。

#### (2)萧梁时的收藏家、鉴定家、古文字研究者刘之遴、

刘显和刘杳

刘之遴好收藏。“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荆州大中正)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瓿,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鸱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前5)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罍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前109)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件,铭云:

---

<sup>①</sup> 《宋书》,卷三十七,《符瑞志》上。

<sup>②</sup> 《南齐书》,卷二十一,《惠文太子传》。

‘初平二年(191)造’。”<sup>①</sup> 这足可看出刘之遴是一个大收藏家了。

刘显能识各种古文字,如识任昉所得的《古文尚书》所删的《无逸》篇,识魏人所献古器中的铭文等。<sup>②</sup>

刘杳天监初(502),为太学博士,尝于约(沈约)尘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疑子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sup>③</sup> 这足证刘杳对古器物的研究是有相当成绩的。当时古器物的出土比汉代更多,所以才有这些考古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也说明了这时的考古学与汉代主要以古文字证经的考古方法有所不同了。

此外《隋书·经籍志》中,又有顾烜撰《钱谱》一卷、无名氏《钱图》一卷,这又说明当时已开始有泉币学的研究了。

### 3. 传拓术的发明

传拓术的发明在考古学上引起了新的变化,中国金石学的发达与传拓术是有关系的。《隋书·经籍志》一,记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经》、《尚书》等七经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等十七卷。但《隋书》所记的这些卷数为唐初秘府所藏,与萧梁时所藏的卷数已有不同。至子三字《尚书》,有九卷、五卷两种,这都可说明是当时拓本的不同。因为下面就有开

① 《梁书》,卷四十,《刘之遴传》。

② 《梁书》,卷四十,《刘显传》。

③ 《梁书》,卷五十,《刘杳传》。

皇六年(586)移石经原石于长安,后废为柱础者很多的记载,接着又有“贞观初(627)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的话,所以秘府藏的拓本,必是唐以前的。那么拓术的发明,又必在萧梁以前了。因而《经籍志》四又记“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诸寺碑》四十六卷”等等。

这种考古技术的发明,促使唐宋以来对古器物研究的发展,同时传拓法的盛行,引起刻版术的发明。所以南北朝这一时期在考古学史上,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转变期。

## 二、隋唐的考古学

隋唐统一以后,在南北朝的基础上,中世纪城市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从贵族统治者到中小地主,除古器物研究外,对书画的研究更有兴趣,因而古物书画有了明码标价。如唐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书画的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辨别真伪<sup>①</sup>,所以唐一代又开辟了美术考古的风气。

### 1.《括地志》与《元和郡县图志》

过去地志多是专记一个地方,或是以水道作纲领的。自魏王李泰延、萧德言等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开始“分道计州”,以行政区划为纲领,写出了全国性的地志。<sup>②</sup>至于《元和郡县图

<sup>①</sup> 《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小学类》。

<sup>②</sup> 《新唐书》,卷八上,《濮恭王泰传》。

志》的题材,与《括地志》是一样的。

### (1)《括地志》及修撰人

该书主要修撰人为萧德言与苏勖。德言是博通经史的,苏勖也可能是通古文字的<sup>①</sup>,因而《括地志》的作成,除掉地理上的记载外,又记出许多古代的遗址和墓葬,并且加以考证。虽然书已佚亡,但从各书注的引文,可以看出是唐初最重要的考古资料之一。

### (2)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

该书一方面是辨州城之疆界,一方面又搜集了古遗址、丘墓、州邦人物,采集谣俗以充实内容。其中包括:

遗址——根据文献与实际调查,对照出周亚夫屯军遗址,应在长安县西南十六点五公里处,不应在万年县东北十五公里处。汉建章宫考证在长安故城西。华州东南一点五公里,有魏长城,郛州平阴县有“故长城,首起县北二十九里,齐湣王所筑”。这段长城在今天济南、临清界上还有遗址。至于“河南府”条所记王城在东都苑内,汉魏洛阳在唐东都城东九公里处,也都是十分正确的。其他如陈仓故城所记的上下二城,为秦文公和郝昭所筑,也是相当可靠的。

古墓——如“兴平县”条所记,茂陵在县东北八点五公里处,卫青墓、霍去病墓在县东北九点五公里处。以今日来对证,也是相当符合的。

占寺观——如“盩厔县”条所记楼观在县东十八点五公里

---

<sup>①</sup>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凤翔府·天兴县·石鼓文”条。

处,旧有尹先生楼,因名楼观。“齐州历城县”条,神通寺在县东三十五公里琨瑞山中,苻秦时僧朗隐此,因称朗公谷。这些记载与实际情况也是完全相符合的。

占文字——如“凤朔府天兴县”条所记的石鼓文,在县南十公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文为史籀之迹”。这是关于石鼓文最早的记录。

根据以上的分析,唐代这两部大型地志书是最好的考古著作,也是今大考古学上最宝贵的参考文献。

## 2. 玄奘与道宣的考古

东晋时的法显由于到印度取经而调查了许多遗址。至于唐代大和尚中,就要数到玄奘与道宣了。

### (1)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历代求法高僧很少如玄奘那样有高深学问,更少如玄奘那样精通梵语,因而玄奘在印度的考古工作也比其他人做得好。如玄奘在摩揭陀国考证阿育王国都波吒厘子城的建筑故事,故城遗址中的各样塔基、祠址和故宫北的石柱等,以及释迦金刚人定说法堂、竹林精舍等遗址,各种窣堵波遗址,摩揭陀国上第宫城周七十多公里、内城周超过十五公里的旧都遗址等,同时又记王舍城和宫城遗址,以及频毗婆罗王因失火而迁寒林,其后建城。因王先舍于此,所以叫王舍城。这样对外国逸事逸闻的认识与考察,绝非一般留学生所能做到的。<sup>①</sup> 当玄奘到迦毕试国,

---

<sup>①</sup>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卷九。

看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为各国质子所建的伽蓝,还有画质子容貌图画。从这段考古中,证实了当时迦腻色迦王的国势,南到了中印度。

至于对各地的石刻,如阿育王柱的形象和铭文,都有记载,可证玄奘对古代的印度文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

## (2)道宣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这也是唐代佛书中最特殊的一种。《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分上、中、下三卷,虽然是因信佛而有感应的故事,但许多故事,都是从考古中得到的。上卷记塔的二十条,中卷记造像的五十条,下卷记佛寺的十二条。这些记录,都不是仅据文献所能写出的。如:

·书中所记的孙恩起义,在东海岛上“筑城自卫,其处犹存,梁祖普通三年(522)重其古迹,建木浮图,堂殿房廊,周环备满,号阿育王寺……有碑颂之,著作郎顾胤祖文”。又记洛阳故都城西半公里白马寺南的阿育王塔。唐时已成古基址,金时重修,仍耸立在白马寺的东南。又“代州城东古塔”条中记“朔方马邑,古城大冢往往非一”,证之今日广武、阳高古墓群累累,与道宣所记者完全相符。

卷中造像五十条中,如《北凉河南王南崖素像缘》中记:“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之年(397),在州南百里山中凿窟造像,或塑或雕,千变万化。”证之今日,就是天梯山石窟群。《北凉沮渠丈六石像现相缘》中记:攻枹罕大败,下令毁寺,蒙逊至,杨述山佛像泪下。其中提到的杨述山佛像就是今日的永靖炳灵寺石窟。又记沙州东南十五公里三危山崖长一公里,佛像二百八十尊,就是今天的莫高窟石窟群。

卷下佛寺十二条中,如《枹罕临河唐述谷仙寺》记有“晋太始年(265~274)所立”的铭石,可证炳灵寺开凿的确切年代。“相州石鼓山竹林圣寺”条所记的就是今天的响堂山石窟。

道宣对佛教艺术考古的成就是最大的,他的记载全是根据实地调查,不然不会有“朔方马邑,古城大冢往往非一”的记录了。

### 3. 苏頲的《垄上记》与封演的《闻见记》

苏頲,开元中宰相,长于文学,所著的《垄上记》所记全是古墓与出土的古物,如虎邱之为阖闾冢,霍去病墓像祁连山,下马陵之为董仲舒墓,梁明昭墓出土的琉璃碗、紫玉杯,楚王冢出土的玉镜、玉屐,古书等。玄武湖古冢中出土的新莽威斗,证实了何承天说葬时“三公亡时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的说法,这些古墓调查与出土物的记录,应是十分重要的。

封演,代宗时人,少年曾入太学,后举进士,好古,通小学。如《闻见记》,卷二“文字”条,详述文字变迁。“石经”条又记由洛迁邺再运至长安的损失经过。“石志”条,记东都殖业坊主戎墓铭等,说明了墓志制度的流变。“碑碣”、“羊虎”条又是对古墓葬的研究。佛图澄姓是用石勒光初五年(322)所立碑证明姓氏。这又是用考古资料补证文献的不足。又《崇文总目》卷三记封演著有《续钱谱》,是继顾烜以后对古钱学的研究,惜该书已佚,无法知道封演在考古学这一方面研究的成就。

### 4.《三辅黄图》与《吴地记》

这两种书是唐代极其重要的考古书籍。

### (1)《三辅黄图》的考古学成就

《三辅黄图》，无论今天毕沅刻的六卷本或孙星衍集的一卷本，都应 是唐人的考订本。<sup>①</sup> 从《三辅黄图》中可以知道咸阳故城的遗址、汉长安城的遗址。汉宫阙遗址，以及苑囿池沼、台榭、太学、宗庙、市场、陵墓等遗址，书中所记的汉代造的牵牛织女像，至今仍祠于西安斗门镇以及东小村中。这样有系统地对汉代长安城和附近的考古，固然承袭了魏晋以来对长安城的考古，但唐人也是更细致地加以调查和研究。

### (2)陆广微著《吴地记》

《吴地记》是继《越绝书》之后，吴中地区最重要的考古书之一。内记阖闾城大城小城的里数，陆门、水门共十六，盘门内吴武烈大帝庙，东北一公里的孙坚墓、孙策墓，匠门东南一公里的汉吴郡太守朱梁墓、顾三老坟，齐门东的庐江太守关臻墓，平门西北一公里的孙武墓，西北一公里的汉濞城，东北一点五公里的颍川太守陆宏墓，吴县的庆忌墓和石碑，县东周瑜墓，横山东顾野王坟，以及姑苏台遗址、鸭城遗址、冯骀宅等遗址。嘉兴县有苏小小墓、朱买臣墓，以及常熟、海盐、松江各地古迹，各地的佛寺遗址等。该书调查与记录，较《越绝书》的考察，更为详尽。

---

① 在《隋书·经籍志》中，《三辅黄图》为一卷，在《旧唐书·经籍志》中也为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分上下卷，足证唐代对《三辅黄图》有了增加。今毕沅刻本作六卷，恐更非宋本之旧。由书中所说汉长安故城，或“宜春下苑在京城东南隅”以至如“东都不与专”的文句来看，都是唐人的语气，因此把《三辅黄图》列入唐代考古著作内。

## 5. 对各种文物的鉴定与收藏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流通,文物有了价格,因而较南朝时期的个人收藏更要推进一步。举其要者如下。

### (1)元行冲对古器物的鉴定

有人破古墓,得古铜器似琵琶,而人莫能辨。行冲说:“阮咸,考用木作成,弹之声音嘹亮。”<sup>①</sup>又沈既济《雷民传》记雷斧“长三寸,非铁非石,凿小孔而无柄”。这样形状的斧,应是石器时代人所用的石斧了。

### (2)隋唐收藏的文物

隋唐时代收藏的文物主要是美术品,尤其是书、画两种。当年这些文物已成为商品,因而太宗皇帝大购图书,藏于内府。关于书法方面,有钟繇、张芝、王羲之父子等书近四百卷,汉、魏、晋、宋、齐、梁杂迹近三百卷。<sup>②</sup>开元五年(717)十一月五日收缀大小王真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其中大王正书三卷,行书一百零五卷,草书一百五十卷;小王行书三十卷,正书两卷。<sup>③</sup>由于内府的收购,民间也多有收藏,钟绍京以数百万得右军行书。<sup>④</sup>“天宝中(742~755)商胡穆韦在书行中贩古迹。”<sup>⑤</sup>这足可说明当时美术品中书迹的价格,是如何高昂了。

关于绘画方面,也是自太宗时向民间购买,贞观十三年

① 《新唐书》,卷二〇〇,《元潜传》。

② ③ ④ 《法书要录》,卷三,引唐徐浩《古迹记》。

⑤ 《法书要录》,引唐怀瓘《书估》。

(639)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共二百九十八卷,写成《贞观公私画录》<sup>①</sup>,以后薛稷、岐王、王方庆等,俱有收藏。这样对古文物的收藏,已经扩大了许多。

### (3)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与《法书要录》

彦远自其高祖嘉贞以来,就有收藏,到张弘靖时曾把顾、陆、张、郑、田、杨、董、展,洎唐朝名家画,合三十卷,献于宪宗。<sup>②</sup>到彦远时由于几世的收藏,对书画鉴定极有研究,因而他总结上古以来的书画,写成《历代名画记》与《法书要录》二书,不仅记出历代的书和画,同时把历代画的特点,古今跋尾押署、公私印记、装褙裱轴、历代传统师承画家小传,一一写出。把古人论书的文字,具录原文,从后汉赵一非草书起,历晋、南北朝、唐诸大家的论书的文字,直到张怀瓘《书断》,最后记出《右军书语》四百六十五帖以及《大令书语帖》等,皆为释文。二书采摭繁富,汉以来逸文绪论,多赖以存,所以唐代以前评论书画无出其右者。

## 6. 拓墨术的发展

自南北朝发明拓墨以后,隋唐间更为发达。段成式记:“历城县魏明寺中,有韩公碑,太和中(477~499)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录州界石碑,言此碑词义最善,常藏一本于枕中,故家人名此枕为麒麟函。”<sup>③</sup>韩愈所写的《石鼓歌》云:“张生手持石鼓文,

① 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序》。

②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条。

③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三十二。

劝我试作石鼓歌。……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这些都是拓本的记录。近几十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了《九成宫醴泉铭》应是保存到现在的最早拓本。由于传拓术的发达,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更为推进一步。

## 小 结

考古学的发达,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联。魏晋以前,知识为剥削阶级所专有,当然史学不会发达,因而考古学也不会发达,所以西汉、东汉的考古研究,只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某些人在自己宗族血统有关的人中,彼此传授,如张敞、张吉、杜邺、杜林等人,他们对古文字加以研究,同时考订古文字,调查古遗迹,都是为了经史的考证与研究。

魏晋以来,阶级矛盾缓和,知识不完全隶属于极少数人,科学上又发明了纸,于是考古的范围也扩大了一些,对古文字的研究较汉代有了发展。除为小学打基础,用以研究经学外,又能运用古文字的基础,创造出新的书法。绢与纸的广泛应用,便于绘画的发展,也就由此来创造新的艺术品,这是与前代大为不同了。魏晋以来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农业分工得更细致,商品生产不完全隶属于奴隶主、地主,独立作坊的兴起,商品交换的发达,许多文物也有了价格,因而对古器物的研究,较以前更为进步。尤其是统治者的爱好,更引起了对书画的收藏和鉴赏。这种情势,势必引起两宋以来对金石的收藏与鉴赏,遂有金石学的兴起。

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手工业高度分工,商品生产一天天地增多,人们的物质奢望比以前更要扩大。知识也在门阀制度的破产下,扩大到中小地主的阶层中,因而读书识字的人多了,文化生活也因之更为扩大。史学的发达和成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许多史学家,如欧阳修、刘敞、司马光、宋敏求等人都懂得考古。这样就影响了考古学,同样也扩大了它的范围。对古器物、古书画、碑帖的搜集不仅是官府,而且及于私人。于是古器物、石刻、美术、考古之学大兴。据文献的记载,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古器物有了价格,因而发掘古墓者增多。叶梦得《避暑录话》云:

宣和间(1119~1125)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事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

欧阳修《六一题跋》中,也记咸、镐、周、秦故都荒基破冢中,

往往得到古器。<sup>①</sup> 吕大临《考古图》记古器物出土地点有：韩城、上洛、扶风、新郑、京兆、邕郡、夏甲城、漳河之滨、邠城、凤翔、盩厔、河南河清、好畤、京师、蒙阳、永寿、骊山白鹿原、冯翊、同州蓝田、寿阳紫金山、彭泽马山、洛阳、河内太行山、婺之兰溪、颍川、长垣等二十七处，并记有汉淮南王的故宫。这样大量的搜求下，除内府外，当时的大考古学家如刘敞、欧阳修、李公麟、文彦博、苏轼、李诫、吕大临等人，都有收藏。<sup>②</sup> 所以元祐七年(1192)吕大临作的《考古图》除内府古器外，还有三十六家。古器物散藏于私人手中，是前代所没有的现象，因而考古学的发达，也是前代所赶不上的。

古器物研究的盛行，主要以铭刻为主。传拓术因此更为发达，碑帖也势必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拓碑的风气极为普遍。欧阳修的《六一题跋》，就是把一生所集的古器铭文和碑碣的拓本末尾的跋语，集成十卷。黄伯思《东观余论》中的《法帖勘误》就是把秘阁的法帖作出考证。赵明诚《金石录》所记两千卷金石铭文，也都是拓本。这样大量的搜集，必定要有市场的买卖，《金石录》李易安题尾云：

侯(指明诚)年二十一，在大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范仲淹守鄱阳时，有一书生“献诗甚工”，但贫困得很，长安

---

① 欧阳修：《六一题跋》，卷一，“敦医铭”条。

② 董道：《广川书跋》；欧阳修：《六一题跋》。

荐福寺里有欧阳洵的碑。“墨本值千文”，范仲淹为“县币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sup>①</sup>。有这样发达的技术，因而有这种商品的出现，使研究史学和考古学的人得以扩大研究范围，更把唐人杜甫诗中所写的“峯山之碑野火焚，窠本翻刻肥失真”的翻刻碑文方法加以发扬。<sup>②</sup>南唐李氏刻《澄清台帖》、《升元帖》。北宋初，又刻了《淳化阁帖》，黄伯思因之作《法帖勘误》。宋人得到古铜器铭文，古石刻（如石鼓文、诅楚文、石经等）也都刻入法帖中。把古人遗文，化身千亿，搜集和研究都方便了许多，以致有金石学的盛行，成为考古学中最重要课题之一。

## 一、古器物图录的作出

宋代对考古学突出的贡献，不仅是传拓了古器物的铭文，同时又图画古器物的原形分类考证。这样来作出图录，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曾说出它的用处是：

每得传摹图写，浸盈卷轴……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

因而无论是研究古代各阶层的人民生活，还是补证历史故事，图录完全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 僧惠洪：《冷斋夜话》；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杂剧。

② 《杜工部诗》，卷十六，《李潮八分小篆歌》（《四部丛刊》影宋刊本）。

关于图录的作出,可以分几种:

### 1. 刘敞(原父)的《先秦古器图碑》

据欧阳修《六一题跋》记载,刘敞在长安得古奇器数十种,并著《先秦古器记》。翟青年《简史》中说刘原父有《先秦古器图碑》一卷(今已不传)。可见刘敞是北宋初最早的古器物收藏家、鉴赏家、古文字学家,同时又是作古器图录的第一人。<sup>①</sup>

### 2. 李公麟(伯时)的《考古图》

这本书是把古器物有系统地摹绘出的第一书(今已不传)。公麟善画,为当时名家,《宋史》传中记“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闻一抄品,虽捐千金不惜”。李公麟著《考古图》五卷,每卷每器,各为图叙,其释制作铸文,窥字义训及所用,复总为前序后赞,天下传之。<sup>②</sup> 所以吕大临《考古图》中释文考证,多引李氏图录。后来《宣和博古图》也是多引用李伯时的《考古图录》。

### 3. 吕大临的《考古图》

这是宋代以来研究古器物、流传到今天的最早的一部图录。因为吕大临通六经,邃于礼,习三代遗文,认为研究古器物,是为

---

① 《广川书跋》;《六一题跋》;《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刘敞传》。

② 《简史》,上卷。

“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所以他对古器物的研究，首先是按器分类。

- ①鼎
- ②鬲、甗、簠
- ③簋属
- ④彝、卣、尊、壶、罍
- ⑤爵属、豆属、杂食器
- ⑥盘、匜、孟、弩机、戈、削
- ⑦钟、磬、铎
- ⑧玉器
- ⑨秦汉器
- ⑩奩、书镇、镜、带钩

这些古器物的来源，除“秘阁”、“太常”、“内藏”等官府收藏外，又搜集了三十六家的藏品。把每件器物不仅摹其形，又拓其文，记出器物容量、尺寸、出土地方、收藏人家，然后加以考证，并引用当时古器物学专家杨南仲、刘原父、李公麟诸家学说。虽然分类上有些不够精密，名称上也有些错误，但在 11 世纪时有这样图录出现，是值得重视，而且也值得骄傲的。

#### 4. 黄伯思所撰《宣和博古图》及其他图录著作

这是宋代古器物图录最大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共三十卷（今刊本作二十八卷）。把内府所藏的古器物“图其形制而记其名物，录其款识，品其总说，以举其凡，而物物考订”<sup>①</sup>。

<sup>①</sup> 《真斋书录解题》，卷八；又见元陆友《砚北杂志》。

此图录共分二十类,六十一一种,分类定名较《考古图》更为详尽。同时每类有总说,每器图记大小尺寸、容量、重量、铭文或花纹,然后加以考证。器物时代起于商周,止于唐。

《宣和博古图》编纂的主要人物是黄伯思。李纲所撰《黄伯思墓志》中说:“在馆阁时……集鼎彝古器,考订真赝……所著《古器说》,凡四百二十六篇……悉载《博古图》。”《直斋书录解題》记有《宣和博古图说》十一卷,悉载《宣和博古图》内,足证今刊本《宣和博古图》的解说,是黄伯思作的。其他如董道政和间(1111~1117)在秘阁与黄伯思商榷法器名物,<sup>①</sup>米芾能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sup>②</sup>,也可能参加这样大部图录的编纂。

图画器物,考证铭文,用以解经证史,是前所未有的成就。至于定出许多古器物的名称(如卣、鬲、爵、觚、觥、角、罍),至今还不易其说,这部书在考古学上应是最重要的一种。

此外,南宋初有《续考古图》五卷,把私人收藏的古器物,图其形制,与《考古图》的体例同,又记出土地点、收藏人物、器物尺寸、铭文、容量,间有释文及考证,但并不分类。虽不及《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细密周详,也是图录中重要的著作。南宋洪适所著的《碑图》(今附于《隶续》内),把汉碑和汉画像石摹画出来,使我们对这些资料有更清晰的认识,也是图录中的又一题材。

另外还有《绍兴稽古录》,体例同《宣和博古图》,元时还有刊本。<sup>③</sup>《籀史》中,还记有《安州古器图》一卷、《青州古器图》一卷、《严真观古器图》一卷,今已失传,只有目录而已。

① 董道《广川书跋》卷末《毛子晋传》钩衡跋。

②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米芾传》。

③ 《直斋书录解題》,卷八;又见元陆友《砚北杂志》。

## 二、金石文字目录学的盛行

宋人考古学,除作图录外,就是金石文字目录的编制。用各样题材记录出搜集到的金石文字,并加以考释,这逐渐形成考古学中重要的一个门类——金石学。

### 1. 金石题跋与考证

唐代以来摹拓术的盛行,对拓本的收集比较容易,因而宋代收藏拓本,集录金石文字的人就多了。总计起来,如:

#### (1) 欧阳修《集古录》与《六一题跋》

欧阳修自序中记:“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欧阳公“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后,衔幅用公名印。其外裱以绡纸,束以缥带”。今所传的《六一题跋》,共四百四十八条,每一条中就是古器物铭文与古碑文拓本的跋尾。在短短的题跋中,包括器物、碑石的渊源,内容简短的考证,书法的优劣,等等。今本的《六一题跋》就是欧阳修《集古录》与欧阳棐《集古录目》的合刊本。

#### (2) 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和董道《广川书跋》

二书都是对金石文字和古器物的考证。《东观余论》上卷的《法帖勘误》,就是对碑帖、汉简、铜戈、古瓦、古器物和各种铜器铭文的考证,下卷是对古籍、古画帖等跋语的考证。《广川书跋》

也是对古铜器铭文、石鼓文、秦权、汉简等的考证。卷五以后,是对碑铭、实物的考证。黄、董于政和间同在秘阁鉴定古文物,批评欧阳公文章冠世,考校非其所长。所以《宋史》称赞黄伯思,考定真贋,为馆阁诸公所不能及。

其他如曾巩《南丰类稿》中《金石录跋尾》十四条,也是对石刻年代内容事实和撰书人的考证。

## 2. 编年体的金石目录

### (1) 赵明诚的《金石录》

赵明诚前后搜集二十年,上自三代,下及隋唐。凡古物奇器,丰碑巨碣,次其先后,共两千卷,编成目录三十卷。编排次序如下:

卷一~卷十:金石目,共两千条。

卷十一~卷十三:包括古铜器铭文拓本、石鼓文、诅楚文、玉玺文、秦泰山、琅玕台、之罘、峯山等刻石。

卷十四~卷十九:包括汉碑、铁量、砖等铭文。

卷二十:包括魏、晋、刘宋各碑。

卷二十一、二十二:包括北魏、隋各时代碑。

卷二十三~卷三十:包括唐、五代以及日本康保五年(即冷泉天皇安和元年,968)国诰。

《金石录》是第一部按历史年代有系统地编排金石目的书,同时不仅摘录文中重要的史实,又与史书互相引证,补充文献的不足。

## (2) 郑樵《通志·金石略》

这也是一本编年体裁的书,内容包括:

上代文字模刻,如《夏禹书》、《比干铜盘铭》等;

钱谱:三代以前货币(赣州尚有模本);

三代款识:见于《宣和博古图》;

秦石鼓文、泰山刻石、诅楚文等;

两汉碑铭;

三国碑铭;

晋代碑铭;

两朝(南北朝)碑铭;

隋代碑铭;

唐(上)碑记;

唐(中)碑记;

唐(下)碑记;

唐六帝碑记;

唐名家碑记。

秦汉以下碑记,俱有年代、地址,也是编年体中最有系统的金石目。

## 3. 以地为纲的金石目

### (1) 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

该书分郡编次,各注其地址、年月、撰著人姓名以及简单内容,此碑目从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中碑目抽出刊行,共四卷,

由临安府起到龙州止。仅限于南宋的版图,计:

卷一:包括今苏、浙、皖、赣四省,共二十一州、府、军。

卷二:包括今苏、鄂、湘、皖、桂五省,共四十二州、府、军。

卷三:包括今闽、粤、桂、贵、豫一部等五省,共五十八州、府、军。

卷四:包括今川、陕南、黔二省,共五十八州、府、军。

碑文包括神道、墓志、庙碑、纪功、纪事、题记、石经、赞文、榜题、塔记、像记等题材。

## (2)陈思的《宝刻丛编》

该书把全国分成二十七路(如京畿、京东东路、京东西路等),每路中分府、州、县,每府、州、县中,俱有碑刻。根据当时金石书二十六种,分类排比,先记出碑、帖目,然后据某一书中记录,记出碑刻地址、撰书人姓名、年月以及内容故事的摘录。该书根据各金石书,集录出每一碑的内容与考证,以地理为纲,应是宋代最好的一部金石目。

## 4. 以人为纲的金石目

南宋末编成的《宝刻类编》共八卷,上自周秦,下及五代。“其书为类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诸王,曰国主,曰名臣,曰释氏,曰道上,曰妇人,曰姓名残缺。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其所书的碑目,其下各系以时、月、地名,且于名臣类取历官先后之见于石刻者,胪载姓氏下方以备参考。”<sup>①</sup> 该书虽比不上《宝刻丛编》精细,但也是金石目中特殊的一种题材。

---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六,“宝刻类编”条。

## 5. 录出碑帖全文的金石书

### (1) 洪适的《隶释》与《隶续》

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乾道二年(1166)时书成,专搜集汉、晋碑拓本,区别为五种书。洪迈《隶续·序》中记:“译其文,又述其所以然,为二十七卷曰《隶释》。书法不必同,人视之无如也。则皆毛举十数字,刊诸石曰《隶续》。其字同,其体异,参差不可齐,则倚声而汇之曰《隶韵》。龙、龟、爵麟、九尾之狐,琮、璜、璋、圭,名物怪奇,凡见之于扁颜者,各肖其象,曰《隶图》,亦既释之而又得之,则列于廿七卷以往,曰《隶续》。”

《隶韵》未成,《隶续》不传,今存者只《隶释》、《隶图》、《隶续》三种。《隶释》上自建武,迄于黄初、青龙,而以张平子一碑殿之。内容为:

卷一~卷十九:洪适自己收藏的汉碑拓本。

卷二十:《水经注》中记汉碑部分。

卷二十一、二十二:《集古录》汉碑部分。

卷二十三:欧阳棐《集古录目》汉碑部分。

卷二十四~卷二十六:《金石录》汉碑部分。

卷二十七:《天下碑录》汉碑部分。

十九卷以前不仅把汉碑全文录出,同时又有跋尾考证,十九卷以后,抄录《水经注》、《集古录》等原文,共一百八十九条。

《隶续》就是继续《隶释》的汉碑录文,同时今刊本又把《碑图》放进去,又有汉砖、镜铭抄出,并加以考证。

这样抄录碑文加以考证的题材,也是宋代金石书中独有的

一例。

## (2) 刘次庄《法帖释文》

该书“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篆题而增释文”。<sup>①</sup> 编次与《宝刻类编》相同，以人为纲，记帝、王、名臣、释氏、王羲之、王献之等人，共十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著作。

## 6. 金石书目

翟耆年的《籀史》，是宋代最早的一部金石书目，把宋代研究古器物、古文字的书籍，作一全面的介绍。上卷共十九种，下卷共十五种，除介绍出书目以外，又摘要记出内容，并加考证。如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今虽失传，然可知赵明诚对古器物也是极有研究的人，并且是最大的收藏家。可惜下卷逸失，书目提要无从见到，今只可看到书中所提到的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至于翟氏《三代钟鼎款识》三卷，现在也无法见到了。

除以上六项金石目录外，还有田概辑《京兆金石录》六卷（已失传，见《宝刻丛编》），郑昉集荆、襄、川、蜀等地金石，著《五路墨宝》（见《清波杂志》），刘泾辑《成都刻石总目》三帙（见陈祥裔《蜀郡碎事》），叶梦得辑《金石类考》五十卷等。

以上各种不同题材的金石目录的写出，奠定了金石学的基础，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考古学的人必要的参考书籍。

---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帖释文”条。

### 三、金石文字的研究

#### 1. 宋代金石学家及其著作

考古学盛行,使古文字的研究者也日渐增多。宋代对金石文字的研究,较前代也有显著的成绩。

##### (1) 郭忠恕的《汉简》

这是宋代最早对古文字进行研究的一部书,所用的材料,凡七十一家,由《古文尚书》到《玄德观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分部从《说文》之旧,所征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其分隶诸字,即用古文之偏旁,与后人以真书分部,案韵系字者不同。”这样将古文大篆与释文相结合的著作,还是许慎以后的第一部书。同时最值得重视的是每个字都注出来源,这在考古学上又是许慎《说文解字》所赶不上的。

##### (2) 刘球《隶韵字源》与姜机《汉隶字源》

《隶韵字源》共十卷(清嘉庆时秦恩复据宋拓本重印),内容分韵、辨字,如“东”字有十六种不同的写法,每一种下,注出碑名的出处,与徐铉《说文解字篆韵谱》的体例相同。引用汉碑,由武帝到灵帝,共一百七十七种。

《汉隶字源》体例与《隶韵字源》同,内容分考碑、分韵、辨字三例,另有碑目一卷。“凡汉碑三百有九,魏、晋碑三十有一,各

纪其年月、地理、书人、姓名，以次编列，即以其所编之数，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sup>①</sup>，所采“汉隶”多用刘球的《隶韵字源》。

### (3) 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与王隸的《啸堂集古录》

这两部书是专摹写金石文字的。薛尚功，绍兴中人，摹写《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其中包括三代钟鼎彝器、石鼓、兵器及秦玺、权、汉钟、甬、铉、鼎、铲、壶、律管、洗、钺、匱、镗、铎、烛槃、釜、甗、弩机等铭文，引用北宋以来李伯时、吕大临等人《考古图》、《博古图》、《集古录》、《先秦古器记》等器物铭文，同时又在每一条后俱加考释，说明历史上或经籍中的各种问题。

《啸堂集古录》据李邕序中说：“王隸自幼至今，每得一器款识，必模本而投之篋。”该书由商、周铜器铭文到汉鉴洗文，以至汉印三十八方，共三百五十二条，上为摹写的原文，下为释文。从萧山朱氏藏宋刊本中，可以看到摹写得几无毫发之差，对书法方面，更为有益。

又有李诫著《古篆说文》十卷、蔡肇著《钟鼎款识》三卷、牟益著《钟鼎辩证》等，也都是对金石文字的研究，可惜现在都失传了。至于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收商周及汉晋铜器铭文六十件，校以博古、法帖、《赵明诚古器物铭》，写定释文，每款加盖“复斋珍玩”、“厚之私印”等图记。清阮元摹刻成书。

---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一，“汉隶字源”条。

## 四、书画玺印的搜集与研究

### 1. 宋代书画玺印的研究著作与作者

宋人考古,除金石学外,还有对书画和玺印的搜集与研究。在考古学中,这是较唐代更为进步的美术考古的新题材之一。主要的著作如:

#### (1)《宣和画谱》

该书集中秘府藏魏晋以来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分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等十门。由吴曹弗兴起,历晋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以至隋唐诸大家的作品,都有搜集。每一个人的作品,不仅记出画目,同时又给画家作出短的传记,共二百三十一人。崇宁初(1102)命宋乔年,值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继以米芾辈。<sup>①</sup>米芾精于鉴赏,著有《画史》,对美术考古,颇有精到处,《宣和画谱》虽称徽宗御撰,其实米芾之辈一定参与这项考古工作。

#### (2)《宣和书谱》

此书共二十卷,记宋徽宗时内府所藏诸墨迹。首列帝王诸书,次列“篆隶”、“正书”、“行书”、“草书”,末列“八分书”及“制诏”、“诰命”。其中包括“帝王”十一人、“篆书”七人、“隶书”一

---

<sup>①</sup> 蔡条:《铁围山丛谈》。

人、“正书”四十六人、“行书”五十八人、“草书”六十人、“八分书”四人。题材与画谱相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宣和之政，一等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今书所载王羲之帖，仅二百四十有二，王献之帖仅八十有九，颜真卿帖仅二十有八，盖其著于录者，亦精为汰简，鱼目之混罕矣。”当时如蔡京、蔡卞、米芾等人，都精于对法书遗迹的考订，所以此时期的美术考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 (3) 米芾的《海岳题跋》

由毛晋辑其七则，每一条对帖、卷真伪溯源，俱有考订。又附《宝章待访录》目睹者记五十六条，闻者三十一条，对书画作品的渊源流变及藏印加以考释。所以毛晋说：“凡法书名画，一经米老品题，则巧伪不能惑，临摹不能乱。”所以米芾的确是宋代书画考古的专家。

### (4) 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

此书共八十四方，首先是“纽制”五种，以下“汉王印”二，“侯印”八，“公印”一，“太守印”四，“杂印”（官私印章）六十九，每一印下有释文，并加考证，可以证当时设官分职废置之由。又王氏印谱为元时吴孟思手录，其中一小捺，似巴思巴文，或者是吴氏所后加入者，另外有一印为“端居室”，考证是“唐相李泌”印。如不错误，又不仅限于汉晋了。

## 五、泉币学及其他古器物的研究

### 1. 泉币学研究

#### (1) 洪遵《泉志》

泉币学,除顾烜《钱谱》、封演《续钱谱》外,据《泉志》所引的,还有宋代金光袭的《钱宝录》、李孝美的《钱谱》、董道《钱谱》等著作。《泉志》共十五卷,分为九类:

正用品——由上古到五代官铸钱。

伪品——五代以前篡位者所铸的钱。

不知年代品——如平当五铢、两铢等不知年代的钱。

天品——据文献记载天雨钱等渺茫的传说。

刀布品——历代刀布。

外国品——文献记载各国的钱币。

奇品——如四神钱、龟背钱等。

神品——如《洞冥记》所记的轻影钱、南齐《祥瑞志》中所记的青溪宅钱。

厌胜品——如永安五男钱、五男二女钱等。

这样分类方法,很不妥当,只是材料丰富,后代研究钱币的都拿它当作重要的参考书。只是今本,明代重刻时补了许多图,反成了本书的拖累。但对古钱币的研究,洪遵还是初步地奠定了基础。

## 2. 其他古器物研究著作

### (1) 赵希鹄的《洞天清录》

书中考古部分,如“古钟鼎彝器辨”条所记,“水土传世三等古铜器”入土千年色纯如翡翠。铜器堕水千年,则纯绿色而莹如玉,未及千年绿而不莹,流传人间色紫褐而有朱砂斑、凸起如土等辰砂,入釜以沸汤煮之,良久斑愈显,并有铜腥。又有区别款识法,“蜡模”铸器法,“伪古铜器”制作法等。《古翰墨真迹辨》中用南纸竖纹、北纸横纹,以证二王真迹多用竖纹纸,唐人以硬黄纸写经,因而辨二王真迹用硬黄纸的是唐人仿书。《古今石刻辨》中记什么叫响拓,拓北碑用横纹纸等。《古今纸花印花辨》详辨《淳化阁帖》、《绛帖》、《潭帖》、《太清楼帖》、《汝州帖》、《淳熙秘阁续法帖》、《兰亭帖》等。《古画辨》中,如辨河北、江南不同的绢,辨古画的颜色,以及名画印识等。这些鉴定古物的经验,今天在我们考古工作中,依然被看作是最宝贵的经验。

其他如刘昌诗《芦浦笔记》中有“元和三年(前91)五月甲戌朔谢君砖”、“建武二十八年(52)北宫卫令扈君万秋宅砖”等对汉圻砖的记录。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记皇祐中(1049~1053)在杭州西湖得古钟事。卷十九“器用”条又有对铜器花纹中的黄日、云雷纹、古刀、矢、弩机、剑、鉴、唐肺石、顺天得一钱、始建国铜匱、金陵六朝陵墓出土的玉簪、古印章、大驾玉辂等的记录与考证。赵彦卫《云麓漫钞》又有对新莽货币、古印文、太平五铢、古碑形状、峰山碑考、唐印章、山阴古砖、寿亭侯印、新莽律权石、宣和(1119~1125)中陕右得汉木简的记录与考证。

以上这些著作,也都是在宋代考古学盛行的风气下,各种古器物都能得到重视,以至有许多的记录与研究,甚至对鉴定古物,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 六、对古城古迹的调查与研究

### 1. 古代建筑遗址的调研著作及作者

宋代除对古器物特别有研究外,其次对古代遗址,依然是很重视,并加以调查和研究。主要作品,如:

#### (1)宋敏求的《长安志》

全书二十卷,敏求以韦述《两京新记》疏略不备,因考订长安古迹,参校成书。虽然用写地方志的题材,有“分野”、“土产”、“风俗”、“四至”、“管县”诸条,唐以前的宫殿遗址,多参酌史书。但隋唐的西京,宫室、庙宇,纤悉毕具。城市坊曲及唐上大夫宅第所在,都能一一举出,粲然如指诸掌。这样仅据文献,是不可能写出的,惟有文献石刻与调查配合,才能很详尽地记出隋唐西京当时的盛况。无怪司马温公以为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

#### (2)张茂中的《游城南记》

该书是把唐代西京城外郭城内朱雀门大街东西坊里的名胜,如对荐福寺、慈恩寺、曲江池、玄都观等遗址作了考察,并详记遗址的现况,如出外郭城的启夏门,调查杜光寺以及仇士良、郭子仪、长孙无忌、萧灌、吐蕃拔川王论弓仁等墓;下勋阴坡入牛

头寺,观徐上龙撰碑;至皇子陂,观坡北原上秦皇子冢;到韦曲观韦师锡逍遥公读书台;过潏水,游范公庄、杜佑故居;憩华严寺,调查延兴废寺;至兴教寺观玄奘等三塔;过樊乡,览牛僧孺故居;登少陵原下观三像寺大佛,循原而东到郑氏莲花洞;南行至幽州李氏庄,然后北归入城。这样的游历,对唐西京城南的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因而可以了解到唐代都城附近的社会概况。

### (3)乐史的《太平寰宇记》

此书也是地志的题材,记某一地区的四至、户、风俗、姓氏、人物、土产等,并对遗址也是十分重视。例如记开封县遗迹中的吹台、开封故城以及樊於期、张仪、张耳、荆轲等墓。虽然不能说是亲身的调查,但在地志中大事记录古迹古墓,对考古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 (4)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

全书共两卷,分总叙、形势、城阙、楼台、江河、山冈、宅舍、纤记、灵异、神仙、寺院、庙宇、坟陵、碑刻等十四门。其中“总叙门”中“六朝建都”、“六朝宫殿”、“六朝郊社”诸条,不仅引用文献,同时还对照遗迹作出考证。又“城阙门”中的台城、石阙,“楼台门”的景阳楼、卫玠台、周处台、白下亭等,都是根据遗址写出的。“山冈门”中的千佛岭、谢安墩,“寺院门”、“庙宇门”、“坟陵门”等各门中的各条都是根据遗迹或碑铭记出的。至于“碑刻门”,每条都记出地点,又是最重要的一项。因而张敦颐序中记:“因览图经实录,疑所在六朝事迹,尚有脱误。乃取吴志、晋书及宋、齐而下史传,与夫当时之碑记,参订面考之,分门编类,缀为篇目。”其实张氏不仅参考文献,同时又极重视考古资料,所以,不能以

一般的地志书来评论这部著作。

#### (5)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全书共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卷一记东京的城郭、河道、大内、内外诸司、地址;卷二记御街、坊市;卷三记各别坊市及寺院地址等,从其中可以看到东京城遗址的各方面,以及社会生活的内容,较公主出降、皇子纳妃的朝章国制更为重要,与《洛阳伽蓝记》可以媲美。

其他如吴自牧的《梦粱录》、无名氏的《都城纪胜》,都是对南宋临安都城的追记与考察,与《东京梦华录》的体例相同。

#### (6) 孔传的《东家杂记》及其他著作

传孔子四十七代孙,建炎(1127~1130)初南渡,流寓衢州,官知抚州事兼管内劝农使。淳熙(1174~1189)中写成《东家杂记》,卷下记先圣庙的位置杏坛遗址,先圣小影,庙中后汉碑三、魏碑三、齐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庙外鲁城西隅有孔子旧宅,庙西南有鬻相圃,南十里为阙里。“祖林古迹”条有先圣墓、孔林,林中篆字断碑一,汉碑九,宅图,庙壁吴道子画,伯鱼、子思墓,冢前祠坛、庐墓等遗址的记载与考证。关于孔庙、孔林的遗迹记录与考证,孔传写出的比较正确而详细。

其他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所记,吕大防命户曹刘景阳、按视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以两寸折一里,作出太极、大明、兴庆三宫图及汉都城、隋都城图。把汉、唐都城作出平而图并加以考订,刻之于石,这是都城考古最新的一种研究法。沈括的《梦溪笔谈》记金乡朱鲋墓的画像石、延州天山奉国寺内积炭墓的内

容,颇为详细。这些都是对古城古墓的调查与研究,也是今天我们做考古工作的人必读的书籍。

## 七、对古礼乐器的翻制与法帖的翻刻

宋代社会对古器物书画的重视与研究,出现了古器物的翻制与法帖的翻刻,以至有真伪鱼目之混。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 1. 对古礼乐器的翻制的研究

#### (1)阮逸、胡瑗的《皇祐新乐图记》

仁宗皇祐五年(1053)阮逸、胡瑗奉敕铸成编钟、特磬、编钟、编磬、晋鼓、三牲牛羊豕、鼎、鸾刀等。因按实物分上、中、下三卷,作成《皇祐新乐图记》。

#### (2)政和礼器的铸造

据孙诒让《宋政和礼器文字考》,收入宋徽宗政和(1111~1117)时所铸的礼器,有牛鼎、铜鼎、甲午簋、欽崇豆、天锡簋、嘉礼尊、政和洗、鸡彝、牺尊、山罍等器,铭文也都是用古文的。所以欽崇豆铭文十五字为古文,宋人薛季宣认为是商器。孙诒让说:“绍兴二十七年(1157)得于延陵,上距政和乙未不逾四十年而误以为商器,足证政和礼器,南宋初人已不能辨识矣。”无怪今天对古铜器鉴定极为困难,且易于乱真了。

## 2. 法帖的翻刻

### (1)《淳化阁帖》的摹刻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曹士冕《法帖谱系》中俱说：“太宗朝搜访名人墨迹，令王著诠次，用枣木板摹刻十张于秘阁，每大臣登进二府，则赐之。”于是魏晋书法，传布天下。到庆历（1041～1048）间，禁中火灾，帖板不存，所以流传下来的法帖摹刻最早的应是《淳化阁帖》。

### (2)《太清楼帖》的摹刻

《淳化阁帖》板，虽禁中火灾，而真迹皆藏御府，徽宗大观（1107～1110）时以御府所藏真迹重刊于太清楼，又参入其他真迹，主要的是《兰亭序帖》。

### (3)《绛帖》、《汝帖》及其他法帖的翻刻

禁中以外的是绛州潘舜臣（《法帖谱系》作潘师旦）用《淳化阁帖》重模而参入别帖的《绛帖》。以《绛帖》为基础，又加重刻的，有东库本、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武冈旧本、武冈新帖、福清本、彭州本、资州本等。<sup>①</sup>

又汝州王寯摘诸帖中字，牵合为之，刻十余石，叫作《汝帖》。黄伯思说：“杂取法帖、续帖所有者时载之，又珉玉间簪不能辨

---

① 曹士冕：《法帖谱系》。

也。”<sup>①</sup>

所以《汝帖》的价值与《绛帖》是不能比的。

除《绛帖》、《汝帖》外,还有庆历中刘沅在潭州以《淳化阁帖》作底本所刻的《潭帖》,以及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依长沙帖而刻的蜀本、涪陵萧氏本等。

南宋时代禁中刻的,还有绍兴国子监本(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和淳熙十二年(1185)修内司奉旨刻本。

以上是宋代对墨迹摹刻的主要法帖。摹刻可以乱真,使今天还能看到许多魏晋人的墨迹,这对考古学上的功绩应当是很大的。

## 小 结

两宋考古学的发达是前代所不及的,尤其是对古器物、古文字、碑刻目录的研究都能影响后代。宋代古器物学、碑刻目录学所以兴盛的原因,已在本章开始阐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达,交易的频繁,行业的独立,如《东京梦华录》中所记开封城内,州桥夜市、东角楼、潘家楼东街巷、马行街北医铺、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相国寺万姓交易、马行街铺席等项目来看,宋代小手工业者、商业交换者是如何之多。整个都城的繁荣,全在这些工商业上,势必影响到相国寺佛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等商品,以至赵明诚夫妇经常要到这里买古器物 and 拓片。古器物既有市场,收藏者必不限于少数人,自然研究古器物的人加多,因而有金石学的兴起。金石学的兴起与宋代史学空

---

<sup>①</sup> 黄伯思:《东观余论·汝州新刊诸帖辨》。

前的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文化生活的扩大,促使史学发展,史学的发展,自然促使金石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形成,又转过来影响史学的发展。所以史学与金石学的研究方向,也不像以前那样狭窄,金石学势必促进对古器物、碑刻目录学研究的成就出现。当时每一项的研究,都奠定了后代考古学的基础。直到今天,考古学上古器物图录的作出,金石文字目录的作出,冢墓遗文的抄出,金石文字的研究,书画、印玺、货泉、砖瓦、镜鉴的鉴定与研究无不受到宋代考古学的影响。所以宋代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发达的时期,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前,在考古学发展史上,宋代应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 一、元代的考古学

两宋以来,考古学(包括金石学)迈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直到南宋后期,统治者们还对金石学起了大的促进作用。可是蒙古族进入生产力进步的中原,大量没收土地为官田,实行残酷的剥削,或至使用奴隶劳动。手工业集中了俘虏的工匠为少数贵族生产,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自由经营。这使宋代的生产方式多少受到打击。加以元代皇帝和贵族们,对汉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虽然也能重视,但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在阶级的社会里,统治无论如何黑暗,剥削如何残酷,反映生活的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意识形态,都有进步与黑暗的两方面。进步的艺术,就是代表人民的愿望。所以元代的上层建筑都有一些是进步的、精美的内容。可是考古学,如果没有安定的与文治的社会,是没法展开的。因而元代自灭宋到明兴,前后八十七年的短短时间内,考古学的发展是没法赶得上宋代的。总计起来,约有以下几项:

## 1. 对古玉器的搜集与研究

朱德润的《集古玉图》仿宋代《考古图》的体例,把他在燕京诸王公家所见到的古玉,画出原形,记出尺度、质料、用途。分为璧、环、璪(环类)、钩、佩、珮、锁、充耳、辟邪、马、琢、杯、琫、刀柄等类。由于朱德润是当时的大画家,所以古玉图画得很真实。虽然其鉴定力不够高,如把春秋战国式的带钩,当作商周玉钩,但就对玉器作出图录来说,还是发凡起例的工作。

## 2. 金石与金石文学的研究

### (1)陶宗仪的《古刻丛钞》

本书仿宋洪适《隶释》的体例抄出碑刻原文,随得随录,没有年代的次序,其中汉“建平五年”(前2)、“永元六年”(94)刻石、“永初二年(108)讨羌檄简”摹本,俱有跋语。还有许多碑刻,为前代所未收,因而,很可补史传的不足。

### (2)吾邱衍的《学古编》

本书主要是为篆刻印章而写出的,因而开始举出三十五种印文,附录有“洗印”、“印油”、“取字等法”、“摹印四妙”等条。但为了篆刻印章,而记出研究钟鼎款识的薛尚功书、秦汉的碑刻、各种铜器及器物图录书与研究古文字等书,更辨《延陵季子碑》为汉人补刻,及《泉志》中三皇、禹等币之伪。此外,本书还汇集历代研究古文字的《汉隶字源》、《佐书韵编》等书,以及辨明蝌蚪

书、款识文等等。虽然作者本意不在考古,可是确实收到了考古的效果。

另外吾邱衍的《周秦刻石释音》也是研究古文字的一种著作。对石鼓文、诅楚文、峄山刻石等文字,加以辨识,然后把唐苏勔以来,记载石鼓文的张怀瓘、徐浩、韩愈、赵明诚、郑樵等二十三家的著作抄出,作为参考。本书虽然没有多少创见,也应是这一代中对古文字研究的一种著作。

### 3. 美术考古学家的著作

#### (1) 美术考古学家周密的《云烟过眼录》

周密,宋末元初时人,平生过眼书画文物极多。他把所过眼数十家的收藏品都记录出来,又把每一作品的状况以及内容如跋尾、押署、印章等都详细写出。所录的范围很广,由书画到鼎彝、刀剑、铜符、玉器、瓷器,尤其书后部分对古琴的记录更为重要。对古物鉴定上的功夫很深,应是一种宝贵的参考资料。

#### (2) 汤垕的《古今画鉴》

汤垕与柯九思同时,据《句曲外史》(张雨)的序中记:“采真子妙于考古,在京师时与鉴书博士柯君、敬仲论画,遂著此书,用意精到,悉有依据。”汤书分吴、晋、六朝、唐、宋(元附)五项。每一项下,以人为纲,在某一人下,记出作品名称,以至印章、题跋的考订,等等。汤垕也应是元代美术考古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 4. 考古杂志性质的著作

##### (1) 陆友仁的《砚北杂志》

陆友仁《砚北杂志》自序中记：“余生好游，足迹所至，喜从长老向前言往行，必谨识之。”因此内容复杂，体例不一。如记陆家收藏的唐元和三年(808)某县摄令李谅印，辩证金人马定国考石鼓为宇文周时所作的错误。记“政和中(1111~1117)丹阳县北地名石羊子，有盗发古冢者，云是梁宏偃将军墓……墓有四室在旁，中一室四厦开”，以及陕西宝鸡附近秦羽阳宫瓦等。这样的考古记录，虽不是单独对某一类古器物的研究，但也是做考古工作的人必读的一种书籍。

##### (2) 南村的《辍耕录》

南村先生的《辍耕录》，固然不像《砚北杂志》那样专，是一种考古学杂志，但如卷二的“国玺”条，卷四“记盗发宋陵寝”条，卷五的“兰亭集刻”、“法帖谱系”、“评帖”、“淳化祖石刻”、“楔帖考”诸条，卷十五的“淳化阁帖”条，卷十七的“古铜器”条，卷十八的“宋宫殿”条，卷二十一的“宫阙制度”条，卷二十三的“书画裱轴”条，卷三十的“印章制度”、“传国玺”诸条，也都是对古遗址、墓葬、古器物 and 美术考古的记录(包括抄录前人的)与研究。

## 5. 古遗址、墓葬的调查与研究

### (1) 乃贤的《河朔访古记》

至正五年(1344),乃贤由浙渡江淮,历齐、鲁、陈、蔡、晋、魏、燕、赵等地,遍游山川、城郭、陵墓、宫阙后加以考证,笔之于书共十六卷。<sup>①</sup>今仅据《永乐大典》抄出常山、魏郡、河南三郡的调查记录。在乃贤的调查中,如真定城不仅记出开元寺、临济寺等古寺院,而且记出李宝臣、王武俊等《纪功碑》,恒州刺史《陶云碑》,定武《兰亭石刻》等。相州则记洹水南岸的河亶甲城遗址,及城内《画锦堂碑》。“洛阳”条不仅记出北邙的汉陵,而且记出洛阳金石刻九十三通。像《河朔访古记》这样对古遗址、墓葬、碑刻的调查,应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一部考古著作。

### (2) 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

全书共分十卷,其中分京城、宫殿、室庭、明堂、辟雍、苑囿池台、堂宅亭园、街市里第、寺院庙祠、城阙古迹、山陵冢墓、石刻等项。天骧元时在西安做儒学教授,许多遗址与石刻都是亲身调查与考订,所以这部著作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不亚于宋敏求的《长安志》。

### (3) 李好文的《长安志图》

本书是根据吕大防《长安图记》而芟除补订者,今本有汉唐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

旧城、坊市、禁苑、城南名胜古迹、唐骊山宫殿等图,以及咸阳古迹昭陵、乾陵、建陵以及泾渠,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等十七幅图。同时对汉长安城、唐宫城、皇城、坊市及宋元以来的变迁,加以研究和考订。对昭陵、乾陵俱有解说。图志“杂说”中,完全是根据调查而写出的。如汉长安城作斗城的研究,说明是依自然形势而筑起的。对秦汉瓦当进行研究:汉瓦有绳纹及雨点纹;秦瓦长二尺许,广六七寸,遍作绳痕;唐瓦如漆,对城南遗迹逍遥园(不在圭峰)、唐掖庭宫等遗址的调查与考证。此外,对秦陵、杜陵、华山碑、华萼楼碑、右军碑等地进行调查与考证。好文的《长安志图》虽然没有宋敏求的《长安志》详而博,但宋多是依据文献,而李则纯系亲身调查与采集,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应是高于宋志的。

其他如周密的《武林旧事》,是宋亡以后,追记宋南渡的都城杂事,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题材大致相似。

## 二、明代的考古学

明代统一中国以后,首先是解放了元代的奴隶、农奴和工奴为自由民,同时令流民复业开垦荒地,流民还乡,不限旧田。另外扶植工商业,废除宋元以来的苛捐杂税。因而在宋代商品经济生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如苏州、杭州一带丝织业,松江一带的棉织业,景德镇等地的制瓷业,都有显著的发展。对南洋各地的贸易,也十分繁荣,这样使宋元传统的城市更加发展,北京、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都市,其他还有大商业都市近三十余处。农业生产的提高,为工商业提出有利的条件;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农产品商品化。整个社会经济都处于商品

生产经济中。当然在宋元传统下的各样古器物的价格较宋代更要提高,收藏家也更要集中一些。如严世蕃的收藏据没收后统计的数字,仅魏、晋、六朝、唐、宋、元、明各名家书法作品一百三十六件,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各家名画作品二百九十九件。其他铜器、瓷器等,不在这数字以内。秀水项无汴,也是最大的收藏家,这是宋代收藏家所赶不上的。在科学考古发掘没有发生以前,明代金石学和美术考古虽然赶不上宋代,但也应是相当发达的。

## 1. 金石学的研究

### (1) 石刻文字的题跋与考订

有明一代对石刻文字的搜集与研究,万历(1573~1619)时代的赵崧,应是最有成绩的一个人。他所著的《石墨镌华》,自所谓夏禹衡岳碑(近代考订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字)起,到元盩厔道德经碑止,共二百三十五种。《自序》中说:“以余三十年所收,虽过都(穆)杨(慎)而视欧才三之一,视赵不能十之一。”但赵还能自豪的是“自宋元以下,往往有二公所不及收者,即诸公书亦自有互异”。如汉五凤二年(前56)残石,记出土在灵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钓鱼池中,金天会十二年(1134)郎君行记摹出女真文,重阳万寿宫至正十八年(1358)白话碑中摹出的巴思巴文。这都是在考古学上正确的态度,较仅以文字为依据而略加考证的要好得多了。赵崧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曾亲自到各地调查,所以书末附有《游终南》、《游九峻》、《游城南》三文。

此外与赵崧同时的华州郭宗昌,也是关中石刻研究的大家,

著有《金石史》，但所收仅五十三种碑。主要的还是唐代关中的碑铭，可是唐《丰峰禅师碑》，还没记出地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郭“迂僻好异”应是正确的评语，所以虽名为《金石史》，实在不过几条跋语而已。盛时泰的《苍润轩碑跋纪》收集由汉以前到元共一百八十二种碑，虽无多少精到处，但宋元诸碑，前人未能涉笔，也是相当有价值的。至于钱塘沈兰先《淳化阁帖跋》，记出《淳化阁帖》，明时只有两份，在秀水项家与梅里李家，互以千金相求而不相让。因号《千金帖》，还记载阁帖有“臣王著模”四字等资料，也都是相当重要的。

## (2) 以地为纲的金石目

如来濬的《金石备考》、于奕正的《天下金石志》、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等，都是以地为纲记出的碑目，仿南宋陈思的《宝刻丛编》，但这几个人所集的碑目，并不见得精到。如来濬因系关中人，所以陕西省的碑目收得最多，但所见《岷峨碑》的地址，“或云在夔门”，甚至说“蜀士因樵者引，见七十二字，寻失所在”，这足证是依靠拓本而未能作实地的调查。至于奕正生平未出国门，晚年始一游江南，见闻不广，因而《南武昌功曹铭》不知在山东平邑，《武阴令高君墓阙铭》不知在四川雅安，《交趾都尉沈君神道碑》不知在四川渠县。周弘祖的碑目又可能多是根据文献，如《王戎墓铭》，早见于唐宋各书。李商隐的《白居易墓碑》，并没有见过。《唐三藏法师塔铭》在长安城南兴教寺，误为白水县。《西岳庙碑》在华阴县，误为华山。这些讹误都由于未能像赵岫那样亲自游历，负褚墨，遇碑即拓，当然所收集的碑刻，也不会如赵岫那样可靠了。

### (3)以时为纲的金石目

叶盛的《棗竹堂碑目》——叶氏正统乙丑(1437)进士,平生扬历中外,不遑宁居,而见异书。虽残篇蠹简,必依格缮写。储藏之目,为卷止二万余。<sup>①</sup> 碑帖收藏亦富,碑目以时代为次序,每一条下记出地址、年月、撰书人名。全书共六卷,五代以前分三卷,所记碑目较少,卷四记宋代碑目较多,卷五记元代碑目最多,卷六集宋明各帖及刻图。宋元碑目之多,前所未有。所以叶盛的碑目,是相当有价值的。

朱晨的《古今碑帖考》——也是按时代次序编排的。如汉代又包括了钰铭。唐代碑刻,分为碑、颂、碣、铭、志、记、佛家碑、佛铭、佛记、道家碑、道家铭颂、祠庙、宫宇、山水题名等十四类,元碑附入宋碑内。朱氏编此,主要为了学写字,所以卷首列出学书年龄次第图,不是像宋人专攻金石学,难怪唐代碑刻分类变得芜杂了。

此外还有特别的一种金石目,是按内容性质分的。如赵灵均的《寒山石林部目》,其中“字义部”包括《干禄字书》、《九经字样》;“小楷部”为历代法帖;还有“正书部”、“署书部”、“章草”、“行草”、“篆籀”、“符印”、“分隶”等部,以及唐、宋、元名人杂帖等。另有“碑石目部”,如《停云馆帖碑石》,《书目部》如《集古录》、《隶释》等。这种金石分类法,应是金石书的另一种编辑形式。

### (4)录出全文的金石书

都穆的《金薤琳琅》,仿洪适《隶释》的体例录出每一石刻原文,所收入的碑石不多,计秦及秦以前刻者八,汉刻二十三,隋刻

<sup>①</sup> 《棗竹堂书目》伍崇曜跋引朱竹垞《静志居诗话》。

五,唐刻二十七,每条下俱有尾跋,并采诸家之说。如石鼓文引洪武(1368~1398)时赵古则说,峰山刻石引宋郑文宝说。其他也兼采欧阳、赵、洪诸说。同时也能亲自调查,如龙藏寺碑,并记出宋代所铸高七十二尺的铜像。邠州昭仁寺碑,也是亲自到邠州考察。汉《韩敕礼器碑》,能补出《隶释》所未收入的两侧人名,这些不只说明都穆做学问的正确,同时也说明了他的细心。

杨慎的《金石古文》——体例与《金薤琳琅》同,明代金文学家较少,杨慎应是最突出的一个人物,因而《金石古文》中收集六条金文,但伪托的也很多,如《汉祭金马碧鸡文》因杨曾到云南,故诡称为他人所不能收。晋千金渠石人东胁下文,见于《水经注》,并无拓本。对石鼓文的臆补,诡称得拓本于李东阳,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语为“真伪杂错,殊多疏漏”。

此外,都穆的《吴下冢墓遗文》,是专录吴中铭志之文,凡三十四种,也是录出全文的一种金石书。

#### (5)金石文字的研究

朱云的《金石韵府》<sup>①</sup>——全书以字为纲,按四声编排,如“一东”韵中的“东”字,写出小篆、古孝经、汗简、穆公鼎、古文等五种不同的写法,与宋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的体例相同,虽然在考古上没有多大作用,但也是研究古文字的最好工具书。

陶滋的《石鼓文正误》——共四卷,一摹写原文,二按字正误,三抄王厚之石鼓三疑辨,四抄韦应物、韩退之等人的石鼓歌。陶根据各家研究考证为周宣王时物,所以也应是明代古文字研

---

<sup>①</sup>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书抄本。

究中的一种著作。

此外如卞襄的《古器铭释》，是抄袭宋人各金石文字书中的钟鼎款识之文，但摹刻摹伪，不足依据。

## 2. 古印玺的研究

### (1) 顾从德的《集古印谱》(《顾氏印藪》)

这是印谱中比较好的一种，全书共六卷，卷一为秦汉各种官印，以下为各种私印、未识私印以及子孙、日利、单字、象形等印。沈明臣序中说：“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搜购远近，不遗余力，乃仅仅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然较之诸家所传，则三倍矣。”每一条下俱有释文或有考证，较王厚之、钱舜举、吴思孟等人所集的印，不只几倍，顾氏可以说是印章学考古的第一流人物。

### (2) 吴元维的《秦汉印统》

顾氏占印，后归太原王常收藏，常于三十年后，又得四千，前后就近七千方了。于是由吴元维刊刻，名曰《印统》。《印统》的编成，完全以《顾氏印藪》为蓝本，再加后收人的几千方，所以体例与《顾氏印藪》同。

### (3) 孙诒的《石云先生印谱考释》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官印，中、下卷为私印，每条下注出什么质料，什么钮，有的还考证官爵或某人出处与生平。例如考证“延陵季子”印，为宋代注《大学》讲义的吴季子，而非春秋

的吴季子。这样的精审态度,应是较好的考古学家才有的。<sup>①</sup>

### 3. 美术考古中对书画的研究

#### (1) 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

这是没收严世蕃所搜集的书画的目要。共分法书、名画两类。法书中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各帖,以至六朝、唐、宋、元、明各大家的墨迹。名画中如顾恺之的《索卫像》、展子虔的《游春图》、吴道子的《观音变相图》、胡环的《番马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周文矩的《文会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赵子昂、黄大痴、戴文进、沈石田等人的各样名画,不仅记出画目,同时又注出曾为谁所收藏,有谁题跋,兼有作者生平的考证。《明史》称:“世蕃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攀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所以严世蕃的收藏是相当多的。文嘉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得遍览严氏没籍后的书画,考证研究,因作《钤山堂书画记》。

#### (2) 王世贞的《弇州山人续稿》和董其昌的《容台别集》

这两部书都是对书画的鉴定与研究。如《弇州山人续稿》,其中《墨迹跋》五卷,包括右军《鹅不佳帖》、王大令《送梨帖》,虞世南、褚遂良、颜鲁公、徐浩等的真迹。还有宋苏、蔡、米、黄,元鲜于伯机、赵松雪、赵仲穆、虞道园以及明代诸大家等真迹的题

---

<sup>①</sup> 《集古印谱》、《秦汉印统》是套色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石云先生印谱考释》见《石云先生遗稿》,北京大学藏手抄本。

跋与考证。《墨刻跋》二卷包括汉碑、宋代各法帖、宋拓、唐人碑刻的题跋,不仅是碑石的研究,而且又是拓本的研究。《书跋》五卷,是对凤洲过眼的名画,加以考证,如《萧翼赚兰亭图》,考为江南顾德谦画,又题跋许多佛教画中的经变画与十六罗汉图,等等。《容台别集》卷二、三、四,为鉴定书画的杂记,书品中三百一十四则,首先为书评,然后鉴定。如《谢惠莲墨迹》以字形用笔,考为宋高宗画。项子京家藏《钟太傅书曹娥碑》真迹,有高宗跋。钟绍京的《通甲神经》有政和(1111~1117)与宣和(1119~1125)小玺、徽宗标识、倪元镇跋语等。《画旨》一百五十五则,首先也有画评,然后每一条下,多是鉴定的结语。如李伯时《西园雅集图》,考有二本,一作于元丰(1078~1085)间王晋卿都尉之第,一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赵德麟之邸。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考在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而画出的。这些都是董其昌以对书画毕生的经验而写出的总结。所以他说:“论画当以目见为准,若远指古人曰:此顾也,此陆也,不独欺人,实自欺耳。”

### (3) 汪珂玉的《珊瑚网》

本书分为画继、画据、画法三部分。画继为继《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是对历代画的总结评论,包括《论宋徽宗艺术》、《论宋代诸家艺术》、《画史清裁》(由孙、吴画到元画)、《杂论》等论画的文字。画据是据宋御府、秘书省及诸家,沈石田、严世蕃等所藏,写出每一画的尺度、玺印、题跋等特点,以辨真伪。画法是抄出诸家对作画的心得,如《山水诀》、《写竹说》等。珂玉父与项子京友好,书画收藏甲于一时,因而珂玉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对书画进行鉴定研究的著作。

#### 4. 古遗址的调查

##### (1) 萧洵的《元故宫遗录》

洪武元年(1368)灭元,毁元故宫,萧洵任工部郎中,因得遍阅元宫各处所著。文中如记内城广可六七里,方布四隅,有东华、西华、午门。中有大明殿、后宫弩头殿。寝宫中有延春堂、文思小殿、玉德殿、宣文殿等,还有嫔嬪居处的清宁宫、延春宫等。内城临海子,其中包括瀛洲、圆殿以及太液池、中宫殿回廊等。这些记载是了解元大都宫城的极重要的记录,与《洛阳伽蓝记》、《长安志》等书可以相互媲美。

##### (2) 赵崧的《访古游记》

赵收集碑帖,作出《石墨镌华》后,为了对碑刻更多地收集,乃游南山、九峻、城南,因作《访古游记》。其中《终南》一文,主要记游元王重阳道士成道的重阳观,有赵秉文的《仙遗海棠记》、姚燧的《重阳仙迹碑》、龙虎殿的元建筑、曹汉臣塑像、胡君贵的妆奁。《整屋楼观》记有唐戴叔伦的《灵应颂》、殿壁间的宋人诗、楼壁间的元人山水画、翻刻的开元《帝梦真容碑》,以及黑水谷内的仙游寺。其中,仙游寺内塔上有唐人画天王、鬼神和苏轼书等。《九峻》一文,主要记昭陵下各陪臣墓葬及神道碑、六骏浮雕及赞文,以及贺若谊、常丑奴的墓志等。《游城南》一文,主要记荐福寺、大兴善寺以及慈恩寺塔,宋熙宁(1068~1077)火后不可登,万历(1573~1619)甲辰重修,加梯,方可登览。唐人题名石刻已逸失,曲江头还有宫殿基址。此外,还记有少陵原上的少陵,韦、

杜之间各寺院和古墓,圭峰下的栖禅寺,寺殿壁画似为元代笔意等。16世纪的赵崧能识出曲江岸上一般所称的古冢为宫殿故基,能重视重阳宫的古建筑,以及各殿壁的壁画,虽然不能辨罗摩罗什塔为唐宗密塔,没能脱出金石学的范围,但这样来重视遗址,也应是那时最突出的考古学家了。

## 5. 对古文物的鉴定与研究

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古器物为更多的人所收藏,如秀水项元汴的白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sup>①</sup>,大肆收购,因而天籁阁的古人书画、金石文物,寰宇无出其右者。其他如严世蕃铃山堂的收藏、太原王常玺印的收藏等,都是在私人收藏上前代所赶不上的,所以对古物鉴定之学,大为盛行。较为重要的著作如下。

### (1)曹昭的《格古要论》

书成于洪武二十年(1387),分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文、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石窟、古锦、异木、竹、文房、浩敕题跋、杂考等论。其中如鉴定古琴以断纹、漆色、琴样、制作家等特征,辨别真伪。古画论以作画的技法、古绢色、绢料等辨年代,古铜器论、古窑论、古漆器论、古锦论,都是以许多经验寻出特征,辨别年代及真伪。虽然许多是抄袭他人的经验,但集中起来,也是很难得的著作。

### (2)都穆的《铁网珊瑚》

全书共二十卷,其中卷三为历代墨迹考跋。卷四为各画跋,

<sup>①</sup>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

如记《清明上河图》有金大定丙午(1166)燕山张著跋、元至正壬辰(1342)西吕杨准跋等,以及各家私印。卷五至卷八也是对历代各名家画的鉴赏。卷九为历代的研铭。卷十、十一为抄张抡所著的对汉代及以前古铜器的考证。卷十二抄汤垕的《画鉴》。卷十三抄牛戡的唐画与宋画。卷十四《画论》,如云唐人画卷必用碧绫,剡背,宣和、绍兴时装饰拆去古迹,以及染绢的特征等。卷十五记各家所藏古文物,及各样古琴的考证。卷十六、十七是对古砚、古铜器、古碑帖的鉴定与考证。卷十八、十九、二十抄周密所著《云烟过眼录》,对各家收藏的书、画、古器物进行记录,这些鉴定古物的经验与古器物书画的记录,应是今天最好的考古参考资料。

### (3)文震亨的《长物志》

全书共十二卷,分室庐、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等十二类。凡与生活有关的事,纤悉毕具。如《书画》类中所记的绢素、御府书画、院画、单条、宋绣、宋刻丝、裱轴、裱锦、法帖、南北纸墨、古今帖辨等,就是鉴定书画最宝贵的经验。器具类中有香炉、笔屏、笔洗、水注、镜、钩、钟、磬、研、墨、纸等考证,几榻类中记出几椅、交床、床、屏等前代的样式,就是对古器物的鉴定与考证。所以这样的著作,在考古上是起一定作用的。

### (4)作者有争议的《笥轩清閼录》

书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九类,如论玉类记玉器占色土锈,血浸最多,铜浸最少,这与考古发掘玉在人面上或身旁的实况相符合。当然它不能受到铜浸了。论古铜器不只记出历代铜器的特征和辨认铜色的经历,同时又记出天宝局铸器与元朝姜

娘子铸器,以及修补冷冲铜器、屑凑铜器等方法。论琴剑,记出古琴春雷、水清、玉振、奔雷等名琴。论雕刻记出宋、元、明雕漆器物与刻家姓名,对鉴定雕漆器极为有用。叙斲琴名手,记出唐雷霄、雷盛,宋蔡翥、朱仁济、马希先,元严古清,明高腾、朱致远等制作家人名。这些在考古学上,都是极宝贵的资料(今本作董其昌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为张应文所撰)。

其他如陈继儒的《妮古录》,也是对书画碑帖过眼的记录。吕震的《宣德鼎彝谱》记出制作时所仿的某器某式,并附刻项元汴的《宣炉博论》,又是辨认宣德铜器最重要的一种书。

## 小 结

总计以上,元、明两代考古学中具体的实例,说明元代的考古学是受到蒙古统治者对中原社会经济的破坏与掠夺的影响,又加上元帝国时间的短促,因而没有像宋代那样发达。明代固然文化生活较元代提高了许多,但由于御府没有收藏,统治者不积极来提倡,也影响了古器物鉴赏、金石学的发展,所以明代没有官修古器物图录的刊印。社会上对金石学或古文字的研究,只有都穆、杨慎、赵崡等少数大家,并不像宋代有那么多金石学家,或古文字学家。但自明代以后,在恢复社会生产力的需求中,商品经济更为发展起来,明中叶以后私人收藏的古器物,如项元汴那样的人物,是前代所看不到的。整个社会上的官僚地主把收藏古器物、书画作为风气,士大夫阶级对这一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因而对古器物、书画的鉴定知识日渐广泛,这方面的著作,也是前代所赶不上的。明代对古器物鉴定的考古学最为突出,而且有一定成就。

明代末期,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封建统治者对金钱财货追求得更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陷于破产的绝境,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并爆发农民起义。对财货的追求,以致道德的沦丧,因而有大批文武官员只为保持或扩大自己劫取土地和财富的特权,而忘掉了国家利益,甚至投降,引致清朝政权在中原立足。在这样内部阶级矛盾、外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势下,整个社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史学是战斗性最强的科学,受到的打击也最为厉害,所以考古学陷入停止状态。虽有少数如顾炎武、朱彝尊这样的优秀考古学家,也不能形成社会上的一种风气。康熙一朝,在社会生产力受到残酷摧残后,为了巩固统治,于是采取各种安定社会的措施,社会秩序与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恢复。为了消弥士大夫的反抗情绪,朝廷开始重文治,设明史馆,编《康熙字典》、《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同时用镇压手段对付前明的士大夫。这样镇压与笼络的政策相结合,使知识分子都俯首帖耳,离开现实而从事古籍的整理。乾隆朝开《四库全书》馆,修《三通》,笼络大批知识分子,但纂修时,搜罗国内藏书,凡是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或触犯他们忌讳的以及有

种族关系的文字,不是大量删去就是加以歪曲和篡改,甚至大规模地销毁。这样更促使知识分子脱离现实斗争,追求不关痛痒的繁琐考证,甚至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即使通达,也是如休宁戴氏解《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的章句训诂。在这样汉学师承的风气下,金石学更放弃了证史的责任,专从事古器物本身的研究与玩赏,与现实斗争距离更远。乾嘉时代的金石学,虽是空前发展,但玩物丧志,脱离现实斗争最为严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进入了中国,破坏中国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在文化方面也输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当时有:同治元年(1862)在京师设立同文馆;二年,上海设广方言馆;五年在福建设船政学校;光绪八年(1882)在天津设水师学堂;十一年设武备学堂;十三年在广州设水陆师学堂;等等措施。又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这样来接受西方文化,因而考古也受到了影响。如光绪十七年陆心源印《砖图》,用泰西摄影法;光绪二十年吴式芬的《封泥考略》用石印法;光绪三十四年的《陶斋吉金录》也用石印法等等。这都是考古学上一种大的变化,所以王国维说:

自雕板行而得书易,石印行而得善本书易……自有写影入石之法,而古本善本之仅存者,影之印之,一化为什,百为千万,无传写刊刻校勘之劳,亦无因传写刊刻所生之误,法至善也。<sup>①</sup>

直到今天,我们的考古报告中图录的编纂,完全是用影印

---

<sup>①</sup> 《百一庐金石业书》王国维序。

法。所以同治、光绪以来的考古学,有了新的面貌,到最后的罗、王诸考古学家,就是在这基础上更发扬而光大之。

帝国主义的入侵,边疆各地都成为侵略的目标,所以西北新疆、北部外蒙古(今天的蒙古国)、东北三省,就成为西方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的探险圣地,于是外国考古学家,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中国西北、东北、北部以至内地来进行考古工作。

## 一、清代的古器物收藏家

### 1. 清前期的古器物收藏家

有清一代对古器物的收藏,是超过任何一个时期的。在初期如孔尚任、高士奇等人,对古器物就有了收藏,同时内府也大肆搜集,高士奇就是康熙朝中主要的书画鉴定人之一。以后再经过雍正朝的搜集,到乾隆时内府收藏超过了宋代。编纂的几部大图录书《西清古鉴》、《西清古鉴续鉴甲编》、《西清古鉴续鉴乙编》、《宁寿鉴古》等共收集了历代铜器四千零四十件。乾隆八年(1743)起又把藏乾清宫的历代名人书画缙丝、绣线编《秘殿珠林》目,把旧藏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宁寿宫、淳化轩等处的历代书画缙丝、绣线,编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目。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将以前没编入的历代书画缙丝、绣线,编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目。其他如秦汉铜印、历代瓷器及工艺品等收集,也是最多的。对古器物的收藏与鉴赏,恐怕是前代所赶不上的。

## 2. 清嘉庆、道光时代的器物收藏家

乾隆时代内府收藏既如此之多,私人收藏也不见得少,乾隆、嘉庆、道光时代的收藏家,最有名的如仪徵、阮元“积古斋”收藏三代铜器有七十四件,嘉兴张廷济“清仪阁”藏三代铜器有六十四件,石鼓文以下各石刻旧拓本近千种,其余如晋古砖,秦汉古瓦,汉魏至宋元古官私印,周、秦以来的钱币收藏也很多。与阮元同时的江德量、朱为弼、孙星衍、赵秉冲、翁树培、秦恩复、宋葆醇、钱坫、赵魏、何元锡、江藩等,也各有收藏。<sup>①</sup> 嘉庆时任江苏粮储道的斌良,藏铜器二百余件,其中“涂金元和二年(85)量”,李遇孙认为是金器中的绝品。道光中曾任扬州知府的李璋煜“爱吾鼎斋”的藏铜器有二十二件。<sup>②</sup> 诸城刘喜海藏有三代、汉的铜器、虎鱼符、汉唐镜、元铜印等近百件,汉封泥二百方,为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藏家。<sup>③</sup> 其他如汉阳叶志诜“平安馆”藏历代铜器一百六十一件,酒泉太守虎符等精品。苏州曹载奎“怀米山房”藏秦以前的古器物,歙县程振甲“木庵”的藏器也都是最有名的。<sup>④</sup>

---

① 阮元:《积古斋藏器目》、《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清仪阁藏器目》;李遇孙:《金石学录》,卷四。

② 《金石学录》,卷四;《爱吾鼎斋藏器目》。

③ 《长安获古编泥封印占录》、《嘉荫修藏器目》。

④ 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程振甲:《木庵藏器目》;李遇孙:《金石录补》,卷四。

### 3. 清咸丰时代的收藏家

嘉庆、道光以后的收藏家,较以前更为重要。如武进吕俊孙藏秦汉铜印千余方,古镜百余。浙江归安丁产臣的“梅花草庵”藏秦以前的铜器。吴云的“两罍轩”藏器,除三代铜器外,还有秦残度器和农器。<sup>①</sup>但是最大的收藏家应是吴式芬等人。

吴式芬,山东海丰人,官至内阁学士,他的“双虞壶斋”藏铜器七十七件,汉封泥三百方,其他器物也很多。<sup>②</sup>

同时山东利津县做过汀州府知府的李佐贤的“石泉书屋”,所藏的刀布二千余品,拓本五千余品,是藏历代泉币最多的人,同时还藏有三代铜器十八件。其中易州六器,是燕器中最有价值的代表物。<sup>③</sup>

### 4. 晚清同治、光绪时代的收藏家

同治、光绪以来的收藏家,当推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端方、罗振玉为巨擘,方濬益、高庆龄、周奎诒、顾寿松、高鸿裁、何琨、刘鹗、丁麟年等,也是相当重要的收藏家。

陈介祺,山东潍县人,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海内,他藏铜器四百四十三件,以毛公鼎为最有价值,兵器较多,如鄫王戈、吕不韦戈等。又藏有陶器数百件,周印数十方,汉印万余方,秦诏版十余块,魏晋六朝造像数百件,从来没有收藏家像他收藏这样广泛的。

① 吴云:《两罍轩藏器目》,丁产臣:《梅花草庵藏器目》。

② 吴式芬:《双虞壶斋藏器目》;陆心源:《金石学录补》,卷四。

③ 陆心源:《金石学录补》,卷四,《石泉书屋藏器目》。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官工部尚书,藏古器六百余件,其中孟鼎、克鼎、齐侯铸为宇内重宝,又藏有山东出土有字陶片数千。

吴大澂,号恣斋,江苏吴县人,官至湖南巡抚,所藏历代铜器二百二十九件,其中隋唐虎、鱼、龟符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物。<sup>①</sup>

王懿荣,山东福山人,官至侍郎,所藏三代铜器五十余种,以及汉铜器、瓦当、画像,南北朝造像等。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十六年收集到甲骨,为最早发现殷代文字的人。

端方,字匋斋,满洲镶白旗人,官至四川总督,藏铜器六百余件,以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铜禁及酒器十二件为最有价值,又藏砖石造像等六百五十一件。有文字陶片、周、秦、汉官私印等文物。其中以汉徒隶砖为最有价值。又收集埃及、意大利等国的石刻造像及陶俑、瓶缶等文物。<sup>②</sup>

罗振玉,浙江上虞人,官至学部参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主要在收集甲骨,约两万片,同时也搜集六朝、唐的土俑,据民国十三年(1924)所印的《雪堂藏古器物目》,包括彝器一百一十件,由商周到明乐器、兵器、货币、符牌、官印、农器、梵像等有文字的金器四百五十六件。无文字的铜器一百五十七件,石砚、石磬、雕石、狮子、黄肠石、造像等七十六件,墓志四十八件,各样陶器、墓砖、瓦当、货币、封泥等五百一十五件,残者四百多件。又玉、贝、珧、烧料、犀象骨、竹木等类杂器一百八十七件。收藏之多,为清末民国初的第一流,并不亚于咸丰、同治以来的陈介祺。

其他如定远方濬益藏有铜器及楚饼金,潍县高庆龄藏有齐

---

① 陈介祺:《簠斋藏器目》;绪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吴大澂:《恣斋藏器目》。

② 《金石学录续补》,上卷;《匋斋吉金录》;《匋斋藏石记》。

鲁古印数百方,祥符周盍诒藏有的古珍印二千方,顾寿松藏有古彝器,潍县高鸿裁藏有的秦汉砖瓦,高要何琨藏有汉印二千方,丹徒刘鹗藏有铜器百余件、甲骨四千余片、陶器千余种,日照丁麟年藏有铜器和虎符等。<sup>①</sup>

## 二、清代乾隆、嘉庆前后的考古学

### 1. 古器物学与金石文字的研究

金石学自宋代盛行以来到明中叶以后已渐发扬,扩大了范围,如《格古要论》、《铁网珊瑚》、《长物志》等,都是对各种古器物的鉴赏与记录。清代更扩大,不仅发扬图录、金石文字的研究,同时对货币、镜鉴、砖瓦、玺印、封泥的研究,也日益加多,所以金石学的范围,就超过了宋代。今将清代乾嘉前后金石学的种类,分述以下:

#### (1) 古器物图录学

乾隆时代奉敕编纂的《西清古鉴》、《西清古鉴续鉴甲编》、《西清古鉴续鉴乙编》和《宁寿鉴古》。《西清古鉴》是乾隆十四年(1749)由梁诗正、蒋溥等领衔,编纂内府储藏的铜器一千四百六十四件,分六十八类,画书原形,摹出铭文,并记出尺度、重量和考证。《西清古鉴续鉴甲编》是乾隆五十八年由王杰、董浩等领衔,编纂正集未收入的内府铜器九百七十五件,体例与正集同,

---

<sup>①</sup> 诸德彝:《金石学录续补》。

惟附录少数民族的器物图,元及明铜印、藏钱币等图,是正集所没有的。《西清古鉴续鉴乙编》是编纂藏于盛京的九百件铜器,体例与甲编同。《宁寿鉴古》是编纂宁寿宫中七百零一件铜器,体例与《西清古鉴》同。《西清古鉴》正集编纂最早,因而没有加盖图章,《西清古鉴续鉴甲编》卷前有“宁寿宫宝玺”、“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小印,卷末有“养性殿宝”、“古希天子”小印。《西清古鉴续鉴乙编》卷前有“乾隆御览之宝玺”,右下有“宝蕴楼藏器”小印。“宁寿鉴古”有两种玺印:凡“宁寿宫宝”俱印在册前面,另有“乾隆御览之宝”小印;凡“养性殿宝”俱印在册后面,另有“古希天子”小印。

《古镜鉴》及其他杂器的图录——如瞿中溶的《集虎符鱼符考》是集汉、魏、隋、唐各样铜符十七件,图绘形状,铭文,并记出尺寸、出土地点和考证。钱坫辑的《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共收汉、唐镜二十五种,拓出原器形状,记出镜的直径尺寸、铭文和花纹,并稍加考证。受时代限制,认识方面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陈经的《求古精舍金石图》前摹铜器、刀、布、鉴印、刚卯之属,后摹占砖款识图。其他如梁廷枬的《藤花亭镜谱》,也是重要的镜鉴图录。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也应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著作。

此外道光二至三年(1822~1823)间冯云鹏、云鹗所辑的《金石索》中,“金索”部分,有钟鼎、戈、量度、杂器(洗、铎、釜、盘、造像等)、泉刀、玺印、镜鉴几类,每一类中的器物,都绘出图形,摹出铭文,加以释文考证。可是所收入的器物,多是抄录前人的著录,没有多少精品。如泉刀类中的铲布都作为神农黄帝、虞、夏等时期货币,玺印也多是抄袭《印统》,钟鼎也多见于《博古图》、《西清古鉴》等书。就是考释方面,也没有多少发明和创见。

相当重要的一种图录书是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它不

完全是专作出哪一种古器物图录,而是利用古器物来解释《周礼考工记》中各样车、矢、钟、鼓、戈、矛、磬、角、爵等器物如何制作。程氏精通经、史、金石学、古文字学,因而能有这样精到的著作,运用古器物来解释历史问题。

## (2) 碑石的摹勒

清人依据洪适《隶图》的体例,将汉碑形式和画像石的画像刻石,以及历代的石刻,摹勒付梓,更发展出对汉隶的双钩摹勒。从乾隆以来,主要的著作有以下几种:

牛运震、褚峻的《金石图》——其中包括石鼓文、泰山刻石、秦室少室、石阙、乐安太守廐君亭长像、王稚子阙、杨公阙,以及汉代各碑、唐幽州昭仁寺碑、颜家庙碑等。由褚峻摹出原形及碑文,由牛运震作解说考证。

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摹勒体例,记出汉故凉州刺史魏君之碑、幽州刺史朱龟碑、咸阳灵台碑、汉故小黄门谯敏碑、王稚子阙范式碑、范式碑残石、武梁祠画像石、故圉令赵君碑、三公山碑,每一碑后有释文及各家的跋语。

其他如瞿中溶的《汉武梁画像考》、王森文的《石门碑群》、叶志诜的《平安馆金石文字九种》、徐渭仁的《随轩金石文字九种》也都是对汉碑文字的钩摹,然后加以考释。

这样对金石文字原形的钩勒,也是照相术没有发生以前,比较正确的研究方法。

至于《金石索》中的“石索”部分,由岫嵋碑、石鼓文起,泰山东各刻石、汉孝堂山画像石、各汉碑、武梁画像,以及汉瓦当和少许残砖文等,虽然也是摹勒原形,但也多是前人的著录,没有什么特殊的解释。

### (3)金石目

不加考释的金石目——《续通志金石略》与《皇朝通志金石略》。依据郑樵的体裁,先金后石,以时代为序,唐以前取郑志所未收入的五代、宋、辽、金为一卷,元、明合为一卷,所进拓本,今无迹可掇者,另列一卷,每一目下,记出撰出人、书体、年代,以及所在地。有的对碑石、拓本,加以简略的考证,最后有目而无碑的,也考订出来,较郑志来详慎了许多。《皇朝金石略》只收入乾隆以前四朝皇帝所制枪炮仪器的款识,以及内府、大内花园、行宫以及全国各地的御撰书碑记、题诗等刻石。

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收集的资料一部分是三通馆编《金石略》时的副本,其余是孙氏西游河华,北集神京,东揽三齐,南穷越纽的收集。还有邢澍的一部分,体例与《金石略》同,以时代为纲,每一目下记出撰书人、年代所在地或某人拓本共三千多种,实是前所未有的金石目。

吴式芬的《搢古录》——凡吴氏收藏的古器物铭文或他人的金石拓本,都集入录内,金文又录出全文,并记出为何人所收藏,石刻文字目,注出撰书人、年代和所在地,据最后的统计,“自三代迄元,金文一千七百八十一一种,石文一万五千二百三十种,砖文一千一百零五种,木刻六种,玉文四种,磁文二种,都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八种”。从来收集金石文字没有超过吴氏的。

《金石汇目分编》——是吴氏仿宋代《宝刻丛编》的体例,以地为纲的金石目。包括全国的记有京师、盛京和十八省、各府州县的金石目,不仅现有的碑石和拓本,就是各书所载的金石目也收入在内,同时没有所在地的碑石,列入“待访”项下。卷首附有访碑注意要点和拓碑方法。

此外如咸丰四年(1854)胡琨为刘燕庭所编的《长安获古编》，是把刘氏在长安所得的金石作出目。姚晏的《中州金石目》是记出河南一省的金石目，但晏随父督学中州，只是翻阅群书汇集的金石志，并非亲自收集或作过调查。

加以考释的金石目——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顾氏周游天下，收集金石遗文的目录，由上古到明的碑文有的仅存一目，如《崔敦礼碑》、《张阿难碑》，有的录出全文，如《曹全碑》(因系明万历时出土)，但多数是录目，然后加以考释，甚至对碑形的考证，如《郑固碑》，考其有一大孔是为施轭驴以绳引棺之用，未附诸碑别体字及补遗。

叶奕苞的《金石录补》——在钱大昕、翁方纲等人著作之前，意在补赵录的不足，每一条下加以考释。最末三卷，一为历代金石书不同名称的集异，如《泰山刻石》，又称作《泰山篆》、《封泰山碑》等名。二为传疑，如对诅楚文、黄陵庙碑等的看法。三为对金石各方面的杂记。虽收集的并不多，但考释方面，还是相当的博洽。

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与《中州金石记》——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1780~1781)时，毕氏任陕西巡抚，收集金石七百九十七条，包括关中各县及陇新二省，由周秦到元的石刻，每一目下记出年代、书体、撰书人姓名及所在地。同时又详加考证，与史书互相发挥。如咸阳东北原上顺陵，记有残碑，长安二年(702)立，武三思撰文，相王旦正书，为武后追尊其母杨氏之碑。今只存三块，一在县署，一在县学，一在北原，因而确定顺陵为杨氏陵。《中州金石记》体例同《关中金石记》，由汉秦室石阙，到元付灵都万寿宫榜，收集河南各县碑石而作成。

孙星衍的《京畿金石考》——是按两种方法辑出的，一以拓

本为根据,一以前人所录而存其目者为根据,收入京畿附近各府州的金石。每一目下,有的仅存其目,有的加以考证。但以前人注录为根据的金石目,如虞集撰的《大都城隍庙碑》,记于“至顺二年(1331)立在庙中”。今元城隍庙已毁,同时碑也不见,不记出毁坏情况,后人无从认识,所以这应是对金石考古不足的地方。

朱枫的《雍州金石记》——收集碑石不及五代以下,条数不过二百余种,体例同以上二书,间有录全文者(如《曹全碑》)。但朱氏序中说:“余于辛未入秦迟留十载,其地为周、汉、隋、唐故都,金石遗文所在皆有,余夙有金石之癖,暇则策蹇行游,逢古碑辄坐卧其旁,流连竟日,或宿山寺,或问樵牧,不少倦也。”因而每一碑目下,俱记书碑石地点或出土经过。如《宗圣观记碑》,朱氏记“在盩厔县楼观大殿前”,而毕沅仅记在盩厔,足证毕氏并未亲历其地,其他各条不可胜举,因而朱氏书在考古价值上是高出于毕氏的。

刘燕庭的《海东金石苑》——原是八卷,抄录朝鲜半岛,由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到明代高丽的碑石七十种,未及印而稿被焚,潘祖荫抄有跋语,由鲍康代为刊行,所以今本与《雍州金石记》的体例相同。本书记出所在地、年月、撰书人和一些内容的考证,最末还附有日本国《多胡郡碑》等四种。专记海外金石,还是惟一的著作。

其他如翁方纲的《粤东金石略》、武亿的《偃师金石记》、孙星衍的《泰山石刻记》、赵绍祖的《泾川金石记》、冯云鹗的《济南金石志》、沈涛的《常山贞石志》等,都是这一种体例的金石目。

#### (4)抄出原文的金石录

自顾炎武起,有抄录全文五十六种的《求古录》,以后又有陈

奕禧的《金石遗文录》，也是抄出原文的金石录。以后最重要的编辑，有以下几种：

吴玉搢的《金石存》——仿《隶释》、《金薤琳琅》的体例，前五卷收入篆书或金石古文，第六卷以下为隶书及楷书金石，每一条下除录全文，又加以考证，但吴氏足迹不广，致认廬君亭长石人题字为碑，廬君“府门之卒”题记，也不知出处。

集古今金石书大成的王昶的《金石萃编》——录出全文的金石书，有宋洪适、明都穆、清吴玉搢等大家的著作，但最末的吴氏书，也不过一百二十余通。王氏历仕江南、秦陇、滇、蜀各地，对金石拓本，备致搜求，多至一千五百余通。前后历五十年，纂成一百六十卷，每条下不仅录出全文，对楷体以外的金石文，又要摹出原文。记出行数、字数，以及碑石高广尺度和所在地。文后录出历代金石书考释的文字，最后为王述庵的按语。自石鼓文起，到南诏大理止。包括彝器铭文、瓦当文字、镜铭、尺铭、洗文、石人题字、画像石题字、砖铭、井床题字、塔铭、造像题记、刻经钟铭、券文、镜铭、石函题记、地图刻石和各样碑、碣、墓志等等。收集种类之广和引用诸家考释之多，是亘古所未有，应是集古今金石的大成了。

阮元的《山左金石志》——是地方金石志中最好的一部著作。该书收集殷周以来历代的金文、刀布、镜鉴、玺印、画像石以及历代的石刻等，多至一千三百余通，体例与《金石萃编》相同。参与考订的有朱文藻、何元锡、武亿（虚谷）、段松苓、黄易等人，以收集的数量来看，是超过关中、中州二金石志的。

此外专记一个地方的金石抄录全文的还有阮元的《两浙金石志》、武亿的《偃师金石遗文记》、阮福的《滇南古金石录》、吴兰修的《南汉金石志》、刘喜海的《金石苑》（四川省）。

还有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马邦玉的《汉碑录文》、赵绍祖的《金石文钞》、黄本骥的《古志石华》等,也都是抄录全文体例的金石书。

#### (5) 金石文字的题跋与考证

朱彝尊的《曝书亭金石跋》——共六卷,由铜器铭文到历代碑刻,其中如记淳化阁帖的夹雪本、云居寺辽碑“千人邑”,“邑”字考为结社意,诸如此类都是最重要的考证。又由于金石范围的扩大,如晋祠铁人铭文、太医院铜人膺穴图拓本,也作了考证。可是朱氏不懂佛教艺术,因而批评唐道宣不著录宋人铸成的正定龙兴寺大佛,当然唐代的道宣没法记出后代宋人的作品。

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共八百余条,每条的跋尾都能尽量地结合史实来考证,或互相阐发。王鸣盛序中说:“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跋尾,乃尽掩七家(欧阳修、赵明诚、都穆、赵崧、顾炎武、王澐、朱彝尊)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乃七家中,最佳者能考史十之三四,其次一二而已,下者至但评词章之美恶,点画波磔之工拙……竹汀于史横纵钩贯,援据出入,既博且精……遂能超轶前贤。”所以乾嘉以来的金石学家,都推崇钱氏的精博。当然由于考古调查不够,以致对许多碑石,还不能说出它们的所在地。

武亿的《金石之跋》——包括一跋、二跋、续跋三种。武亿追随阮元氏,与朱文藻、黄易等人共研金石,编纂《山左金石记》,在跋语中,虽多发明,但也是钱竹汀一流的人物。

赵绍祖的《古墨斋金石跋》——共六卷,凡收入金石书中的,就记出刻于某书。赵氏涪川人,所收关中的碑石较多,西安千福寺中孟再荣题记,为他书所不见,可惜赵氏不知在千福寺内。

韩崇的《宝铁斋金石文跋尾》——虽然条数不多,而范围较广,包括塔砖题字、井栏题字、小像题记等,尤其所收入的多是大江东南一带碑石,应是很重要的金石书。

此外洪颐煊的《平津读碑记》、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也是很重要的著作。

关于对某一种金石考证的书,这时期也相当多,如顾亭林的《石经考》是把汉、魏、晋、唐、蜀石经,北宋开封府石经,南宋杭州高宗御书石经,晁公武刻《古文尚书》等,详加考证。其他还有如万斯同的《汉魏石经考》、《唐宋石经考》、钱大昕的《唐石经考异》,翁方纲的《汉石经残字考》,孙星衍的《魏三体石经考》,王朝渠的《唐石经考证》,桂馥的《历代石经略》,陈雪峰的《汉熹平石经残字》等对石经的研究,以及任兆麟的《石鼓文集释》等。

其他专题的金石考证,如汪士铎的《瘠鹤铭考》、翁大年的《古兵符考略残稿》、林侗的《唐昭陵石迹考》、罗士琳的《周无考鼎铭致》。同治、光绪以后如杨荣懿《景教碑文纪事考证》、储可宝的《元魏紫阳郑文公摩崖碑跋》、盛昱的《阙特勤碑跋》、孙贻让的《宋政和礼器文字考》等,应是清代金石学发展过程中涌现多种多样的题材。

#### (6) 货币、玺印与封泥

##### 货币

梁诗正等奉敕撰的《钱录》——十六卷,根据内府的储藏作出,参考文献,辨别真伪,考订年代。按历代次序编纂,由伏羲氏到明思宗,未收外国、吉语、厌胜诸品,较洪遵《泉志》收入天品、正品、伪品的混淆,是有极大的进步。摹写的“赤仄五铢”与“四出五铢”的文字,也相当正确,只是为时代所限,把战国时不可识

文的布,当作伏羲、神农、黄帝、少昊、尧等时代的货币,把西夏文当作梵文,因而把西夏钱当作泥婆罗钱,把日本“和同开宝”钱,写作“和同开珍”。

朱枫的《古金待问录》——仅收集刀布八十二种,铲布两种,摹出原形及文字,惜朱氏不能破除前人的误解,把布全都释作三代以上的货币,把刀当作黄帝、高辛氏、陶唐氏所作,虽然有形状足供参考,但所考释,几乎全有错误。

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共收集各种刀布、圜钱、历代货币一千二百一十种,按原形摹出,极为正确,自周起至明止。另有外国品及厌胜品。由于初氏通古文,所以有《古圜金刀布文字考》,考证过去所谓伏羲、少昊、黄帝、尧、舜等货币,都是战国时货币,这应是货币考古的一大进步,末附《考古琐言》,又是引用文献与实物对证的考释文字,对于货币考古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较好著作。

马昂的《货布文字考》——是《吉金所见录》后,又一本对货币有正确认识的钱币考古著作。该书先绘出原形,摹出泉文,然后释文考证,从齐地货刀起,到圜钱半两止,汉以下俱未收入。卷首有六篇论文,主要为《货布之制创自春秋战国诸地商民说》、《古以六铢为一金与斤溢同为名数说》,打破前人传说的神农、尧、舜、禹、汤货币诸说。虽然所收的较少,但是发展了初氏之说,给后来的货币考古开展了新道路。

其他如张端木的《钱录》,冯云鹏、冯云鹗的《古今钱谱》,翁树培的《古泉汇考》,戴熙的《古泉丛话》,刘喜海的《嘉荫蓂论泉绝句》等,都是这个时代中较重要的货币考古著作。

#### 玺印与封泥

蒋溥等奉敕编的《金薤留珍》——记录内府所藏的官私印,

分五溢贮藏,因而编谱时分为东、辟、图、书、府五集,共一千二百九十余件。谱前有嵇璜写的御制古铜章歌以及释文,首有目录,末有蒋溥等的跋语。所收周、秦、汉的玺印,可以说最为丰富。

毓庆宫藏汉铜印——共百余纽,多是未见著录的,其中包括古文的小玺和元捺,原藏清宫内毓庆宫中,民国十六年(1927)由马衡编谱印行。

胡琨的《泥封印古录》——包括刘燕庭得之长安的数十枚,陈寿仰的百余枚,有京秩(如御史大夫)、京秩之属官(如中宫谒丞)、京辅(如广左都尉)、列国王侯官属、郡守、郡尉、郡司马、郡长史、郡长、县令、县长、县丞、县尉、库官、新莽子爵、新莽男爵、新莽附城二十一、新莽郡尹、新莽丞杂印等。封泥,大多项下俱有考证。序言中又考应名泥封,不应叫封泥,书中还有不少地名考证。近古研究泥封者,应自胡氏起。

至于鉴定古印方面有:

吴騫所辑的《论印绝句》——题材虽然是诗,但是是记事的,对玺印的吟咏,共记沈心厉等十三人诗句。如咏贾似道有“贤者而后乐此”印,引起后人相沿以成语刻印事。记有陆反仁藏“卫青”印事,以及鉴定汉印为正直平方,唐印朱文屈曲、赵凡夫居寒山创为草篆、吴平子用八分体刻印,还有对历代收藏家所用的印章的吟咏。所以这样的记事诗应是对印学考古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陈澧的《摹印述》——虽然是为摹印而写出的,但所叙历代玺印体裁章法等,已收到鉴定古印之效。如所记古印多两面,一面姓名,一面臣某;或一面姓名,一面姓字;亦有一面姓名,一面作吉语。又有四面印、六面印、子母印等,这都是认识汉印的经验。在鉴定印章上,也是最值得重视的。

其他如《避暑山庄藏汉铜印》，私人收藏的如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徐同柏的《清仪阁古印考释》、姚觐元的《汉印偶存》、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等，也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至于砖瓦文字的研究，也很为发达，如毕沅的《秦汉瓦当图》，把瓦当的形状与文字翻印出来，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朱枫的《秦江瓦当图记》，是对瓦当与瓦当文字的研究。

### (7) 金石文字的研究

#### 对金文款识的摹写与研究

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仿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体例，共收集张廷济、孙星衍等人的藏器铭文，及阮氏自藏，得五百六十件，其中由商周铜器到汉晋各样器物铭文，由朱为弼编纂，每一条内不只摹出原文，又加以释文考证，并注出收藏人。卷首有阮元作的《商周铜器说》上下篇、《商周兵器说》等论文，考证铜器制作与用途。

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共二百八十七器铭文，由商周铜器到汉金、印泥、唐鱼、龟符等。凡《积古斋藏器目》、《金石萃编》所著录者不再录出，每条俱记收藏人及考释，惟对四川出土的汉封泥，认为是“印泥”，应是出土者少，吴氏无法识出其用途。

吴式芬的《搢古录金文》——根据原器精拓本及相传旧摹本收入，书成于阮、吴二书之后，体例以铭文字数多少为次序，由一个字的鹿钟起，到四百九十七字的毛公鼎止，每一条下摹出原文，然后释文、考证，并引用诸家之说。这样的体例，优点是专究古文字者可由此多懂声音训诂之学；缺点是未能利用这些器物铭文排比年代，用证文献的不足。

其他如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徐同柏的《丛古堂款识学》也是金文款识的著作。

至于张廷济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虽然也是金文的收集，但范围较广，由三代彝器到泉币、印符、砖甃、瓦当、兵器、造像、斗检封，宋铸牌、镜、玉器、经幢、石刻、诏版、权文，元明牙铜牌、姜氏造炉铭、文玩砚墨等，每一项下俱有考释，这是明代以来鉴定古物形象化的又一种著作。

#### 对古文字个别的研究

乾嘉以前对古文字个别研究的著作，当以顾藹吉的《隶辨》为最有成绩，采刘球的《隶韵》体例，按韵目排出，同时不仅记出一字的写法与来源，同时又加以考释，如江韵中的“𠂔”字，不仅记出源于《魏大飨碑》，同时又引《说文解字》、《西京赋》证与“扛”字同。末有偏旁五百四十部的考释，各汉碑的考证，最末有《隶八分考》、《笔法》等两篇论文，较《隶韵》的体例精密，考证更为详尽。

另外还有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的汪立名的《钟鼎字源》，嘉庆时代桂馥的《缪篆分韵》、袁日省的《汉印分韵选集》、邢澍的《金石文字辨异》，道光时代甘扬声的《汉隶异同》、翟云升的《隶篇》，都是对金石文字个别研究的著作。

### 三、清代同治、光绪以来的考古学

#### 1. 古器物学与金石文学的研究

自道光时代以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西方的文明同时也输入中国，因而照相术盛行，影印书的办法较以前大为方便，所以

对古器物金石文字研究,起了推进的作用,为现代考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 (1) 古器物图录学

吴云的《两彝轩彝器图释》——按历代图录的体例,将吴氏所收藏的商器十九件、周器三十九件、秦器一、汉及以后器四十四件,绘出原形,摹出铭文,然后记出尺寸、重量,加以考证,尤其对戮、罍的考释,颇称精到,图摹的器形,更为真实。

潘祖荫的《攀古楼彝器款识》——总共不过五十器,因多出吴大徵之手,故图摹器形、铭文俱极细致,对释文考证,引用诸家说,较他书更为精到。

端方的《陶斋吉金录》——共三百五十九件,三代器三卷,秦汉以下器四卷,南北朝以来造像一卷,器形是管琳、黄廷荣所绘,铭文是用拓本,全书为石印本,应是照相影印法的实施,所藏的禁,为前所未有的珍品,但并无释文与考证,较吴、潘的精于考证者不同。

吴大徵的《古玉图考》——收集周、汉、隋唐以来的古玉六十三种,每一器绘出原形,然后加以考证,收集之多为历代古玉图所不能及。全书完全用石印,也是影印兴起后的一部著作。

其他古器物的图录——如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把收集的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历代近千块的砖,拓出原形铭文、花纹,再记出尺度、释文和出土地点,有的还稍加考证,也是影印刊出。在古砖图录上,至今还没有超过陆氏的。吴大徵的《权衡度量实验考》集周、汉直到清代的工部营造尺,用玉璧、玉圭、黄钟律管、秬黍、古币、古矢、泉刀、弩机、开元钱的大小,较量尺的长短,并以出土秦权,较量量的轻重,用器物图来作考较实

验,也是前所未有的著作。其他如民国十四年(1925)宣哲所编的《董斋藏镜》,也应是陈介祺对古镜研究的一种图录书。

## (2) 碑石的摹勒

张德容的《二铭草堂金石聚》——择张氏所藏拓本中的周铜、秦鼓、山东刻石、汉碑石等文摹钩,在目下记出年代、所在地、见于以前何书,文后加以考释。北魏以下仅录全文。仿《金石萃编》体例。

杨守敬《望堂金石初集》(激素飞青阁摹刻古碑)——鉴于洪氏《隶释》与原碑校有出入,因自同治九年(1870)到光绪三年(1877)双钩出历代碑石五十八种,每一碑下记出根据何人收藏的拓本,再加考释。较以前的双钩本,更为完善一些。

此外如吴云《二百兰亭斋金石文字七种》、丁产臣《梅花草庵石刻钩本》,也是同样的体例。

## (3) 金石目

### 不加考释的金石目

王懿荣的《汉石存目》——分“字存”、“画存”两部分,就是汉碑与画像石两部分。序中说:“近世所存汉石,已尽于此,此目石亡文存者不录,重摹伪造者不收。”因而所收者,都是现存的石刻,每一目下,俱记出书体、年代与所在地,附有诸城尹彭寿纂辑的《周秦石存目》和《魏晋石存目》。

缪荃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由周、秦到元,历代金石文字(钟鼎彝器铭文在外)有年月、有地址可考者,共一万八百多种,完全为缪氏自己收藏的拓本,与《寰宇访碑录》、《捃古录》收集各收藏家者不同。《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的正确性,非其他各

录所能及。

其他如缪荃孙的《辽金石存目》、黄本骥的《元碑存目》也是断代金石目的一种体裁。

#### 加以考释的金石目

王炜的《山右金石记》——收集历代铜器、铁器、货币、铭文以及由汉到元的碑碣和摩崖、幢柱、石题、造像、法帖、砖瓦等共一千六百六十二条。每一条下，征引各金石书的跋尾与考证，以及王氏个人的研究。

此外如李遇孙的《括苍金石志》、孙貽让校补的《车瓯金石志》也是这一类的金石志。

陆心源的《吴兴金石记》——以吴兴一地方为限，收集的金石，不只鼎彝碑碣石刻，还有扩砖镜鉴等等。石佚仅见于著录者。标出著录来源，石存而有拓本者，大多抄录原文，如宋以后的各石刻，如宋《湖州飞英寺浴院记》、《报恩光孝禅寺新建观音殿记》都录全文。又如极重要的古碑，石虽不存见于金石书的，也加录文，如《梁相费泛碑》、《堂邑费凤碑》、《费凤别碑》三碑，石虽已佚，但为汉碑中相当重要的，因而据旧金石书抄录原文。陆氏收藏丰富并长于金石的研究，所以《吴兴金石记》编纂得相当得体。

#### (4)抄录全文的金石录

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是继《金石萃编》后最完整的一部金石书，编纂时就是为了补正《金石萃编》。“校其已录之文，补其未录诸刻。”下限到金，所收必据墨本，金石书著录者，不在收入之列，所以体例谨严，为他书所不及。如南武阳阙，即据拓本记出有东西阙为元和元年(84)皇圣卿阙，南阙为章和元年

(87)造,因而证明石阙的建造,并不是只为皇圣卿一人。又如秦室石阙,《金石萃编》已录,只纠正了三个错字。末附《金石祛伪》考秦元年诏版之伪、琴亭国李夫人墓门题字之伪等。又补《元金石偶存》,超出《金石萃编》的范围,这样的金石著录,应是最值得重视的。

端方的《陶斋藏石记》——收集砖泉范、买地券、各种汉砖、井栏、造像题记、墓铭、塔铭、唐石经、陀罗尼幢、泥玺、善业泥、墓砖、门枕石、石柩等六百余种,仿《金石萃编》体例,抄录全文,考释上只有裘锡龄等人的说法,但最突出的是陶斋“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入焉”。因而没有大的碑铭,只是一些小的墓志砖瓦等等。这样的收藏和编纂砖石文字,还是前人所未有做过的。

傅云龙的《日本金石志》——收集日本清代以前传国神器造像题记、各地碑石、钟铭、塔铭、镜识印文、器物铭识等,以原拓本石印刊出,加以尾跋、考释。尤其刀剑志、刀款识,记出列国制作者人,及某一刀的历史,末附纪元对照表,对外国金石,作有系统地收集与研究,傅氏书应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其他如李文田的《和林金石录》、魏锡曾的《绩语堂碑录》也都是抄录全文的金石书。

#### (5) 货币、玺印与封泥、砖瓦

##### 货币

咸丰末年,同治、光绪以来,最重要的货币研究著作,当推李佐贤的《古泉汇》。李氏收集古泉数十年,取历年拓本,汇成六十四卷,分元、亨、利、贞四集:元集收方足布、尖足布、圆足布、空首布等九百九十四种;亨集收齐刀、即墨、安阳刀、明刀、列国尖首

刀等七百零五种；利集收周、秦到元、明历代圜钱及高丽、日本、安南、高昌等国钱二千二百九十七种；贞集收异泉杂品、无考品、变体奇品、厌胜吉语、厌胜生肖、神圣仙佛、马钱、泉范等一千零七种。共收五千零三种。尤以列国刀、铲币为历代钱谱所不及，首集有目，历代著录。李氏《古泉臆说》节录翁树培《古泉汇考》、刘喜海《嘉荫簪泉说》、戴熙《古泉丛话》、鲍康《观古阁泉说》，都是为了研究而博引。在货币研究上，应是收集最丰富的一部著作。可惜对货币起源，还把“虞化一金”等方足布当作舜货币，未脱前人的说法，应是美中的不足。

此外鲍康、李佐贤合编的《续泉汇》同治十二年（1873）编成，光绪元年（1875）刻出，按正集体例，收入九百八十四种，补遗上下卷，又完全按拓本刻出。同时又补入陈介祺所藏的各样泉范，可惜在同治、光绪早期，未能用摄影影印，诚属遗憾，收集之多，可以说是近古所未有。其他如陈其镛译的《蒙古西域诸国钱谱》也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货币的必备参考书。

#### 玺印、封泥与砖瓦

道光、咸丰以来，由于考古的范围日益扩大，因而由玺印的收藏与研究，又推广到封泥。刘燕庭《长安获古编》首先收集了封泥，因而收藏研究者日多，印玺的研究又广阔了一步。

吴式芬、陈介祺同编的《封泥考略》——收集簠斋、双虞壶斋所藏的封泥，由古钁到私人印信，共十册，包括中央官、地方官、私人印等各样封泥，每一条下俱加以释文、考证并记出土地点。按照汉代官志、地理志，考证汉代行政制度，是对汉代考古相当重要的一种著作。

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是陈氏簠斋所藏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所藏，加上李璋煜、吴式芬、吴云、吴大徵、李佐贤

等人的藏印,按古铤、汉印、各种质料(陶、铜、玉等)、各样字体(古文、小篆、爻篆等)、各样形式(两面、四面、六面套印等)、各样章法(姓名印、姓名之印、姓名私印、姓名回文等)等类。收集之多,分类之细,是前所未有的印谱。

吴大徵《十六金符斋印存》——包括古铤一,余俱为汉印。宣统元年(1909)由西泠印社影印,朱地白文,只有印样,没有释文及考证。

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掇》——共六百余方,初收时因高氏系潍县人,故多齐鲁出土者,后燕、秦、楚、越搜集者多,就不限于山左了。其中包括三代古文铜官铤,铜、银、玉私铤,秦汉官印、私印、吉羊、日利、长乐,以及生肖等小捺。朱地白文,带考释。作者为清末刘燕庭以后重要的古印收藏家。

郭申堂的《续齐鲁古印掇》——郭氏为高庆龄之甥,收藏古铤印,越过郭氏,三代古文铤印四册,其中最大古铤,为各家收藏所未见,汉官私印十二册,朱地白文,也无考释文字。

《陶斋藏印》——共四集,每一集中,俱有三代古文小铤和汉官私印,还有单字小印及生肖小捺等。

以上各印谱,都是在西洋摄影法传入后的石印,因而保有原印文的样子,与摹勒者不同,这应是近代考古学影印法的先驱。

其他如吴云的《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李佐贤的《得壶山房印寄》、王石经等的《古印偶存》、吴大徵的《周秦两汉名人印考》、刘鹗的《铁云藏封泥》等,应都是玺印考古的重要著作。

在砖瓦方面,较前期更为发达,如陈介祺的《簠斋藏陶》、吴大徵的《愔斋藏瓦录》、陆心源的《千甌亭砖录》及《千甌亭砖续录》,以及端方的《陶斋藏砖记》、刘鹗的《铁云藏陶》,除陶文外,又附有封泥。对砖瓦的研究,清代末年,较乾嘉时代,更要发达,

从而奠定了现代考古学的基础。

#### (6) 金石史目与金石研究的技术、方法

金石学的盛行,到清乾嘉以后,金石学研究者,开始对金石学家,作出简略的传记。类似金石史的著作开始出现,如:

李遇孙的《金石学录》[道光四年(1824)镌,因乾嘉以后,只此一书,因系起凡,故列入同光殿内]——曹魏以前,摘录《左氏传》、《周礼》、《国语》、《家语》、《史记》、《汉书》等书,有金石铭文的文字。魏晋以后,以人为纲,由孟康张晏起,经唐宋为二卷,由清初至乾嘉,自孙承泽起,至姚观光止,以小传体例,记出金石学家的研究成果,以及各种金石书目的著录。

陆心源的《金石学录补》——从晋陈勰起到清王朝桡止,对于每个人,不仅记他的金石学成果,同时又写出小传,完全补李遇孙未收入的人物。清代金石学家与李氏书一样,几乎占全书的一半。同时嘉庆、道光以后的金石学家,由陆氏书补入进去。参考的书籍,较为广泛,收入的人物,甚至超出金石学,是考古学家必须参考的一种书。

另外,近代褚德彝的《金石学补续补》,又补陆书的不足,仅次于清,凡清末潘祖荫、吴大澂、盛昱、王懿荣、端方、叶昌炽、缪荃孙直到现代罗振玉、王国维诸人。但收入人物还有清末碑估李云从等人物,所以体例方面不如李、陆二氏书。

金石书目,有叶铭的《金石书目》、凌霞的《癖好堂收藏金石书目》等书。

金石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到清末时陈介祺应是金石收藏最突出的人物,所以他总结两种经验:

《簠斋传古别录》——分四种记述:一、拓字用具、用纸、上

水、作拓包等经验；二、拓字须登记作目；三、拓器时应知易损坏处须小心，如铜爵足腹易损、古币至薄等经验；四、介绍剔字最好用针，去铜斑须用淘米水合山楂捣成泥，敷器上，揭去用竹刀刮锈，器不受损，用醋最不宜等经验。

《陈簠斋笔记》——内容包括拓铜器款识的方法，研究金文，应笔记各家学说，编金文文法体例，释文要先分段，先写古字，后注今字。考定是否与经传符合，对器物用途须分类，写金文必须知篆意，最好要作图照像，这样来研究金文，今天还是要遵守的。

因此，我们认为陈簠斋的金石文字研究的技术与方法，一定要承袭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

#### (7) 金石文字的研究

##### 对金文款识的摹写与研究

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共收集一千三百八十一器铭文，按钟、鼎、簠、盘等类排比次序，每一条内摹出铭文，记出来源，甚至引入诸家之说，加以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上》（考器）、《彝器说中》（考文）、《彝器说下》（考藏）三篇论文，方氏收集之多，为阮、吴、关三家金文所赶不上的。

吴大澂的《愔斋集古录》——收集金文一千四百四十种，分类排比，如鼎、尊、壶、敦等。每一条金文，俱用原拓本影印，然后释文，再加以考证，如十二个郎钟、六种秦权文、十三种秦诏版文，应是最重要的著录，同时甄别精严，考释确当，是前人所赶不上的。

其他如盛昱《郁华阁金文》（未出版），朱善骅的《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也是摹写款识的一种著作。

#### 对古文字个别的研究

同治、光绪以来,研究金石的学者们,除掉以上各项的研究外,又发展出对古文字的比较研究,所取材料更及于玺、印、陶文。在字的本身上,又以音、形,得出假借、互通的考释。对古文字研究来说,是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主要的人物,为吴大徵与孙贻让。

吴大徵的《说文古籀补》——以许氏《说文解字》中的字为次序,按三代金文,陶、玺印文的写法写出,如“用”字即集散氏盘等十器铭文,“簠”字集曾伯噩簠等十四器铭文。“永”字集史颂敦等四十二器铭文。许多字又加以考释,补《说文解字》小篆以前的文字,可知文字发展的过程。吴氏《字说》也是对古文单字的考释著作。

孙贻让的《古籀余论》——选集吴子苾《捃古录·金文》中的复杂而有疑难的铭文,共一百零五条,加以诠释,不仅据各器铭文比较研究,同时又互证互通,如“师周敦”条所释“攸”字,“古交声,爻声,字多互通”,以及用段假互用等解释。孙多识许多不能识的古文字。孙氏《古籀拾遗》也是同一类的精心之作。

## 四、清代的美术考古

### 1. 清内府收藏的美术品及其鉴定编目

清内府收藏的美术品种类很多,其中见于著录的有书、画、缂丝、刺绣四种,另外还包括一些刻绘。这些美术品,到乾隆时,算是收集得相当多了。自乾隆八年(1743),开始编《秘殿珠林》

美术品目,编纂的凡例中说:“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入选者铃用玺五,曰“乾隆御览之宝”,曰“乾隆鉴赏”,曰“三希堂精鉴玺”,曰“宜子孙”,或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今择其尤精入者,各加铃玺二,或曰“秘殿新编”、“珠林重定”,或曰“石渠定鉴”、“宝笈重编”。贮五处者分铃玺,一曰“乾清宫鉴藏宝”、“养心殿鉴藏宝”、“重华宫鉴藏宝”、“御书房鉴藏宝”、“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以上每件俱同,书中统记曰八玺全,五处外别贮者,则曰七玺全,以归简易。

编纂的美术品目有:

张照、梁诗正等编的《秘殿珠林》——二十四卷,除开始为世祖圣祖、世宗及皇太后手书,以下收白居易以下历代名人书册,陆探微、阎立本、吴道子、李公麟和元明等各大家的释道画像,以及宋、元、明的缂丝、绣像等。每一目下,记出贮藏某一宫内,什么样绢,什么色画,有那些人印章与题记。开始于乾隆八年(1743),成于九年。九年仲春又把分贮乾清宫、御书房、重华宫、养心殿四处,及画禅堂、三希堂、长春书屋、随安堂、汲古斋、贮云馆、淑芳斋、静怡轩、三友轩等处美术品,编成《石渠宝笈》。

王杰、董诰等编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只记乾清宫藏品,包括乾隆书画三十七件,前朝、清朝名人书画、集锦书画、刊本经典、缂绣书画等,每项下记出本幅质料、尺度、书画款识、铃印,以及是否有跋,鉴定宝玺是否为八玺俱全等。另外法书墨迹,则录出全文。校正集编纂得比较详细一些,乾隆五十八年(1793)编成。

英和、吴其彦等编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把二千余件前所未编入的纂入三编。嘉庆御书品,用“珠林三编”(或曰“宝笈三编”)、“秘殿珠林所藏”(或曰“石

渠宝笈所藏”)二玺。古今臣二书画,则用“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或曰“秘殿珠林”,或曰“石渠宝笈”又加“珠林三编”,或曰“宝笈三编”一玺,以示别于续编,体例与续编相同。这些美术品分藏乾清宫、延春阁、慎修思永、避暑山庄、毓庆宫、御书房、秀清村、养性斋、御兰芳、狮子林、静怡轩、谐趣园、富春楼、澄心堂、宁寿宫、清晖阁、保和殿、太和殿等处。三编中仍然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分纂。历代帝王像、功臣像编入三编之《石渠宝笈》中。

## 2. 清代各家对美术考古的著作

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对于一生所收藏的历代名人墨迹、名画碑石以及所看到的书画等,每一条下俱有详细记录与考证,如《王子敬地黄汤帖》,先记有秋壑印、三桥跋,后考为米海狱临本。李伯时临唐韦偃《放牧图》,初记画的内容,然后记洪武三年(1370)为羽林将军叶日升所进,有手书跋语。孙氏锐意收藏,全是亲自过眼而加以考证,与传闻或抄文献者不可同日而语。

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凡高氏生平所过眼的书画,作出记录,包括尺度、质料、款识、题跋和图记,完全以鉴定为主,因而不记书画人的爵里。高氏在内廷供奉十余年,经眼的作品,不是一般人所能赶得上的。

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分书考、画考两部分,各三十卷,每部分中先作出书考引用书,或画考引用书,然后按次收入历代的书评、书旨或画论,以及历代法书、名画的收藏家。书画目中以人为纲,考证作家爵里和他的作品目。日以后就是作品本身的记录。凡是卞氏过眼的,都要记出质料、尺寸、内容和

图记。诸家的题跋,见于书画史的又以外录项下抄出。为了作比较好比较,虽未见过的,也以外录项下记出某一作品。如“展”、“子”项下,除记出卞氏见过的《游春图》外,又找出展氏的《长安车马人物图卷》来辅助认识展氏的作品。这样的美术考古书,是有相当价值的。

姚际恒的《好古堂家藏书画记》——用杂记题材,把收藏的书画,全部内容叙述出来。重要的作品,如董北苑的《潇湘图》,记出尺寸和画的内容,以及收藏人的辗转收藏历史。《宋人宫女勘书图》,记有晋府收藏的图书等。有的记出题语,如沈石田仿倪雲林著色山水,即记出“迁叟秋风客,晚年江海家”的诗句。这不是随意记出,而是借以辅助鉴定真伪的。所以姚氏书,也是书画目和鉴定书画的一种著作。

其他如乾隆末年,吴江汪朗的《湖中画船录》,道光、咸丰时代韩泰华的《玉雨堂书画记》,同治、光绪时代张庚的《图画精识》,都是以人为纲的画目,然后记述内容,以及收藏人物、题款、印章等,也是美术鉴定的必要读物。至于道光时代钱杜的《松壶画忆》,是以杂记题材,对美术作品的著录与考证,所记山右平阳城隍庙中地狱变相,虽非吴道子笔,但能脱俗眼重视壁画,应系千百人中的翘楚,非一般画记所能赶得上的。

### 3. 对历代瓷器的研究

宋代以来瓷器制造,大为盛行。明清以来,瓷器的著录与研究,已成为专门的知识。虽不是纯艺术品,但在工艺制造上,还未超出艺术的范围,同时在人类生活物质资料中,又占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列入美术考古的范围内,清代这一方面的著作,有:

无名氏的《南窑笔记》——记述柴汝观[宋大观年间(1107~1110)命陶官专督故名,“观”应系“官”字之讹]哥、定、龙泉、钧、永乐、宣、成、宏、正德、嘉万、厂官等窑出品的特征,以及色彩、制作上各样的方法等等。

梁同书的《古今诸窑》——从唐越窑起,到清官窑止,共记二十六种窑址。每一项下,都记制造的特征,以下又记陶器青为贵,陶器画彩盛于明,还记出古瓷合评、明窑合评等项,这都是鉴定瓷器的重要文字。

朱琰的《陶说》——由于朱氏客游饶州,曾亲至景德镇参观各窑厂,因而《饶州今窑》、《陶冶图说》都是研究瓷器者最重要的资料。尤以图说是根据唐英进呈的图说,加以按语。“说古”节中,是博采诸人鉴定的经验,再加上朱氏自己的经验。“说明”节中,又是考定明瓷最好的经验。最后“说器”节,多采诸书记录,在考古态度上是相当严谨的。

蓝浦的《景德镇陶录》——是对景德镇窑厂出品作出全面的记录,其中卷二“镇器原起”是对各样不同作品的记录与考定。卷三“陶务条目”是对制瓷工作过程的记录。“镇瓷花式”是记录镇窑出品的各种形式。“仿古各泐色”是记录仿古时代的作品,如铁骨大观泐、铜骨无纹汝泐、西洋雕铸像生器皿等。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所记元枢府、湖田窑,明洪、永、宣、成、正、嘉、隆万、龙钢、雀公、周、壶公、小南等窑,清康熙年盛窑,雍正年年窑,乾隆年唐窑等,把各时代器物的特征,全都记录出来,这是最重要的鉴定元、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经验。其他如《镇仿古窑考》、《陶器杂说》,主要是抄录文献,并不十分重要。

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是清末最重要的一部瓷器考古著作,分为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

说杯盘、说杂具、说疵伪等大类,其中“说窑”为历代窑史,“说釉”用宋、元、明各代各窑具体的出品,说明如钧窑釉扣之甚平而内现粗纹,广窑釉,扣之甚平而中现蓝斑,钧窑以紫胜,广窑以蓝胜。“说彩色”如硬彩、青花以康熙朝为极致,粉彩以雍正朝为绝美,乾隆朝夹彩最盛,镂金错彩,几于鬼斧神工,也是以具体实物来说明的。“说花绘”、“说款识”以及其他都是用作瓷器作品来解说,因而许氏瓷书应是最重要的瓷书。

寂园叟的《陶雅》——也是清末(光绪、宣统时作成)瓷器考古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以杂记体例,总结鉴定分析各代、各样的瓷器以及陶瓷的著作,共九百一十条。自序中说:“康、雍官窑,穷极美丽,万国周通,名益大显,乃元汴绘图断自胜国,朱琰撰说,不及本朝……三百年间,阙而无征。”所以全书内容所记的,几乎全是清代瓷器的鉴定,如康彩、雍彩、郎窑红、官窑、乾隆古铜彩、釉里红、祭红、慎德堂为道光窑款、乾隆古月轩款器等。把清代的各朝各样式的瓷器,几乎都记录出来。《瓷香馆记》中说:“余蓄古瓷日益富,香各不同……余二十年来所见,苹果绿印合以百十计。”足证寂园叟是最大的瓷器收藏家,因而能有这样的著作问世。

## 五、清代古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 1. 高士奇的《金鳌退食笔记》

高氏供奉内廷,赐宅太液池西,前后七年,朝夕过金鳌玉蜆桥,得遍览苑内各景物,因而对南海、中海、北海的建筑,俱加记

录,并考证源流,内容包括总记三海,然后南海中瀛台、乐成殿、紫光阁、芭蕉园、玩芳亭,北为承光殿(圆城内),再北为琼华岛,山上为白塔。然后又记大高玄殿、玄都胜境、五龙亭、凝和迎翠殿、西海神祠、乾祐阁、大西天经厂、宏仁寺、清馥殿、腾禧殿、玉熙宫、万寿宫、大光明殿、兔园山、亲蚕殿、惜薪司、西十库等等。徐乾学序中说:“其地自金、元、明以来,所严闼外庭罕知其详。”高氏书因此可与《三辅英图》、《东京梦华录》相媲美。

## 2. 杨宾的《柳边纪略》

该书主要考山海关外各城市的历史、地理以及风俗习惯等,如其中记载盛京城和清故宫,明辽镇敌台、路台遗址建筑,宁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阑旧城。“大与今京城等,内紫禁城,石砌女墙,下犹完好,内外街道隐然,瓦砾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为东京。”城内有石塔、石观音像、国学残碑等。卷四末,记船厂西二百里薄屯山、金完颜娄室神道碑和盛京宝胜寺石碑等等,对东北考古来说,还是较重要的一部著作。

## 3. 朱书的《游历记存》

该书本来数十卷,今只遗燕秦道上的考古,其中如北京城外的天宁寺塔和卢沟石桥、保定的杨忠愍公祠、庆都的尧母陵、真定龙兴寺大悲阁内的观音像、介休郭林宗的墓和祠、闻喜县裴晋公故里凤凰原上裴氏族数百冢墓。东镇下镇有唐兴寺,还有唐开元二年(718)、宋淳化年(990~994)、金正隆年(1156~1160)碑,县城东门外裴晋公祠,有张九龄撰裴光庭墓碣。本书还记有

潼关尧山的故城、华阴庙的碑刻以及临潼与长安两地的古迹等。虽然仅此一段游记,但对古遗址、遗迹的调查,是相当详尽的。

#### 4. 刘锡信的《潞城考古录》

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完全是考古录,如潞河东八里古城,考为汉渔阳郡治潞县城遗址,《州城考》引唐长丰令李君墓志,证为唐时潞县。州城西北安德乡,考为魏安乐故城。州城西北四里的古长城遗址引唐李丕墓志石,证唐时遗址尚存。其他如《石罗汉年代考》、《金石遗文》等,都是通州地方考古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下卷史事,当然也是地方志的重要史料。

#### 5. 黄易的《嵩洛访碑日记》

黄易为作此书,调查为时仅一月零四天,足迹不过汴、郑、荥阳、登封、偃师、洛阳、卫辉等地。但所调查的,有郑州开元寺,荥阳汉闻喜长韩仁铭、等慈寺碑,登封少林寺天平二年(535)僧洪宝与武平元年(570)冯晖宾二碑、永兴四面像及天保八年(557)僧静明造像碑,邢家铺附近的少室石阙,嵩阳书院的唐天宝碑,崇福宫内宋、金时塑的三清像,东数十步的圣母阙、观圣母石,中岳庙的太室石阙(庙前的二石人,东石人顶上有“马”字),庙西华门内宋、金四碑,峻极门外东阶寇谦之碑、唐咸通六年(878)修庙碑和殿前金正大年(1124~1131)铸的铁狮子,大门内宋铸四守库铁人,南门外告成的周公庙,北门外积翠峰下的会善寺。过偃师至汉、魏洛阳旧城东寺里碑,调查四齐碑,西至白马寺,南游龙门,拓魏、唐人题记。然后由卫辉经曹州还济南,其中以调查登封诸遗迹最为详尽。

## 6. 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

该书是汇集记载关中各文献资料而纂辑成的,仍采地方志的体例,有释名、沿革、形胜山川等。但最重要的是古迹,如宫阙、苑囿、第宅、寺观、郊邑遗址与陵墓等。其中包括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延安、榆林、六府和商、乾、邠、兴安、鄜、绥德等六州,共三十卷。而西安因系历代帝都,即占八卷。虽然主要是编纂文献资料,但每一遗址,都能举出一定的地点,这与实际考古调查是分不开的,因而是关中考古必备的参考书籍。

## 7. 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与《西域水道记》

徐氏虽非乾嘉时代的金石学家,但由于纂辑《全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抄出《河南志图》证为宋次道旧作,因而采集金石传记作《唐两京城坊考》,内容仿《长安志》体例,分宫城、皇城、三苑、外郭城以及城内各坊的寺院、第宅等。固然徐氏没能到长安作过调查,但他的取材,是各样文献和金石墓志等。如卷一宫城太极殿太极门,引《永乐大典》载阁本太极宫图“禁苑广运潭”条,引宋崔敦礼《广运潭铭·序》,记唐天宝年中赐名广运的经过。各坊中“第宅”条所引碑铭墓志极多,因而虽非调查材料,但所取材料,还多是考古方面的。

《西域水道记》当然是一种水道提纲,但记了许多古遗迹。如“苏勒河”条记苦峪城东的大浮图、曹义金时“大兴屯屋”的残石、西源党河附近鸣沙山莫高窟千佛岩塑像、《周李召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乾隆癸卯(1722)掘出有东晋建元二年(344)沙门乐

傅立的断碑、《唐李氏再修功德碑》与《元阜庆寺碑》等,城内《索勋纪德碑》、叶尔羌城东南隅的古塔、城南的古冢。“渭干河”条记有赫色勒河岸的千佛洞、丁谷山口的石窟、喀喇和卓之炎州城与唐交河城、济木萨北护堡子破城的北庭都护府遗址、唐金蒲县残碑,以及南山中的千佛洞、巴尔库勒南山的唐《姜行本碑》、镇西府城的《裴岑纪功碑》、宁远附近海努克军台南的残刹,还有壁画藻井等。本书还记有阿里玛旧城附近阿里玛图沟西的四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旁出土的金、银、铜三种钱,特穆尔图淖尔之喀喇布拉克水,所经台毕尔哈图山口西,海北岸有翁仲数十,等等。徐氏书虽以水道为纲,但亲历其境,备访古迹,为治西北考古不可缺的参考资料。

## 8. 王树枏的《新疆访古录》

书中先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裴岑、乌垒等汉碑,吐鲁番六朝写经,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残书、沮渠安周造寺刻石。卷二记唐《姜行本碑》、张怀寂墓志、仪凤二年(677)北馆厨牒、库车盐水沟丁谷山石窟等。书中还载有畏吾儿残字、吐鲁番库车出土铜印、吐鲁番朱书专志等,应是徐松后国人惟一对新疆考古的著作。

清代由于西北的开发,设省立县,因而治西北地理的人很多,如祁韵士、椿园老人、陶葆廉、裴景福等人,都曾记录和考证山川地理,但主要是对历史地理的发挥,因而不列入考古学史的范围以内。

## 六、考古杂记

元明以来,由于古器物大为社会人士所重视,收藏鉴赏者增

多,因而考古杂记如《云烟过眼录》、《砚北杂志》、《格古要论》、《铁网珊瑚》等考古杂记就日渐加多。清代承袭元明,这类著作,当然也有了许多,其中值得提出的如下。

### 1. 孔尚任的《享金簿》

孔氏是清初一个小收藏家,因而自己收藏见过的文物也很多。内容有宋拓各种法帖,宋、元、明各名家书画,三代铜器,汉虑饒铜尺、宋三司布帛尺,汉弩机、铜印、玉器、瓷器、雕漆等。最末记出孔氏自收藏唐韩滉的“小忽雷”、绍兴内府的“大海潮琵琶”、万历宫中的“吟蝉小琵琶”和有万历玺印的“黑漆阮琴”,以及“嵌金钿花的羯鼓”。这些文物,可以说是稀世的瑰宝,至今“小忽雷”仍在人世,诚非易事。

### 2. 谢堃的《金玉琐碎》

该书把谢氏自己收藏和见过的文物记录出来,如所记孔尚任的虑饒铜尺、铜鼓、铜兵器、霍光璧,还记载各种研石、古砖、瓦当、齐侯钟与陶器的出土,各窑瓷器的鉴定等,可以称作琐碎的杂记。

### 3. 徐康的《前尘梦影录》

该书是清末考古杂记中最精心的著作,内容首先记墨,如阮相国积古斋打碑墨,康熙时休宁继程方而起的墨工曹素功,嘉庆、道光年间的汪近圣,太平天国后的胡开文、詹姓墨铺等。其

次记纸、笔、砚,如十砚斋主人黄莘田遗物,顺治以来开端溪制砚事,以及元康里子山研。以下记如曹秋舫藏器,如吴云购得齐侯罍,又得中罍,因名“两罍轩”事。还记有江南汉、晋古砖,唐、明符牌,方定远收藏的郢爱,以及各种法帖。本书虽然不是有系统的考古著作,但在考古学上,起了相当的作用。

#### 4. 其他著作

此外还有《石刻杂记》体例,如叶昌炽撰的《语石》,是清末对碑石最有研究的一种著作。序中说:“此编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外降,藏弃之源流,以逮摹拓裴池,轶闻琐事,分门别类,不相杂厕。……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释,非辑录,但示津涂,聊资谈圃。”因而卷一是历代碑石的简介,卷二记各地方各国的主要碑石,卷三考碑石起源和碑石的种类,卷四以下为各样碑石的杂记、历代书碑石的各大家题名、各样人物、碑石的书体,以及传拓的轶闻琐事等杂记。虽然不是金石录,但在金石学研究上确是极重要的一种著作。

### 七、清末考古学上的三大发现

#### 1. 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

甲骨文的发现是清末考古学方面最大的发现之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服药,自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到龙骨,其中刻有文字,为王氏家客刘鹗所看见,乃告懿荣,证

为古文。于是聘到各药市收集一些。第二年潍县古董商范某以百余片,潍县赵执斋以数百片,俱售予王氏。<sup>①</sup>同时孟定生和王襄,也在这时由潍县古董商手中购得一些。<sup>②</sup>潍贾范某之所以能售甲骨,是由于戊戌年范作古物商在天津见到孟定生,谈及安阳农村收获花生时在土中捡得甲骨事,孟以为是古简,促其速收。第二年范携甲骨来津,价昂者孟、王不能买,因为王懿荣所买。<sup>③</sup>由范某经手在安阳收买的甲骨,另又献给端方,每字酬银二两五钱,光绪三十年(1904)即买到了千片,另外也卖给黄心甫(黄潜的父亲)六百片,徐坊一千四百片。<sup>④</sup>

稍后几年罗振玉就大为收集,宣统元年(1909)买到一批甲骨,二年确知出土地点在安阳殷墟,三年命弟罗振常、妇弟范兆昌到安阳搜购,二人共住安阳五十天,约得一万两千多片。<sup>⑤</sup>

同时民国成立(1912)以前,外国人收集的,光绪二十九年有潍县长老会教士方法斂和青州浸礼会教士库寿龄,次年小屯地方朱坤大举掘得的甲骨,也卖给方、库二人。<sup>⑥</sup>光绪三十一年日本东京文术堂也买得甲骨文字一百片,林泰辅后来又买到六百片。<sup>⑦</sup>

甲骨文字自发现到清亡,其间收集最多的应属罗振玉氏。

---

① 沙翁:《龟骨文》(1931年北京《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铁云藏龟·自序》。

② 王襄:《题所录贞卜文字册》(1933年《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32至33期)。

③ 王襄:《题易簠西殷契拓册》(1935年《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85期)。

④ 《甲骨年表》“一八九九年”条;胡厚宣:《殷墟发掘》,25页。

⑤ 罗振常:《恒洛访古游记》“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条。

⑥ 方法斂:《甲骨卜辞七集材料来源表》,《甲骨年表》第3页。库寿龄:《河南之卜骨》(1914年《亚洲文会杂志》第45期)。

⑦ 胡厚宣:《殷墟发掘》,29页。

所以在整理上,也以罗氏为最有成绩。

## (1) 甲骨文字的研究

初期甲骨发现后,当时学者虽然认识是文字,但还不能全部认出究竟是什么字,最早的甲骨书把文字拓出影印的有:

刘鹗的《铁云藏龟》——是光绪二十八年买到王懿荣全部的甲骨一千多片和刘氏自己收藏的,选拓千余片,于光绪二十九年影印出来。只介绍原始资料,并没有释文或考证。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凡罗氏所收藏的甲骨,分八卷,将拓本影印出来,序中说:“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则又再倍焉……拟先编墨本为殷墟书契前编,考释为后编。”此为《铁云藏龟》编印后最重要的一种甲骨资料。

## (2) 甲骨文的考古价值

根据甲骨文字,考证殷代历史和发挥古文字变迁的研究,有: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根据刘鹗《铁云藏龟》的五千片甲骨,按单字分为日月(如干、支、岁、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等十类,每一类下举出许多单字,每一字下写出原字,注出见于《铁云藏龟》某一片,与金文、《说文解字》相较,应释为何字,是最早考释甲骨文的一部著作。

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以罗氏历年收集的甲骨文字,分为三类。一、《考史》证殷墟非河亶甲都,武乙并未迁沫。殷王名“湜”见子《卜辞》者十七,证《史记》“天乙”为“大乙”之误。

二、《正名》由甲骨的古文与籀文多吻合，如“四”字作“𠄎”，并非不同。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笔画，如羊、马等字，与金文相发明，如“𦍋”字亦见于孟鼎。更可纠许氏书之误，如“弋、式、戔”，许称为籀文，殷氏注为古文，其实甲骨文并无这种写法。三、《卜法》从甲骨中考证“贞”、“契”、“灼”各法，“致墨”是唐人卜法失传之误。“兆圻”现象，《卜辞》文语，尽贞后方“藐藏”，并用“骨卜”等考证。这篇著作是中国甲骨学中最早的研究论文。

此外还有孙诒让的《名原》，是对甲骨文单字的考证。日本林奈辅、富冈谦藏也都在民国成立以前，写出有关甲骨文的一般性的论文。

## 2. 流沙坠简与敦煌莫高窟古本写经的发现

自从列强侵入中国以后，西北一带也成为他们的角逐场。于是各个国家的探险家都要到新疆、蒙古一带勘察，首先是匈牙利地学会会长洛克齐(L. d. Yoczy)和斯希尼(Szecheny)，光绪五年(1879)到西北考察地质，曾到过敦煌千佛洞。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大尉包渥(Bowez)等，又在新疆库车佛塔里面，盗窃过桦皮书写的5世纪中叶的药方及4世纪的佛典。光绪二十五至二十六年(1899~1900)，法国人博南(C. E. Bonin)又由莫高窟窃去版画四帧。<sup>①</sup> 这些人物对于西北考古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因而有流沙坠简与莫高窟古写本的发现。

### (1) 汉长城线上木简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和三十二、三十三年间，英国人斯坦

<sup>①</sup> 傅振伦：《百年来西北边疆探险年表》，《文物参考》，二卷五期。

因氏(Stein)两次在南疆尼雅遗址发现带有封泥的佉卢文字的木简(藏文的木简),一打以上的汉文木简,没有开封的近三打的木简。<sup>①</sup> 古楼兰遗址,所谓蒲昌海附近,也发现了佉卢文、婆罗谜文、窣利文、土耳其斯坦文和汉文的木简以及帛书、纸片。<sup>②</sup> 汉长城线上,敦煌东西数百里中,俱有烽燧,烽燧遗址几乎全有木简出土,据斯氏编号的有三十五处,出土木简的有二十八处。其中小方盘城玉门都尉治所出土的更多。<sup>③</sup> 于是对汉代西北边防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书籍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资料。

## (2)敦煌莫高窟古写本的发现

莫高窟人所尽知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圣地,同时也是中国古图书保存的一个圣地。汉晋以来的木简,既然在尼雅、楼兰、汉长城一带发现,同时晋、魏、隋、唐的卷子又在莫高窟中发现。莫高窟有石窟四百八十多个。其中古汉桥北七佛殿下研究所编号十六窟窟门洞北壁中间,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发现一小毗诃罗窟。窟内藏有两万多卷各种古写本、刻本的卷子和纸本、绢本或麻布的佛画,以及地毯之类艺术品。另外还有唐大中五年(851)“赐沙州僧政敕”的刻石。发现这批古籍的王道士不知道是稀世的瑰宝,有些佛经卷子,或佛画,常常送给施舍他钱财的施主们。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肃学政叶昌炽托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搜求古金石,得了一些卷子。他向藩台衙门建议,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55、57、71、73页;王國維:《流沙墮簡補遺考釋》。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79、105、106页;罗振玉:《流沙墮簡簡牘遺文考釋》。

③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27、128、134页;王國維:《流沙墮簡簡牘遺文考釋·附录》。

把千佛洞古物运至省城保存,因运费要五六千两,苦无着落而罢。光绪三十年3月省令敦煌县检点经卷画像,照旧封存起来,不为人所重视。

光绪三十三年英国人斯坦因到了莫高窟,经过蒋咨生(孝琬)的翻译,发现藏经洞里有古文书及佛画,遂用欺骗的手段,答应捐给王道士一批款。王道士同意斯坦因自己检选,经过七夜的选择,斯坦因搬走写本、刻本二十四箱,绢画、绣像等艺术品五箱,加上民国三年再次窃去的前后共七千多卷子。

光绪三十四年法国人伯希和也特意到敦煌莫高窟,又窃去十多箱,有四千多卷子。次年伯希和携带这批卷子过北京时,为学部王仁俊、罗振玉等人看到,遂建议政府收归国有。宣统元年,所余古写本运到北京,拨交京师图书馆保藏,约八千多卷。

学郡大臣李盛铎在未正式交部以前,又检选出几百卷。

宣统三年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考察,又从王道士和乡人们手中,买去三百卷左右,零星散在私人手里的也有一两千卷,共计起来有两万卷以上。

卷子的类别有以下几种:

佛经和道经——《妙法莲华经》、《老子化胡经》、《孝子道德经》。

小学书和韵书——《训蒙书》、《新合六字千字文》、《唐韵序》、《刊谬补缺切韵》。

经、史、子、集——《隶古定尚书残卷》、《闾外春秋》、《敦煌冯氏家传》、《刘子新论》、《原本六韬》、《高适诗集》、《白香山诗集》。

俗文学——《明妃传残卷》、《太子人山修道五更转》。

律令和公文书——《唐杂律》、《水部式》、《开元间判词》。

地方史与地方志——《张氏勋德记》、《沙州图经》。

户籍帐与纳税——《敦煌悬泉乡残户籍》、《唐代税布》。

民间生活资料——《社司转帖》、《婚事程式》、《兄弟分家契》、《寡妇阿龙诉状》、《家宅图》。

方技书——《新修本草》、《脉经》、《星占书》、《大唐同光四年具历》、《墓经》、《葬录》、《相书》、《古算经》、《大唐新定吉凶仪》。

其他宗教经典和西方少数民族的文字——《摩尼教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粟特文经》、《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之和阗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婆罗谜文、土耳其文。

此外绢本佛画，有各种经变画，如灵山说法、菩萨图像等。刻本中如唐咸通九年(868)王珍为父母造的《金刚经》卷子。版画方面如五代晋开运四年(947)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刻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等。

由于敦煌一地发现了汉、唐两代最重要的文化资料，使汉、唐两代社会的研究，有了新的途径，它的重要是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同的，所以清末这三大发现，在考古学上起了新的变化，因而“敦煌学”成为考古学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 八、清末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

### 1. 西方学者初期在中国北部和西北的考古

#### (1) 清末俄国拉特禄夫和包他宁等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光绪二年至六年(1876 ~ 1880)俄国科学院院士拉特禄夫(W. Radlov)与包他宁(G. N. Potanin)第一次到内蒙古科步多

(Koldo)地方旅行。光绪十五年(1889)亚丁芝夫(N. Yadrintyev)在鄂勒昆河畔发现苾伽可汗及阙特勒碑。光绪十八年拉特禄夫写出《蒙古考古图》。光绪十六年芬兰探险家赫开尔(Heikel)到鄂勒昆河左回纥都址黑虎城(Kara Balghacur),发现《回鹘毗伽可汗纪功碑》及 Erdenitson 之和林遗址。光绪十八、十九年波兹尼亚夫(A. Pogneyev)调查蒙古各地古城、古墓、废寺址等,光绪二十二年写出《蒙古与蒙古人》一书。<sup>①</sup>

## (2)敦煌莫高窟为西方所知

光绪五年匈牙利人洛克齐(L. de Loezy)曾到敦煌莫高窟,因而欧洲人知道东方有这一所艺术宝库。<sup>②</sup>

## (3)清末俄国柯兹洛夫等三人在新疆和西藏的考古

光绪十五、十六年俄国柯兹洛夫(Koglov)等三人到新疆,入西藏考古,英人包渥等在库车佛塔里搜劫去许多文物。其中桦皮书经典为5世纪中叶的药方和4世纪的佛典。<sup>③</sup>

## (4)清末瑞典斯文·赫定到中国的考古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六年——自十九年起瑞典人斯文·赫定到中国西北经青海入鄂尔多斯考察。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俄国学士院派克里门慈率探险队正式在新疆吐鲁番发掘。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法人博南(C. E. Bonin)到敦煌莫高窟窃去版画四

---

① 驹井和爱、江上波夫:《东洋考古学》,78~82页。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37页。

③ 傅振伦:《百年来西北边疆探险年表》(《文物参考资料》,二卷第五期)。

帛,有大历十一年(776)乾宁元年(894)题记。<sup>①</sup>

## (5) 清末英国人斯坦因到新疆探险考古

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英国人斯坦因到新疆探险,在和阗附近的约特干地方采集许多古于阗国的遗物,并在丹丹乌里克发掘寺院遗址,得到壁画和于阗文、婆罗谜草体字、汉文的各种文书。在尼雅又发掘了汉代遗址,得了许多楔形佉卢文木牍、长方形佉卢文木牍、羊皮的佉卢文、文书、封泥和各样木器雕刻与毛织品等。

## 2. 日本学者在东北、蒙古和台湾的考古<sup>②</sup>

### (1) 光绪、宣统年间鸟居龙藏的考古活动

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二年(1895 ~ 1909),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上调查石器时代与汉代遗迹,发掘老铁山头的石冢等等。他在东北考古学上是最初有贡献的一个人。同时八木槎三郎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名义,也在南满洲进行调查。滨田耕作又于宣统三年至民国元年(1910 ~ 1912)两次到旅顺刁家屯、营城子、牧羊城驿对古城古墓进行调查与发掘。

光绪三十一年到宣统三年(1901 ~ 1911)鸟居龙藏和他夫人曾到东蒙一带调查。<sup>③</sup>

光绪二十三年以后鸟居龙藏、八木槎三郎、田中正太郎、森

---

① 傅振伦:《百年来西北边疆探险年表》。

②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五、六章。

③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12页。

丑之助等,对台湾石器时代遗迹作了许多调查与发掘。<sup>①</sup>

### 3.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成立)以后 外国学者在中国西北各地的考古

#### (1)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外国学者在西北的考古

1902至1903年德国格尉维代尔(Grunwedel)和胡思(Huth)到库车吐鲁番等地对石窟寺和高昌首府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1904至1905年勒柯克(Lecoq)到库车赫色尔等地方调查千佛洞,并盗去最有价值的壁画。<sup>②</sup>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等人由西伯利亚赴新疆,在库车、于阗等地盗掘。<sup>③</sup>

#### (2) 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五年(1905~1916)外国学者在西北的考古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德国人格尉维代尔和勒柯克等先后又两次到新疆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等地调查发掘各石窟、寺院以及各遗址,把所劫取的壁画、佛经等,集中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内。<sup>④</sup>

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6~1908),英国人斯坦因氏在磨朗、罗布泊和东去敦煌路上、汉长城一带考古,掘到大批竹

---

① 安志敏:《中国史前考古学书目》,71~79页。

②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98、99页。

③ 同上书,99~100页。

④ 同上书,98~99页。Yecoq: Chotrcho, Berlin, 1913. 又 *Die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 Teil I—III, Berlin, 1922~1932。

木简牍,并在莫高窟攫取大批文物。

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法国人伯希和由新疆到敦煌盗取莫高窟内的大批精美的文物。<sup>①</sup>

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1908~1914)日本人橘瑞超、古川小一郎等人前后两次赴西北考古,1901至1914年第二次赴新疆考古,又到敦煌莫高窟攫取大批文物。<sup>②</sup>

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俄国皇家地学会组织蒙古四川探险队,由科兹洛夫领导,两次到额济纳河黑城子发掘。<sup>③</sup>

民国二年至五年(1913~1916)斯坦因又到新疆考古,同时又到敦煌盗取文物,到宁夏发掘黑城子。<sup>④</sup>

#### 4. 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外国学者在中国内地的考古

##### (1) 光绪三十三年以后沙畹等人在中国内地的考古

光绪三十三年法国人沙畹(E. Chavannes)调查辽宁省的通沟墓群和《好大王碑》,山东省的汉代画像石,河南省的龙门石窟群,山西、陕西二省的佛教艺术及陵墓。民国三年(1914)法国人色伽兰(V. Segalen)又在陕西、四川等地调查古墓、古建筑、古遗址等。<sup>⑤</sup>

① 陆翹译:《敦煌石宝访书记》,见《阁书季刊》。

② 大谷光瑞等:《新西域记》。

③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92、93页。

④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附录一、附录二。

⑤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19、20页。

## (2) 光绪二十八年后日本人伊东忠太在中国内地的考古

光绪二十八年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云冈石窟群。<sup>①</sup> 三十二年关野贞调查河南巩县石窟寺、洛阳龙门澠池与函谷关,陕西省骊山、秦始皇陵、西安唐都城遗址、大小雁塔、渭北诸汉陵和诸唐陵等。光绪三十三年又去山东调查汉画像石。<sup>②</sup> 光绪三十二年 到宣统二年足立喜六在西安附近进行汉、唐遗迹的调查。<sup>③</sup>

## (3) 民国初年法国人桑志华在中国内地的考古

民国三年法国驻天津神父桑志华(E. Licent)在天津创建北疆博物院,展开黄河、白河地方古生物学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调查与研究。<sup>④</sup>

## 小 结

有清一代的考古学较明代是发展了许多,尤其是乾嘉以来。那些朴学大师们大力提倡考据学,加上皇室收藏丰富,网罗许多的金石学家、美术鉴定家到宫廷内担任鉴定与图录、目录的编纂工作,这样也更促使考古学的发展。像黄易、徐松、毕沅等人,在金石学的基础上更扩大到田野调查,就是古器物的收藏,也较以前范围更广泛一些。在三代、汉的铜器的基础上,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用具的收集。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时史学

① 伊东忠太:《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国华》,第197、198期)。

② 关野贞:《支那建筑及其艺术》中的《清国河南、陕西旅行谈》。

③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

④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26页。

的不发达,严重脱离了现实,因而也影响到金石学,为研究金石而收藏古器物,失掉了考古学最初发生的真意义。

同治、光绪以来的考古学,除掉承袭乾嘉学派的学术方法外,更向前发展一步,如货币学有了新认识,不再上溯到神农、黄帝,镜鉴、砖瓦等杂器物收藏得更为丰富。古文字也能应用声韵学假借互用、双声叠韵的通用而加以解释。同时西方考古学方法输入中国,也影响了各样图录的制出、古器物形态学的研究,更进一步认识了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重要,因而有下一阶段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

## 一、罗振玉、王国维的考古著作目录

### 1. 罗振玉的考古著作目录(罗氏家族著作附入)

#### 古器物图录的编辑

此类著作有《贞松堂吉金图录》、《梦韩草堂吉金图》、《古器物范图录》、《高昌壁画菁华》、《殷墟古器物图录》、《古明器图录》等。

#### 金石文字的纂集

此类著作有《三代吉金文存》、《恒农冢墓遗文》、《芒洛冢墓遗文》、《昭陵碑录》、《西陲石刻录》、《高昌专录》、《汉石经残字》、《碑别字》、《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

#### 殷墟、汉晋简石室字经的研究

此类著作有《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

考释》、《殷墟书契菁华》、《流沙坠简》、《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碎金》、《西陲秘籍丛残》、《鸣沙石室遗书》等。

玺印、封泥瓦当、镜鉴与考古杂记

此类著作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西夏官印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齐鲁封泥集存》、《秦汉瓦当文字》、《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读碑小笺》、《俑庐日记》等。

## 2. 王国维的考古著作

对古器物的研究

此类著述有“说单、觥、盃、彝、俎、环、玦、珪、朋”等文、“商三句兵、散氏盘、克鼎、楚公钟、邵钟、王子婴次卣、匈奴相邦印、晋前尺、正仓院六唐尺、巨鹿城出土宋尺及宋三司布帛司尺、新莽嘉量等跋”、《宋代金文著录表》、《周朝金文著录表》等。

对古文字的研究

此类著述有《史籀篇疏证》、《殷墟书契考释·序》、《殷墟书契考释·后序》、《观堂古金文考释》、《魏正始石经残石考》以及释各种字的杂文等。

用考古资料说明历史上的诸问题

此类著述有《〈史记〉、〈汉书〉所谓古文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序》、《汉、晋简和唐写本卷子·跋语》等。

## 二、罗、王二氏对考古学上的贡献

### 1. 扩大了金石学的范围

罗氏生于清末,受到了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扩大了金石学范围,对于古明器、古器物范、古壁画、历代玺印、符牌都能尽力收集,作出图录,为前人所不及。

### 2. 对殷墟甲骨出土的收集与研究

西陲木简出土、石室古写本发现的影印与研究,对新派考古学起了推动的作用,因而能促发以后对安阳小屯的发掘、对西北考古的重视。

### 3. 罗氏在清末以来集金石学考古的大成

他的确认识到古器物、古文字的研究能补苴文献的不足。与罗氏同时的一代大师王国维,也能运用考古资料来解说、证明许多历史问题,尤其对新发现的甲骨文字、汉晋木简古写本卷子的考释,完全发挥了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在旧考古学上也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 三、其他各家的考古

#### 1. 古器物图录的编辑

##### (1) 近几十年出土古器物的编辑

所编辑的图书有《殷墟器物存真》、《邳中片羽》、《新郑古器图录》、《新郑彝器》、《马氏编钟考释》、《寿县所出楚器图释》、《浑源出土古物图说》、《浑源彝器图》、《濬县彝器》。

##### (2) 对公私收藏古器物的编纂

编纂的图书有《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颂斋吉金图录》、《善斋吉金录》、《十二字吉金图录》、《征秋馆吉金图》、《双剑谿吉金图录》、《双剑谿古器物图录》、《海外吉金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商周彝器通考》等。

#### 2. 金石录目与金石书目

##### (1) 金石录

所编辑的书目有如《寰宇贞石图》、《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释》、《高昌砖集》、《达陵石刻集录》、《秦金文录》。

##### (2) 金石目

编辑的金石目录有《千唐志斋藏石目录》、《周朝金文著录表

补遗》。

### (3)金石书目

编辑的金石书目有容媛的《金石书录目》、林钧的《石庐金石书目》。

## 3. 古玺印、画像石、砖造像和明器的研究

编辑的这类图书有《征秋馆印存》、《尊古斋古铢集林》、《征秋馆藏古封泥》、《南阳汉画像集》、《南阳画像汇存》、《汉代圻砖集录》、《广仓专录》、《伊阙石刻图表》、《中国明器》等。

## 4. 其他

这类图书有徐旭生去敦煌考察的《西行日记》，汇集汉晋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二编，汇集石窟写经题记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记载巨鹿出土的《巨鹿宋器丛录》，研究玉器的《衡斋藏见古玉图》。

## 5. 古文字的研究

### (1)对甲骨文字的集释与单字的编纂

编辑的这类图书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簠室殷契征文》、《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天壤阁甲骨文存》、《殷契佚存》、《殷契卜辞》、《簠室殷契类纂》、《殷墟文字类编》、《甲骨文编》等。

## (2)对金石文字的集释与金文单字的编纂

所编图书有《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石鼓为秦刻考》、《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历代石经考》、《金文编》、《金文续编》。

## 四、外国学者在中国北方各地的考古

### 1. 美国学者民国期间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1916至1917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安德鲁斯(R. C. Andrews)赴蒙古采集古生物化石。

1922至1923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探险队中的奈尔逊(Nelson)在蒙古夏巴拉乌苏(Shalarakusu)采集新石器时代遗物。<sup>①</sup>

1928年,安德鲁斯等收集化石等物八十余箱运至张家口。

通过这次调查,安德鲁斯将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编成由细石器,经过新石器、铜器到蒙古时连贯的几期,但因为没有正式发掘,所以他这一分期只有相对价值的。

### 2. 法国学者民国期间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1919年以来在中国的法国神父桑志华,在内蒙东部林西赤

---

<sup>①</sup> R. C. Andrews: *The New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Natural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 I)*, New York, 1932.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84页。

Nelson, N. C. & Berkey, C. P.: *Geology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he Gobi Desert*.

峰朝阳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1922年在围场东家营子发掘金石并用的古坟,证明磨制石器与青铜器同时并用。

1922至1923年桑志华又与德日进(T. Chazdin)神父到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一带调查,发现了旧石器以及人类左上第二门齿的化石。这是旧石器时代遗址最大发现之一。<sup>①</sup>

### 3. 日本学者民国期间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1930年,日本水野清一、小牧实繁等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一带调查了细石器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1931年,在日本横尾博士领导下,东亚考古学会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1935年又在赤峰红山发掘过石器时代遗址,1937年又调查了元上都的故城。这期著有《内蒙古长城地带》(1935)、《赤峰红山后》(1938),说明了由彩陶、红陶文化再进入青铜器时代文化的过程。

### 4. 对内蒙各地辽遗址、墓葬的调查

1914年,内蒙古林西县东北白塔子北十二公里瓦尔曼哈辽陵被盗掘,1923年德国人福克司<sup>②</sup>、法国人牟里(Mullie)都先后到该地调查过。<sup>③</sup>1930年日本人鸟居龙藏率其女绿子到辽陵调查,并对行宫遗址进行调查,开辽代考古的先声。关于这方面的

---

① Chardin: *Fossil Man in China and Mongolia* (*Natural History*, vol. XXVI, No. 3, 1926, pp. 238 ~ 245);《东洋考古学》,26~28页,84页。

② 《辽陵之契丹文字》(1923年《通报》第23期《辽陵石刻集录》卷6有译文)。

③ 牟里:《辽代古城探访记》,冯承钧译。

著作有《满学を再び探る》(1932)、《从考古学上看到的辽代文化图谱》以及单篇论文七八篇。后来村田治郎、岛田正郎,也去过辽陵,著有《庆陵》一书。

## 5. 1937 年以后内蒙西部的调查与发掘

1938 年江上波夫、饭田须贺斯在百灵庙北婁弄苏木地方古城附近发掘,得叙利亚文、突厥文墓石和有关景教的遗物,又从寺院遗迹中得到藏文、蒙文、汉文的经典。1940 年江上波夫等又发掘了王府遗址,得残壁画及十字形物品,证实为元汪古特人的遗址。

1943 年,在呼和浩特南三十公里处,由驹井和爱、和岛诚一、岛田正郎等组成的发掘团,得到很多北魏的遗物,并得到汉砖及云纹瓦当,以及唐式兽面莲花纹瓦当,故推测为汉代的成乐县、北魏的胜居城、唐代的单于都护府。1941 年又发掘了百灵庙西麻池的汉代遗址。

## 五、外国学者在东北的考古

### 1. 哈尔滨特别市博物馆透路玛契夫在东北地区的考古活动

1923 至 1924 年,哈尔滨特别市博物馆的透路玛契夫(V. J. Tolmatcheff),在哈尔滨市东阿什河白城子金上京会宁府进行调

查并发现扎赉诺尔炭坑鹿角化石。<sup>①</sup> 1928 年该馆路克锡舍(A. S. Lukashlin)在海拉尔沙丘一带采集细石器,发掘石器时代墓葬,出土陶器、石斧、骨器等等。1931 年阿内尔梯(E. E. Ahnert)、鲍诺绍夫(B. Ponosof)、路克锡金等组织镜泊湖地方的调查队,其中鲍诺绍夫,曾在东京城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作了试掘。1931 年鲍诺绍夫与尹赞勋等人开掘六个坑,得资料数千件。

## 2. 日本学者在东北地区的考古活动

1927 年 3 月东亚考古学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包括了京都帝大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关东广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室等考古机关。首先由滨田耕作领导,发掘貔子窝内碧流河畔石器时代遗址的单砣子地方和下沿至战国、汉初的高丽寨地方。后著有《貔子窝报告》。

1928 年秋,原田淑人领导发掘旅顺牧羊城遗址及附近的汉墓或汉以前的墓,写出《牧羊城报告书》。

1929 年,又发掘牧羊城附近南山里的汉代砖槨墓,写出《南山里考古报告》。

1931 年,牧羊城西北营城子附近发现两个汉代砖槨墓,出土品除一般的明器,如陶屋、甑、斗、奩、豚灯等,第二墓还有壁画,后写有《营城子报告书》。

1933 年春,京都帝大医学部金关丈夫、三宅宗恍等在旅顺西海沿羊头洼贝冢发掘后,由水野清一等整理,写出《羊头洼报告书》。

---

<sup>①</sup> Tolmachett, V. J.: *Historic Manchurian Relics*, 1925;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 23 ~ 33 页。

同年,东京帝大原田淑人领导,与金毓黻先生共同在宁安东京城镇渤海上海京龙泉府遗址发掘,后写出《东京城报告书》。

同年5月原田淑人等到哈尔滨市郊区顾乡屯发掘,6月德永重康、直良信夫又到顾乡屯发掘。1937至1938年,远藤隆次、野田光雄等又到顾乡屯发掘,虽然得到一些动物化石及骨角器,但未确实是否属于旧石器时代。

1927年、1928年、1929年,巴娄夫斯基、德日进等发现扎赉诺尔南坑骨斧、鹿骨。1933年,顾振权发现了第一号头骨,1934年赤掘英三也调查头骨出土地,1936年远藤隆次又调查地层,1943年加纳金三郎又发现第二号头骨,1944年远藤隆次、裴文中等又发现了第三号头骨,但至今还未确定属于石器时代哪一期。

## 六、外国学者在中国内地的考古

### 1. 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人在内地的考古

1918年关野贞到江苏、浙江、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调查佛教艺术、古建筑、陵墓等遗迹。<sup>①</sup> 1922年常盘大定到南北响堂山调查。1924年滨田耕作与英国陶蓝斯(T. Torrance)发掘四川岷江沿岸的崖墓。<sup>②</sup>

1930年,东京京都两帝大派小牧实繁、水野清一、江上波

---

① 关野贞:《支那建筑及其艺术中的西游杂信》上。

② 驹井和爱等:《东洋考古学》,23页。

夫、驹井和爱等赴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山东福山县附近汉代遗址、龙口海岸贝冢调查。1931年以后,塚本善隆、长广敏雄等又到云居寺调查,后著有《房山云居寺研究报告书》(1936)。

## 2.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内地的考古

河北省:1940年东亚考古学会由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岛田正郎、关野雄等人组成调查团,秋季在邯郸赵王城发掘。<sup>①</sup>1941至1943年,东京帝大长谷部言人在周口店发掘。1941年,水野清一等发掘怀安北沙城的汉墓,后来写出《万安北沙城报告书》。1939年,日人鸟居龙藏又作了《下花园北魏早期石窟调查》。

山东省:1940至1941年,关野雄三次到临淄调查,因而弄清了临淄故城的建筑遗址,并在城内采集到瓦、瓦当、砖、有印文的陶片、贝货残刀、铜镞、方格四乳叶文镜范、封泥等遗物。<sup>②</sup>1940至1941年,关野氏又两次调查曲阜,1942年由原田淑人率领又发掘二十多天。1941年,关野氏又在滕县调查滕、薛二城。<sup>③</sup>1941年,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为鸟居龙藏博士借妻女及助手张雁深、刘选民二人到山东青岛发现贝冢,得黑陶很多;在淄川发现石棚,在张店发现汉砖墓,在临淄发现骨冢、贝冢,又在龙口发现贝冢,等等。<sup>④</sup>

山西省:1937至1943年水野清一前后八次到云冈调查测量

---

① 驹井和爱等:《河北省邯郸仁格等遗迹调查》(《考古学杂志》,31卷第6号汇报)。

② 关野雄:《齐都临淄等调查》(《考古学杂志》,32卷,第4、6、11号)。

③ 关野雄:《前汉鲁国灵光殿の遗迹》(《考古学杂志》,31卷,第9号)。

④ 张雁深:《鸟居龙藏氏在华考古工作年表稿》。

石窟,并发掘第九、十、十九、二十等窟以及冈上的北魏废寺址,后著有《云冈石佛群》、《云冈石窟报告》,同时又采集了新石器时代遗物。小川晴肠氏于1938至1939年两次到云冈调查。

1942年秋季,水野清一、小野胜年、日比野丈夫等发掘阳高古城堡十二、十五、十七号三汉墓,所得遗物极为丰富,后写出《蒙疆阳高汉墓发掘略报》(1944),此外对大同、平城遗址展开调查。日比野丈夫、小野胜年对定襄汉城遗址、五台山、太原附近古迹、朔县崇福寺、浑源、繁峙、崞县各遗迹进行调查。东京帝大教授和岛诚一又在同蒲线对石器时代遗址展开调查。

## 七、中国聘请外籍的考古学者与中外联合组成考古团的考古工作

### 1. 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受聘组团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安特生(T. G. Andurison)于1914年被聘为我国农商部矿业顾问后,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商议中瑞两国合作采集中国脊椎动物化石,在中国各地进行考古活动。1918年安氏发现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和仰韶村遗址。1921年与袁复礼与日詹斯基(D. Zdansky)在仰韶村开掘,同年发掘锦西县沙锅屯。1922年与日詹斯基、谭锡畴等赴山东蒙阴,发现中生代恐龙化石,到甘肃庆阳探掘脊椎动物化石,去澠池仰韶村、万召寨、秦王寨等地调查和采集新石器时代遗物。

1923年,安特生赴甘肃考古,发现西安东十里铺遗址(按:应系近年发掘的半坡遗址)、西宁东十里铺、青海边朱家寨、贵德

罗汉堂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发掘朱家寨遗址。1924年到洮河流域发掘齐家坪、辛店、丰山附近(边家沟、瓦罐咀)寺洼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又至马厂沿调查,秋季又到沙井子发掘。1937年,又到四川、西康等地考察。前后著有《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北部之新生界》、《奉天锦西县沙锅屯之洞穴堆积》、《黄土的儿女》(以上尚带中文译本,日人译为《黄土地带》)、《远东地形及考古之研究》、《中国史前人类之研究》、《朱家寨史前遗址》(以上三书没有译文)。<sup>①</sup>

## 2. 1927至1933年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1928至1930年,由黄文弼主持,在吐鲁番附近进行调查和发掘。第一次工作于1928年5月调查吐鲁番东哈拉和卓西的高昌故城,胜金口、柏子克里克的石窟和葡萄沟以西的佛寺遗迹。1930年春又到吐鲁番西雅尔湖边古高河城、雅尔湖沟北沟西古墓进行发掘,并到吐鲁番南阿萨土拉和让布工高故城址,高昌城西北、东北和正东伯什柯布克古墓,以及鲁克沁东旧城(疑柳中)和唐代佛教遗迹进行调查,后来著有《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高昌专集》等报告书。

1930至1934年,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于英都于库什、罗尔淖尔北岸等地,发现石器时代遗址和发掘雅尔湖的麹氏高昌墓地,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火遗址和汉简、汉经、麻织品、漆器、骨器、五铢钱、残铜件、玛瑙珠、铜印

---

<sup>①</sup> 裴文中:《安特生先生年谱》(《辽海引年集》,358~361页)。

(韩产)等,对汉代考古增加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后来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报告书。

1928至1934年贝格曼等在新疆考古。

贝格曼在吐鲁番西南、正南的英格尔哈密东、乌鲁木齐东南、罗布诺尔盆地一带和诺羌东南等地发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诺羌等地的彩陶,英格尔、毛拉库、罗布淖尔一带的细石器。

贝格曼发掘了罗布淖尔区北小河流域和库鲁河三角洲一带汉代墓葬,出土了墓葬中的丝织品、毛织品、衣服、靴帽、木梳以及铜镜、铜钱、草蓆等。在罗布淖尔西岸库鲁克河南岸汉代房屋、烽燧遗址中发现货泉、大泉、弩机、日用生活器具等。

### 3. 美国福利尔美术馆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在山西省的考古发掘

1926年冬(10月15日至12月初),福利尔美术馆与清华大学合作,由清华大学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组织发掘。主要的发现有直径四点三米、深二点五米,中间有灶的椭圆形居住址一处。从遗址中又发现了灰粗、灰绳纹陶片,细质的、掺麝料的和掺贝壳云母的红陶,更有陶胎为红色,外加彩、外白里红加彩、淡白色加彩、着红色衣加彩、青白衣加彩(彩大半是黑间有红黄)等五种陶片,还发现石斧、石刀、石锤、石镞、石纺轮、骨针、骨环、骨镞、骨簪、贝壳坠子等遗物。最重要的发现,是有半个蚕茧壳。这是中国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后来李济写出《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报告书。

1930年,由董光忠主持在万泉县阎子疙瘩汉汾阴后土祠发掘。遗址在万泉县南孤山东南的黄土坡上,遗物堆积颇多,经发

掘后出土有:菱形纹方砖,有“千秋”字的砖,有“长生无极”、“长乐未央”、“宫宜子孙”云纹的瓦当以及绳纹、筒瓦、平瓦、灰陶片、红土属沙的陶片,另有铁铲、铁镢、骨器、玻璃器等,还有石刀、残石环等。阎子疙瘩东北还有石器时代遗址。1932年,董光忠著有《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之发掘》的报告书。

与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图书馆合作,董光忠主持在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在黄土断层上,发掘了竖穴式的居住遗址,出土有鬲形的三足器、大口尖底器、小底广肩细颈小口的陶器、盆形的彩陶以及骨镢、骨笄、陶环等遗物。

## 小 结

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运用了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当然在用考古资料解释历史问题上,由王国维到郭沫若都是最突出的人物,尤其是郭沫若,能用考古资料解说社会性质,推出社会发展的规律。直到今天我们做考古工作的人还要注意来学习他们。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外国考古学者到中国,虽然劫去了我国的许多文物,但也因此启发了我们,使我们能成立考古机关,发展这门学科,较封建时代更能向前推进一步。

## 一、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家早期的发掘工作

### 1. 北京历史博物馆裘善元在巨鹿调查发掘工作

1921 年,北京历史博物馆裘善元在巨鹿调查发掘宋代故城,发现宋代居住址两处,出土有宋代瓷器、瓷枕和日用家具等物。这样的遗址,等于是罗马的庞培城,实在有继续发掘的必要,后来裘氏写有《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

### 2. 北京历史博物馆在河南信阳的考古活动

1924 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又发掘河南省信阳县王坟洼、擂鼓台、汉代砖槨墓,砖文有汉和帝永元十一年(99)砖铭,又出土有铁器、陶器、带釉陶器等遗物。

### 3. 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联合组成燕下都考古团的考古活动

1930年春,考古团由马衡先生率领,调查河北易县燕下都的故城遗址,发掘城外的姥姥台遗址,出土许多战国到汉的建筑材料和生活资料。<sup>①</sup>

## 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1918年起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周口店西南三公里鸡骨山地方发现动物化石后,1921年安特生又和日詹斯基到该地调查,发现周口店第一地点“中国猿人”出土地,也有化石。

1927年起,地质调查所派李捷和瑞典人步林(B. Bohlin)发掘中国猿人出土地,出土了人的左下臼齿,由步达生(Beack Davidson)研究定名为“中国猿人”。

1928年,由步林、杨钟健、裴文中三人负责发掘,曾出土中国猿人下颚骨和完整的三枚牙齿。

1929年由裴文中负责春季发掘,曾发现一个破残的猿人头骨。冬季12月2日在由顶盖向下三十米的下洞猿人户地E地发现了中国猿人头骨。

1931年由裴文中主持,又集中发掘鸽子堂洞,在中国猿人出土地G地发现了中国猿人下颚骨和锁骨,并发现石器及炭块,因而证明中国猿人能制石器及用火。

---

① 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1936 年秋,由贾兰坡主持,又发掘中国猿人出土地,在第二十三层、二十四层内出土了许多标准石器,该年 11 月中在第二十五层猿人产地“L 地一”发现猿人头骨两个,在“L 地二”发现猿人头骨一个。这一层中出土猿人完整头骨三个,这应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上最大的收获之一。

1933 年 5 月,北京房山山顶洞的发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5 月 20 日山顶洞正式开掘,由裴文中主持,贾兰坡参加工作。在山顶洞西部下室发现完整人类头骨三具、躯干骨一部分,和多量的装饰品(石珠、钻孔砾石、穿孔牙齿、介壳、青鱼上眼骨等)与少数石器,又在下室处发现完整骨架多具和食肉类动物化石,但没有文化遗迹。

上室(东部)化石比较丰富,化石以鹿骨为多,及完整的人骨架,并有小部分躯干骨及石器骨器和装饰品。<sup>①</sup>

### 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考古发掘工作

#### 1. 安阳殷墟的发掘

自 1899 年王懿荣、王襄初识甲骨文字以后,刘鹗、端方、罗振玉等俱先后收集到许多甲骨,并进行研究。外国人如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欽和英国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于 1903 年以来,先后收买很多。在安阳做长老会牧师的加拿大人明义士,也先后收买了许多。

<sup>①</sup> 《周口店的发掘》,参看贾兰坡《中国猿人》、《山顶洞人》二书。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开始对安阳作出发掘的计划,但安阳殷墟正式的发掘是在1928年12月成立考古组以后,所以安阳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走上新的道路。正如蔡子民(培元)先生所说:“(1)立足点是整个的。(2)问题的组成正如自然科学之组成……不以设定为决论,不为遗漏作补苴。”

#### (1)1928至1930年秋殷墟的三次发掘

第一次(1928年10月13日~1928年10月30日)发掘,由董作宾主持,河南省政府派郭宝钧等参加,工作地带在小屯村。共分三区,一区在东北洹河之滨,二区在村北,三区在村中,出土有字骨二百九十九片,甲骨八百五十四片,还有铜、陶、骨、蚌、石玉等器物。

第二次(1929年3月~1929年5月10日)发掘,由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成立,由李济负责,因而发掘工作也由李济主持。工作人员有董作宾、董光忠等,参加者有裴文中,工作地点在小屯村中、村南、村北三处,进一步应用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如村北以A、B、C命坑名,村中以“纵”、“横”、“斜”、“连”命坑名,出土物除甲骨外,还有大宗陶器,并确定了小屯地面有近代、隋唐、殷商三层。

第三次(1929年秋季)发掘仍由李济主持,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高地和村西北的壕台。出土物主要有大龟四版、鹿牛头刻辞、各样铜器及陶制铜器范、半截抱膝人像、釉陶、彩陶、白陶、雕骨和蚌器等。

同时,在遗址方面还发现了方坑、长方坑和圆坑的窖穴,另外还有墓葬二十四处。

## (2)1931 年春至 1932 年春殷墟的三次发掘

第四次(1931 年春季)发掘,仍由李济主持,工作人员主要是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郭宝钧等人,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分作五区。董、郭、吴、梁四人分领 A、B、C、D 四区,董、吴兼领 E 区,出土物除陶、铜、骨、玉等器等,还在 E 10 坑发现了象牙牙床和鲸肩胛骨,并在全区内普遍地发现了版筑遗址,证明是宫室和窖穴的遗迹。同时又由梁思永主持,发掘后冈,发现了小屯、龙山、仰韶文化的“三叠层”,吴金鼎发掘了四盘磨附近的殷代居民遗址和墓葬。

第五次(1931 年秋季)发掘由董作宾主持,工作人员主要是梁思永、郭宝钧、刘耀、石璋如等人,工作地点是增加了村中的 F 区。由郭负责 B 区,石负责 E 区,董负责 F 区,这次除甲骨、陶器等出土外,又证实了版筑为较晚期的建筑,因为版筑夯土下面还有各样圆坑,圆坑彼此相套,现出重叠排列,说明了古人记载“陶复”挖土为穴,上加覆盖的形制。至于版筑基址高出殷墟地面近两米,南北约十米,东西约十九米。后冈发掘更证明了仰韶、龙山、小屯三层文化的相互关系。

第六次(1932 年春季)发掘由李济主持,工作人员主要有董作宾、吴金鼎、石璋如等,地点集中在 B、E 两区,B 区作小规模和平翻。这次又发现了圆坑中有脚窝形迹,版筑遗址台基上,柱础石排列得非常整齐。E 区中又发现炉灶。又在洹北侯家庄、高井台子,由吴金鼎主持发掘的文化层与后冈的一样。小屯西南王裕口、霍家小庄发掘相同,小屯的穴窖又与四盘磨相同。

## (3)1932 年秋至 1934 年春季殷墟的三次发掘

1932 年 10 月至 12 月中,第七次发掘由李济主持,集中在

A、B、C、E 四区。较重要的发现,遗迹方面,有矩形、凹形、条形,由二十米到六十米长的基址和排列整齐的柱础石。遗物方面,主要发现有墨书“祀”字陶片,这说明了殷代已经是有了毛笔的工具。<sup>①</sup>

1933 年 10 月到 12 月中,由郭宝钧主持作第八次发掘。这次集中在 D 区。主要的发现,遗址方面,不只发现基址和石础,而且发现了铜础十个,又在基址下发现了龙山期的圆坑和陶器、蚌刀等。同时自 10 月起,到第二年 11 月由刘耀主持发掘后冈。主要的在西区发现了一个大墓,木槨作“亞”字形,四隅有二十八个人和车马装饰,以及陶、金、玉、石、铜、骨、贝、蚌等殉葬物。同时又由李先宁主持在四盘磨发掘殷代小墓一个。

1934 年 3 月到 4 月中,由董作宾主持作第九次发掘。小屯方面,集中在 D、G 两区,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只是由 4 月到 5 月底洹北侯家庄南地的发掘,也发现了许多的遗址和穴窖以及“大龟七版”。清理后冈大墓后又启示了殷陵的寻找,以致有下期在西北冈殷陵的发掘,同时又发掘了洹北武官村南的南坝台,这一阶段的工作促发了对洹北殷陵的发掘。

#### (4)1934 年秋至 1935 年冬洹北的三次发掘

1934 年 10 月至 1935 年 1 月由梁思永主持作第十次发掘,工作地点在洹北侯家庄西北冈。发掘西区四大墓,东区三十二座小墓。主要的出土物,有铜器、石雕像、白陶等遗物。证实了殷陵所在及人殉的习惯。又在秋口、同乐寨发掘,更证实了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的关系。

---

<sup>①</sup> 董作宾:《殷人之书与契》(《中国艺术论丛》)。

1935年3月到6月中,由梁思永主持,作第十一次发掘,工作地点仍在侯家庄西北冈。继续发掘西区大墓和东区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并发现殉葬的马坑和兽坑,以及大方牛鼎、圆鼎、铜铙,并在大墓椁顶上发现仪仗痕迹。

1935年9月到11月中,仍由梁思永主持作第十二次发掘,工作地点仍在侯家庄西北冈墓地。西区又发掘了四座大墓(其一是假墓),东区也发掘了两座大墓和东西区七百八十五座小墓。出土遗物,主要的有盥洗具、鸛尊、石虎、牛、蝉、透雕人像等,同时又在大司空村发掘灰土坑三十七个。

#### (5)1936年3月至1937年6月的三次发掘

1936年3月到6月中,由郭宝钧主持作第十三次发掘,工作地点又转到殷都,集中在B、C两区。发现版筑基址四处,基址附近和基址下的人葬,又发掘穴窖一百二十八个,其中一百二十七号坑,发现龟甲一万七千零八十八片、牛骨八片,共甲骨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

1936年9月到12月中,由梁思永主持作第十四次发掘,工作地点集中在C区,又扩大到I区,发现版筑基址二十六处、穴窖一百二十二处、墓葬一百三十二处,遗物有方彝、方鼎等铜器。同时又在大司空村发掘穴窖二十九处、殷和战国期墓九十一座。

1937年3月到6月,由石璋如主持作第十五次发掘,工作地点为C区,发现了基址二十处、穴窖二百二十处,与祭祀有关的人葬与兽葬等一百零三座。出土遗物,以三百五十八号坑的陶俑最为突出。

总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之间,共发掘殷墟十五次,发掘都城(小屯)十二次,发掘殷陵(西

北冈)三次,发掘殷都近郊洹北大司空村两次,发掘侯家庄南地一次,方井台子一次,秋口、同乐寨一次,武官南坝台一次,洹南四盘磨二次,王裕口、霍家小庄一次,后冈四次,范庄一次,总共在安阳洹河两岸发掘了十一个地方。对公元前 1400 年殷代的物质文化得出了整个的轮廓。从甲骨文中又了解到殷代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因此补证了古史的不足,在考古学上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发掘工作。

## 2. 河南其他各地的发掘

### (1) 1932 至 1933 年

1932 至 1933 年濬县西南车站西六里辛村古墓的发掘,由郭宝钧主持。春秋两季,前后共四次,发掘了八十八座墓。以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遗物、铜器铭文等,可证这批墓群,最早应是西周初期,最晚约在春秋中期。<sup>①</sup>

1932 年 5 月,濬县车站东南两三公里左右,大赉店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由刘耀主持,在大赉店西南淇河东岸,分东、中、西三区开坑,也是彩、黑、灰陶的三叠层,彩陶层有粗糙打制的石磨、黑陶,有磨制很光的石器,及骨角料器和袋状有石灰面的竖穴,这又给小屯三叠层遗址提出更充足的证据。<sup>②</sup>

1937 年辉县琉璃阁的发掘,由郭宝钧主持。在琉璃阁发掘了几十座战国墓。<sup>③</sup>

① 郭宝钧:《濬县辛村占残墓之清理》(《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

② 刘耀:《河南濬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

③ 高去寻:《黄河下流的屈肢葬》(《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

1936年冬在鄆城的发掘,由李景昶率领河南古迹保管委员会人员,在鄆城造律台、黑孤堆遗址发掘,出土了许多标准的黑陶期鼎、鬲、髹等器与各种石器、骨器、蚌器等。<sup>①</sup>

此外又发掘了汲县的战国期墓,因无报告写出,也不当作重点的介绍,但出土的人物水陆战斗纹铜鉴应是最重要的一件文物。

### 3. 山东济南城子崖的发掘

1930年冬,由李济主持,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等参加,在济南东三十八公里,胶济铁路北龙山镇武原河东平陵城西城子崖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共开坑四十四个,出土物有陶片、骨、角器、蚌器、石器共计二万三千八百七十九件。1931年10月,由梁思永主持,吴金鼎等参加,又开坑四十五个。进一步认识了窑址和黑陶时期与后期人居住的地点等。

城子崖分上下两层,下层发现了原始灰陶、黑陶、粉黄陶片,并以手制者为多。石器有砺、磨、锤、斧、铍、铲、刀、矢等。骨器有锥针、梭筭、矢、鱼叉等,蚌器有铲、刀、锯、矢以及牛、鹿、单钻、有灼兆的卜骨。上层发现了城垣遗址、三个圆底有火口的窑、轮制较多和细绳纹有记号及文字的灰陶石蚌器。中层与下层相同,只是骨器中没鱼叉、梭筭、而多了簪。卜骨有了三联的钻痕以及铜刀、矢、残刀币等。

---

<sup>①</sup> 李景昶:《豫东商邱、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

#### 4. 黑龙江昂昂溪与热河林西、赤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1930年9、10月间,梁思永偕俄人路肯徐金(A.S. Yukashhin)到黑龙江昂昂溪西约六公里的几道沙冈间,调查细石器时代遗址。在第三道沙冈间发掘没有墓穴或墓圈的墓葬一座,其南又渚埋一残墓葬,加上采集的有细石器的石刀、石锥、石钻、小雕刻具、石镞、石片等,非细石器的石砬、石镞、石坠以及小石珠等。骨器中有骨枪、骨锥、鱼镖等,以及棕色陶盆陶片和角器等。<sup>①</sup>

发掘昂昂溪墓葬以后,10月末又去热河北部翁木伦河西岸查不干山南麓查不干庙调查,又到林西城南约四公里锅承山调查,在采集中得到细石器、未加精琢的石器、大石核、手磨盘、手磨棒、槌制石器、石杵、石锤、磨制石斧等。又到赤峰城北、城东沙窝中采集了有肩石斧、有孔石砬等器物。另外在查不干庙与林西双井、陈家营子等地所拾到的卷边和压纹的不是石器时代的陶器。<sup>②</sup>

#### 5. 安徽寿县石器时代遗址和楚墓的调查

1934年1月9日到12月4日,王湘、李景昫,沿着寿县瓦埠湖调查了东岸的杨林集魏家郢子、彭家郢子、古城子遗址,西岸的陶家祠、江黄城、张罗城遗址,淝河以东金家庙滩子、酒流桥、

---

①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

② 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江宇平:《内蒙昭乌达盟印纹的年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刘备城、张飞台遗址,淮河东岸狄家郢子等遗址。在地形方面几乎都是近水的高地或台地,遗物方面有龙山期各样的条纹和方格纹的陶片,小屯期的绳纹鬲、豆等陶片以及石器。<sup>①</sup>

同年李景昫、王湘到瓦埠湖东岸朱家集南朱家郢子、西南夏家郢子、东北李三孤堆楚王墓调查,证明为农民破坏的楚墓,是木槨室,并有耳室等。出土铜器统计共八百三十八件,以及漆棺残片等。<sup>②</sup>

#### 四、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在关中地区的考古工作

##### 1. 1933 年春由徐炳昶领导对陕西周、秦遗址的调查

1933 年春,由徐炳昶领导,对陕西省周、秦遗址进行调查。计有长安西南秦渡镇北灵台之遗址、斗门镇西南冯村、大袁村等所谓丰镐的遗址、兴平东南南佐村附近所谓犬邱遗址、凤翔南二三公里南古城遗址、宝鸡东斗鸡台的陈宝祠遗址、渭水南姜城堡的石器时代遗址、长安东五公里米家崖沪水西岸的石器时代遗址,以及阿房宫遗址。

##### 2. 1934 年春到 1937 年上半年宝鸡区遗址墓葬的发掘

由何士骥、白秀玉、苏秉琦等人前后发掘三次:

---

① 李景昫:《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

② 李景昫:《寿县楚墓调查报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

废墟区的发掘——在陈宝祠后土堡内外,1934年上半年,与1934年冬作第一次与第二次发掘,发现有石器时代居住遗址及遗物和汉魏以来的砖、瓦、陶片、版筑城垣等。

沟东区的发掘——在戴家沟东,第一、二两次连续发掘N、K坑。发现类似石器时代制陶工场,又于G、H、I、M诸坑,发现石器时代的竖穴居住址。发现墓葬一百零四个,有殉葬物者八十二个。八十二个墓葬中,有五十六个是竖穴墓,其中四十五个是南北竖穴,北首仰身分初、中、晚三期的瓦甗墓,十一个是东西竖穴,屈肢分初、中、晚三期的瓦甗、瓦甗墓,其中二十六个墓,是带固定方向,殉葬用明器的洞室墓。

竖穴瓦甗墓时期是由周初到战国,洞室墓是在汉或汉以后,这些墓葬材料开辟了有系统研究关中周代墓葬的先河。

沟西区的发掘——1937年4月到6月由孙文青、白万玉等人,在戴家沟西作第三次发掘,发现有早期人类居住遗址与晚期墓葬,因抗日战争爆发,尚有一部未了的工作。

### 3.1934年西安民政厅院内唐中书省旧址的发掘

《顾勤礼碑》出土于此,据说碑下还有残石,因于春季发掘二十七天,得到宋吕大仿刻唐大明、兴庆两宫图的残石,兴庆宫图尚完好,大明宫图只余少半,另有唐、宋瓷片等物。后在小湘子庙街,得到唐太极宫及皇城图残石,对于唐西京城的研究来说,增加了极宝贵的资料。

## 五、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学术机关在各地的发掘工作

### 1. 1939 至 1940 年中央博物院在云南苍洱境内的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工作由吴金鼎主持,曾昭燏、王介忱参加,发掘大理马龙峰下马龙遗址、佛顶峰下的佛顶甲址和佛顶乙址、龙泉峰下的龙泉遗址、大理喜洲之间白云峰下的白云甲址。这些遗址,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早期的佛顶遗址,有陶器(不见轮制的痕迹)、石器、纺坠。中期的马龙遗址发现有炉灶(用石圈成的)、住址、窖穴,遗物有轮制陶器、纺轮和纺坠、石器等等。晚期的白云遗址,也有炉灶、住址、更进步的陶器纺轮和石器等。

另外还调查了大理西北四公里的白王冢遗址、城北三塔寺遗址、城西一塔寺遗址、城西南五华楼故址、马耳峰下太和村西的太和城故址、下关西遗址、中和峰南支的中和乙址、城西北的东岳庙遗址、苍琅峰下平原上的史城遗址、白云峰麓的白云乙址等处,都有印成汉字或梵文的借用汉字,以及带釉陶或带釉砖。以出土遗物来看,应在南诏早期和中期。

以上发掘由吴金鼎等三人著有《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作为介绍。

## 2. 1942 至 1943 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河西的考古

1942 至 1943 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由向达、石璋如等人组成,到河西考古。石璋如到河西额济纳河黑城子、敦煌以西汉长城考察,归来后石氏又沿渭河流域调查了周代早期各遗址。1943 年石氏又与笔者一同调查洛阳龙门石窟。

## 3. 1944 至 1945 年由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西北的考古、考察活动

1944 至 1945 年由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由向达任组长,夏鼐、阎文儒参加。1944 年先在敦煌发掘六朝、唐墓葬,冬季调查汉阳关、玉门关以及汉长城烽燧,同时又在大方盘城里石器时代末期到汉的三角城遗址考察,并调查三角城西南十余公里处连古城唐代的城址。在永昌调查了祁连山中黄城滩的元斡耳朵城遗址、城东北四五十公里处边境上三角城遗址、三角城西二三公里处野马墩和城东上家沟二处沙井期的墓葬。在山丹调查了宋、西夏时代建造的发塔寺、城西五公里处明代重修的大佛寺。在民乐调查了城西三四十公里处可能是五凉时代临松郡的南古城、大都麻河岸的崖墓、城东十公里处的永固城和南门外七个大古墓、城西近五十公里处的马蹄寺石窟。在张掖调查了城内二郎庙中的《西夏告黑水河诸神敕》,以及鼓楼内宋以前的铜钟,城西十五

公里处南北二古城的汉代城址,发掘了城东汉墓葬。在酒泉调查城东门洞内的回鹘文碑、门外半公里左右的汉墓、西南十五公里处文殊山的石窟寺,以及酒泉北的毛日城等地方。

这两年中几乎走遍了河西,对西北考古来说,应是比较精致的,可惜所有的发掘品、采集品,都迁往台湾,至今还不能写出正式的报告。

此外 1941 年以后,由吴金鼎主持发掘过四川彭山的汉崖墓、成都的王建墓,因没有报告写出,不再作重点的介绍。

## 结 语

自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以后,中国考古学艰难起步。我们自己的学术机关,不怕任何困难,为争取考古学科的独立,不再受外国学者的轻视而成长起来。尽管是接受西方考古学的观点方法,但在考古发掘上,是应用科学方法来进行工作,因而也打破了旧日只重视金石学,而不重视科学发掘的习惯。殷墟的发掘,城子崖的发掘,濬县、汲县的发掘和关中区斗鸡台等地的发掘,都说明了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是在自己学科基础极薄弱的环境中,慢慢成长起来的。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时西方考古学过于看重得到贵重的文物,在古器物本身上只作比较的研究,而忽视物与人的关系,忽略了从发掘的各方面寻找全盘的生活面貌。因而古器物本身的分类比较,也是主观的,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样为考古而考古,不想从中寻求社会发展规律,是西方旧考古学最大的缺点,我们今天必须认识旧考古学为考古而考古的错误方法,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历史学观点方法,来建树古为今用的新的考古学。

这部由先父阎文儒撰写的《中国考古学史》一书,是对中国两千年来考古学的一个简要的总结。本人经过近两个多月的整理,总算是完成了。遵照出版社方面的要求,尽量保持原稿的风格和学术观点,所以我尽量少动原稿,只是把目录顺了一下,把繁体字和个别错字改了一下,把不符合出版要求的版式调整了一下,把书名、人名尽量校准,基本上保持了原稿风格和行文的习惯。此书完成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今天能够“重见天日”,在这里我与长兄阎万石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深表谢意。

阎万钧记于北京魏公村

2003 年 1 月